

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台湾报业史话

曹立新 著



CROSS-STRAI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台湾报业史话

曹立新 著

GROSS-STRAI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报业史话 / 曹立新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08-3259-8

I. ①台… II. ①曹…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台湾省 IV. ①G219.24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7930 号

台湾报业史话

作 者 曹立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59-8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张铭清

副主任 黄星民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序)

曹立新 陈飞宝 黄星民 黄裕峯

余绍敏 叶 虎 赵振祥 邹振东

朱至刚 庄鸿明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回到解禁元年	(1)
第二章 报禁政策及其新闻管制	(19)
第一节 从戒严到报禁	(19)
第二节 大棒子加胡萝卜	(37)
第三节 新闻自由与自律	(62)
第四节 潮流变了	(68)
第三章 威权统治的侍从与对手	(76)
第一节 党报的荣与悲	(76)
第二节 两大报系的崛起	(88)
第三节 “小媒体”的反抗	(115)
第四章 巨灵的控制与无权者的权力	(136)
第一节 大者恒大 赢家通吃	(136)
第二节 世界变了 何以立报	(147)
第三节 独立媒体 另类突围	(161)
参考书目	(172)

第一章 引言：回到解禁元年

这故事一言难尽，我们就从明天开始——黄哲斌

“我的大革命”

2010年，对于《中国时报》调查采访室的工作团队而言，是异常忙碌也颇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他们相继推出了“我的大革命”、“民国九九，台湾久久”、“不景气不低头”等系列报道，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民国九九，台湾久久——台湾百年文化内涵与集体记忆”，获得吴舜文新闻奖文化专题报道奖。《我的大革命》专版集结成书后，也获得“开卷好书奖”中的“美好生活书奖”。

然而，该团队当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却不是这些报道本身，而是团队成员、记者黄哲斌年底向报社辞职。对于台湾新闻界而言，上述所有报道引起的反响，加起来都不如黄哲斌一篇谈自己辞职事件的博客——《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这篇博客写道：

是的，我借用了 John Denver 的经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这首歌。顺带一提，此曲于1966年发表时，原名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宝贝我不想走）”，好吧，两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为从昨天起，我离开了工作十六年又五个月的《中国时报》。

离开的原因很单纯，不是跳槽、不是资遣，不是优离优退，而是“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

说来矛盾，两年前，我调回报社担任调查采访室记者，期间沾了一群优秀同事的光，陆续参与“我的大革命”、“民国九九，台湾久

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气不低头”等系列报导，两任总编辑给予极大的尊重与空间，一方面，这差事是值得卖命的、这报社是值得卖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来越难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假装没看到，其它版面被“业配新闻”吞噬侵蚀的肥大大事实，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价值低落的芭乐公关稿一篇篇送到编辑桌上，“这是业配，一个字都不能删”。

然后，它们象是外星来的异形，盘据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被挤压、被丢弃。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脸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一家亲爱的报纸同业，甚至采取浮动薪资，广告拉得多，业绩达成率高，才能享受较好的待遇。另一家报纸主管开会时，公然指责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说，“大家都在卖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于是，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直接伸进编辑台指定内容，这是一场狂欢败德的假面舞会；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却不知道自已买了一份超商 DM 与政府文宣。

所以我递了辞呈，辞职理由填写很翔实：“台湾报纸业配新闻领先国际潮流，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我希望留下纪录，或可作为一种温柔的抗议，一种委婉的提醒。

.....

我的人格并不清高，我也不是吃斋念佛，难道我不想点头如捣蒜说“好好好好好”？我当然想，想得要命；只不过，我更相信，“人生总有非卖品”，并非世间万物身上，都有一个标价牌。

例如，读者的信任；例如，专业判断与良知；例如，自己的人格与报社的信誉；例如，写或不写的自由权利。

业配新闻破坏了一切，夺走了这一切，它以每字一、两百元的代价，将新闻变成廉售的开架商品、“集成营销”名目下的一项配件、政府标案的简报甜蜜点。抗拒业配的主管或记者，反而变成害群之马，变

成昧于现实的唱高调者，变成观念落伍的侏罗纪恐龙。

所以，我承认自己老了，笨了，落伍了……

我最近重读五年前，前辈记者林照真在《天下》的深度报导：《谁在收买媒体？》，感触益发深刻；五年来，台湾媒体的怪状不但没变少，而且业配手段越发“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没笔误），从业者的痛苦挣扎尤甚于前。

几年前，我仍任职于中时电子报，当时目睹业配新闻“和平崛起”，广告主试图介入新闻产制流程、试图让记者与编辑成为企业公关部门的附庸。然而，编辑部至少还肩负守土之责，换句话说，“吵完一架大多还挺得住”；而今，零星战役早已结束，专业伦理的防线一路溃退，除非你抱定“不干最大”的决心，否则只能眼看新闻版面逐步被广告侵蚀、瓜分，更可怖的是，你无法望见未来的底线。

这故事一言难尽，我们就从明天开始。^①

“我的小革命”最富戏剧性的影响，无疑在于它影响了报道者自身。黄哲斌说，每一个小革命故事的主角，都让他相信，“勇敢去做，绝不会孤单”。他由此加入到颠覆主流的行列，以实际行动对抗台湾媒体业已深入到新闻产制每个环节的“置入式行销”。调查采访室负责人何荣幸评论说：“就这样，我们辛苦耕耘、锲而不舍的小革命专版，在两年后开出了哲斌的大革命灿烂花朵。”

黄哲斌辞职之后，前中视新闻主播、新闻企划室主管刘蕙苓也以黄哲斌的方式“响应黄哲斌”，留下一声叹息——“原来我这么不专业?! 就这样离开了电视新闻界”。^② 无独有偶。此前一年，《联合报》记者朱淑娟同样因为不满“置入式营销”对台湾新闻业的扭曲，离开了“不再报道真相”的媒体；再之前，《中国时报》记者林照真有感于在媒体的商品化大潮下，记者由“看门狗”变成了“哈巴狗”，大喝一声“记者，你为什么不反叛”，

① 黄哲斌：《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http://gb.chinatimes.com/gate/gb/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② 刘蕙苓：《原来我这么不专业?! 就这样我也离开了电视新闻界》，<http://blog.udn.com/alexandroslee/4732524>。

离开媒体，转身成为大学教师；更早些，因为不堪忍受台湾媒体充斥着侵害人权的报道和置人性营销，新闻沦为另类公害，记者关鱼毅然离开服务多年的报社，创办了独立媒体《台湾好生活电子报》，试图以新的方式满足受众真正需求，为台湾媒体留下未来的希望。猪小草、彭瑞祥、冯小非……近10年来，台湾不知有多少优秀媒体人离开了这个行业，就连何荣幸那样虔诚的新闻圣徒，以“废墟开出一朵花，乱世守护一亩田”的精神，和“做多少、算多少”的务实态度，不断寻找媒体突围的方向，却也在长期的焦虑挣扎中，“几度疲惫无力到想要离去”。

追求媒体独立，不畏强权与金钱，从来都是新闻史上的主题故事，也是历经台湾报禁时代的英雄记者们引为自豪的传奇。当年，因为受到报禁开放的启蒙，林照真、何荣幸、黄哲斌等新生代相继投身报业，决心从前辈手中接过新闻自由的旗帜，为台湾的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再立新功。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十数年间，新闻理想在台湾居然变成可笑的侏罗纪恐龙，忠于专业操守的记者，也被视同与风车搏斗的唐吉珂德。与经历报禁的老一代记者相比，如今的新闻人，再不必害怕老大哥的监视，也不必担忧莫名的文字狱，没有挺身而出的风险，也没有曲笔为文的委屈。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多元异质、政党撕裂、利润挂帅、娱乐至死的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不信任，内外压力下的无助，都让他们感觉到，虽然刚刚走出报禁的铁幕，却仿佛又陷入另一个漫长的黑夜之中，煎熬与叹息，奋起与突围，依然难以找到指路的星星：

一党独大的政治威权虽已走入历史，取而代之的却是媒体老板的鲜明立场，以及广告主无孔不入地强势入侵，新闻专业依旧饱受媒体意识形态与政商力量的干预侵蚀；新闻工作者虽有更大发挥空间，但媒体政治立场分明、收视率挂帅、臃色腥当道、侵犯基本人权却让新闻专业尊严荡然无存，新闻工作权在不景气声中更是风雨飘摇。也就是说，过去箝制新闻自由的敌人虽然恐怖巨大，却可能透过挑战威权体制的途径看见幽微亮光；现在“敌人”已不时化身为媒体老板、高层主管、各类广告主、收视率竞争、阅报率调查、自由市场机制、经济不景气、记者自我设限、工作权饱受威胁，密密麻麻包围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却

还看不出整体脱困的有效途径。^①

老大哥刚刚离去，孔方兄粉墨登场；威权魔掌才收起，市场巨灵又降临；原以为迎来了光明，却不料步入另一种黑暗。

黄哲斌的辞职，虽然引发台湾传播学界与公民团体的积极串联，迫使“总统”、“行政院长”亲自出面，宣示今后不再做政治置入营销。当局“用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的荒谬现象，或许可望告一段落。可是，“卖新闻赚钱”，买家岂止有当局？除了置入式营销，当局是否会采用其他方式操控媒体？走出报禁的台湾报业，能否走出市场的控制？新闻业，这一在西方被推崇为第四权力、在中国寄托了文人论政之理想的行业，曾吸引万千年轻人以它为终身志业，为何在今日台湾，竟变成不值得托付的行业，甚至被讽刺为制造业、修理业、屠宰业？

这是一个有关媒体、官方和市场的复杂故事，是一个关于台湾传媒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漫长故事。追根溯源，故事还得从30年前台湾媒体的快速开放谈起。换句话说，要理解台湾媒体今日的病症和台湾新闻人今日的痛苦，不能不将时间拉回到解禁元年。

迈向新时代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988年元旦，对于台湾报业和台湾报人而言，尤其具有新气象。从这一天开始，在台湾实行近40年的报禁政策终于解除。

这一天，台湾读者早上起来，发现当天的报纸与往日不一样，《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都变成6大张24版，花花绿绿一大摞，不仅厚度比平常增加了一倍，版面、内容也都充满了新意。

这一天，《中国时报》头版刊载了《报禁今天解除》的醒目新闻。新闻说：“中国时报以创办一份新报纸的心情和做法，迎接报禁开放。”

这一天，《联合报》同样以欣喜与期待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这一天报纸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题为“迎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

^① 何荣幸：《媒体突围》，商周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988年于今天揭开序幕，进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这是解除戒严令后，宪政迈向政党政治变革的一年，宪法与法统间的关系，在这一年，将形成宪政最大的考验，最大的突破，而出现崭新的局势。

这是外汇管制开放后，经济发展向自由化、国际化升高的一年，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惊涛骇浪，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引发财经金融的全面性互动激荡。一个新的“起飞”年代，会带给台湾奇迹新的价值判断。

这是开放大陆探亲后，海峡两岸掀起新的竞争的一年。我们的大陆政策与中共的统战政策，都面临局势演变的挑战与考验，中国的统一问题，将在这样的考验下，酝酿一种新的模式。

这是解除报禁，新闻言论自由势必涌起空前高潮的一年，新闻言论自由对国家社会安全与整体利益的影响，对人权与人民合法权益的提升，对人民参与意志与公意的激发，都将为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导致本质的蜕变。

这是中华民国走向开发国家经历经济发展的过程而达成政治成熟的一年，开发中国家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矛盾，自由文化与威权文化的矛盾，在这一年将有更剧烈的破与立的形势消长……

在这一年，执政党与政府必须正视报禁解除后，报纸竞争与新报设立所再现的传播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新资讯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执政党与政府都必须走出宣传与文工的传统意识，努力通过求新求变的实质改革行动，赢取有利的资讯诠释与回应……

运用大众传播的功能，确切的导引公意及表达公意，俾使社会均衡得以维持，政治进步得以加速，乃是新闻事业迎接报禁解除新形势的严肃使命，本报将自明日起发表一系列社论，对今后国家社会向前走向前看提出建言。^①

另一篇则是专门为了“迎接开创报业新纪元的一年”：

^① 社论：《迎接中国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年》，《联合报》1988年1月1日。

报禁的开放将使这年成为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不止表示民主自由落实在人民的最基本权利上，也不止象征开放社会的实现，更紧要的，乃是新闻言论自由会带来国家社会更大的活力，更广更深的厚植民主基础，而又将民主充分表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上，这是对人民思想的解严，其意义尤重于政治与社会行为上的解严。我们可以强调说，这是民主宪政最耀目的成就。报禁的解除，使中华民国可以除了享有“新兴工业国家”的令誉外，复受国际间肯定为“新兴民主国家”。^①

这一天，《中央日报》特别邀请赖光临、汪琪、王洪钧、皇甫河旺等主持政治大学、辅仁大学等新闻院系的专家学者进行笔谈，发表他们对报禁开放的看法，并制作专版——《报纸开放后的省思》。编者特意加了按语：

期待已久的报纸开放政策，从今天起付诸实行，不仅将提供全国民众更丰富的资讯服务，同时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建设，也将在更健全的舆论制度下，迈向一个开放进步的新时代。

此前，台湾省报业协会和台北市报业协会发表了《迈向一个资讯健全的新时代》的联合声明。走过漫长的戒严和报禁时代，历经当局的压制与束缚，所有曾经在威权恐怖之下追求过自由、在黑暗中寻找过星星的新闻人，从此“奔向自由开放的年代”。^②那一刻的心情，何荣幸曾经作过生动的描述：

这群人亲身见证，台湾这艘希望之船离开戒严、报禁港湾，从此航向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民主海洋。他们虽然参与其中、记录过程，却也只能载浮载沉，不知道大海的另一边究竟还有多少风浪。

① 社论：《迎接开创报业新纪元的一年》，《联合报》1988年1月1日。

② 胡元辉：《“黑暗之幕”将成事实？——戒严与报禁解除二十周年的忧思》，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远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13页。

这群人散布在最保守到最激进的媒体。他们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匍匐前进，姿态多半扭曲变形，很难保持优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人想尽办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从中南部发声，有的人深入观察民间社会，有的人则与情治单位大玩“捉迷藏”游戏；后人想象他们坚定勇敢，他们身处其中却可能狼狈不堪。

他们像是在无尽的黑夜中寻找星星，对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对内追寻若有似无的记者典范。^①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港湾驶向海洋，从荆棘走向鲜花，从枷锁走向梦想。

报禁开放，绝不仅仅是报纸登记与张数的开禁，更是全体新闻人精神和心灵上的开放。^② 解严前不久从电视台转到《中国时报》工作的年轻记者林照真回忆说，解严对她有着极大的启蒙作用：

解除报禁时，我被告知从此写作没有检查了，张数也没有限制了，竞争对手增加了，报社要大家思考如何因应报禁开放，而有不一样的作品。很多事已不复记忆，我只记得，我在那一个时代后，我的心里上有了更大的解放空间，知道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这样的心情，对我来说是兴奋的。没有了时代的枷锁，所剩的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新闻梦。^③

没有了时代的枷锁，所剩的就是不断追寻自己的新闻梦。报禁解除后，一大批怀着新闻梦想的年轻人，像林照真一样加入到媒体行业。那时候，报纸对人才需求急剧膨胀。那时候，每两天就增加一张新报纸。

每两天增加 1 家新报

1988 年 1 月 21 日，台湾解严后第一张新报纸《自立早报》创刊。该报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 2008 年版，第 28—29 页。

②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9 年版，第 357 页。

③ 林照真：《报禁解除对我是一种启蒙》，http://ban-lift20.blogspot.com/2007/10/blog-post_5431.html。

日出5大张，售价10元新台币，首日开印17万份报纸。已在晚报市场独占鳌头的《自立晚报》信心满满，不仅欲借此举进军日报市场，与《联合报》《中国时报》一较高下，其志向所指更在打造出与中时、联合鼎足而三的“自立”报系。其创刊词宣称要“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

本报现在投资人自民国四十八年接办自立晚报，二十九来无时无刻不期盼同时发行早报……惟因报禁，未能如愿。去年2月，政府敲定解禁政策后，我们夙愿得偿，立即着手早报筹备工作……

我们愿在自立早报创刊的今日，再一次揭橥我们办报报国的理想，以与同人君子共勉。

我们一向认为办报不同于经营一般营利事业，大众媒体之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所有报人合当奉为天经地义。我们基于这种信念，将投资报业视为一种奉献，投资人不以经营报社作为生活之根本，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我们将继续维护这宝贵的传统，不稍更易……

我们承袭母报——自立晚报的传统，仍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作为我们办报的最高标杆……自立早报的编辑方针、发行方针、广告方针，便是完全以“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为最高理想的彻底落实。

报纸还专门刊载了吴三连手撰的《自立报系社训》：“我们信奉新闻自由至上，我们肯定遵循客观报道公正评论的准则，可以促成文化改革人类和谐世界和平，我们信奉国家利益第一，我们肯定坚守无党无派独立经营的立场，可以增进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公道，我们信奉公众福祉为先，我们肯定一本有为有守诚挚奉献的精神，可以获致充实生存尊严生命永恒。”^①

这是报禁开放后台湾出版的第一份新报纸。《自立晚报》“二十九年来无时无刻不期盼同时发行早报”，在创办新报中拔得头筹。联合、中时两大报业巨头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新竞争，也早已在报禁开放前夕砸下重金，投资人才、设备，在市场等方面设置高位门槛，以卡住有利地位，可谓虎视眈

^① 社论：《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自立早报》1988年1月21日。

眈，志在必得。

《自立早报》创刊1个月后，2月22日，《联合晚报》创刊。又过了几天，3月5日，《中时晚报》创刊。半年后，7月12日，曾经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民生报》等著名报刊，并以上海《立报》创下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报纸发行纪录的一代报人成舍我，终尝“报禁不除，决不办报”的夙愿，以92岁高龄创办了《台湾立报》——创下世界新闻史上创办人年龄最高的纪录。又过一年，1989年6月，台湾党外著名政治领袖人物、“立法委员”康宁祥创办《首都早报》，从各报挖角，聘请著名记者戎抚天出任总编辑，其他援引人员不乏一时之选，其创刊宗旨揭橥“忠实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一份真正属于台湾社会的报纸”，又引来报业市场不小的震动。

除了这些重拳出击，还有许多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的未出版新报，以及更多新报蓄势待发、即将创刊的各种消息。据“内政部”统计，报纸开放2个月内，新申请登记报纸33家，平均每两天增加1家，超过以往40年存在的报纸总数。1988年，全台湾新登记报纸超过100家。1991年，新报登记竟达217家。^①到1991年年底，“行政院”登记的报纸共有253家，实际出版是为154家。^②报禁开放后至1998年11年间，累计发出报纸登记证的家数，包括一日刊和多日刊，计达883家。^③

“昙花一现的繁荣虚象”

如久旱遇甘霖，报禁的束缚一旦冲破，创办新报的潮流便汹涌而至，沛然莫之能御。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股热潮，来得猛，去得急，潮起潮落，只维持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繁荣虚象”。^④

因为有太多的喜悦和憧憬之情，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报禁开放后台湾报

① 黄天才：《新闻通讯事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4页。

② 荆溪人：《报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7页。

③ 苏蘅：《竞争时代的报纸：理论与实务》，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 黄天才：《新闻通讯事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3页。

业发生的第一件重要之事，不是新报创刊，而是旧报停刊。1988年元月，与报禁开放同一天，创刊于1950年，长期与《自立晚报》《民族晚报》并称台湾三大晚报的《大华晚报》宣布停刊，成为报禁开放后第一家停刊的报纸。

1990年8月28日，《首都早报》在一版刊登《敬告读者》，宣布：“首都早报今日起，因财务困难而暂时停刊，预期改组完后以重新面貌复刊。”但是，读者们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该报“以重新面貌复刊”。《首都早报》创刊两年来，可谓风头甚劲、风光无限，曾以斗大标题《干！反对军人组阁》，引领各大报跟进报道而名噪一时，并以《媒体与不实广告》为主题的15篇连续报道荣获金鼎奖公共服务奖，岂料仅仅风光了1年零2个月，便因“资金不足”宣布停刊，成为寿命最短的新报。

《首都早报》停刊后，一家民营报纸发行人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便坦言，大家都在亏损状态下咬牙苦撑，看谁先倒下去。^①仅仅过了10天，果然又有报纸倒了。9月9日，经营了1年2个月（1989年7月1日创刊）的《环球日报》宣布停刊。该报创刊之初，曾标榜师法《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精神，其主力成员均从各大报挖角而来，号称“只有这群家伙能办《环球日报》这样的报纸”，被视为报业市场上一匹黑马。可是，仅仅过了半年，该报就人事日非，亏损累累，每月亏额高达2000万元。^②报社内部气氛，也由创办之初的朝气蓬勃逐渐变得暮气沉沉，许多采编人员挂冠而去。后来虽经整肃，甚至停刊前一个月还大登广告，以月薪70000元征求员工，^③依然无法渡过难关，终于偃旗息鼓。“创刊容易续刊难”。投资没有止境，回收却遥遥无期，绝大多数新报不到一年半载就销声匿迹了。报禁开放后，市场化的商业竞争取代了原来当局的政策禁止，成为报业的“新设限”。对新手而言，过去格于禁令，难以创办新报，现在却格

① 忻圃丁：《报业经营将有苦拼》，《新闻镜周刊》第97期，1990年9月10日至9月16日。

② 叶毅祥：《经营方式失措 环球日报停刊》，《新闻镜周刊》第99期，1990年9月24日至9月30日。

③ 徐凤鸣：《人事倾轧乱阵阵 环球日报处境艰》，《新闻镜周刊》第67期，1990年2月12日至18日。

于市场，无法竞争即难以为继。^①《首都早报》每月平均亏损达1300万元，原有两亿资金悉数赔尽。后期虽然曾以赠品、抽奖、在超市免费赠阅等多种方法强力推销，仍然无法挽回停刊的命运。^②

报禁解除，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带给台湾报业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报禁开放前，对于如何解禁，台湾报界曾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完全解禁，两大报力主取消一切管制，完全由市场调节。第二种是有限解禁，小报主张应逐步开放，先限制大报的扩张，使小报及新报有生存的机会。结果，当局采取了完全解禁的做法，对于未来报业的市场行为，也未作出规范要求，给未来的竞争埋下危机的种子。^③

事实上，报禁开放前夕，联合、中时两大报系为确保市场绝对优势，纷纷在人才软体与设备硬体上大量投资，在固守原有地盘的同时，加高产业进入障碍，加重新进入者的“卡位成本”，消耗资本弱势的新竞争者。以联合报业为例，新投资了林口、台中及高雄印刷分厂，购买高斯印报机、新力影像传输机、Grosfield平版传版机、财务系统电脑化等，总计达27亿新台币。中时报系的采编人员，则由报禁开放前不到2000人，一年内急速成长到4000人以上。报业人力市场价值猛涨，新进报业薪资负担加重。^④

踌躇满志的新报纸，往往在正式出版发行之后，才发觉报纸赖以生存发展的发行及广告，都已被联合、中时两大报系牢牢掌控，新报难以插足，也无从问津。在旧有大报的封堵之下，新报几乎没有存活空间，加上新办报纸，投资巨大，人才缺乏，没有一家不是赔亏累累。因此，报禁开放倒使大家认清了一项事实：原来是报禁政策保障了台湾原有31家报纸的生存。

报禁时代，持有报纸登记证，如果报纸办得不错，就继续办报，不断发展；如果报纸办得不好，不堪赔累，就将登记证转移出手，不仅可以弥补亏

① 林正国：《中央日报改革的决心与作法》，《新闻镜周刊》第86期，1990年6月25日至7月1日。

② 尹子扬：《首都早报宣告停刊 报业经营更添寒意》，《新闻镜周刊》第96期，1990年9月3日至9日。

③ 林丽云：《报业，夕阳业，为什么？》，转自《报禁解除二十年》，<http://ban-lift20.blogspot.com/>，上网日期2007年12月20日。

④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版，第110—111页。

损，通常还可赚一大笔。报禁解除后，登记证不值钱了，无论新报老报，经营不善都只剩停刊一途，就像先后停刊的《大华晚报》《首都早报》和《环球日报》。尤其是后两家新报，其创办人的社会声望及财力都不同凡响，也曾在报业市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却不得不相继停刊。严酷的事实提醒人们，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的生态环境已经全面蜕变，以往那种“苦撑以待时来运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营困难者，只好及早收手还不至元气大伤。前车之鉴，逼得100多家已取得登记证的新报纸不敢启动发行。^①据2002年统计，仍维持运作但不能经常发行的报纸有130家，正常营运的只有30家。^②

1999年1月21日，《自立早报》经过了几次股权变动的风波后，出版了终刊号。其《停刊声明》称：

由于受到外在经济景气变动，以及内部长期亏损影响，自立报系忍痛宣布创刊满11周年的自立早报，即时起无限期休刊……自立早报创刊于台湾报禁解除以后，报业市场进入完全开放竞争的时代，虽然一贯公正、客观、本土的立场，企图以最优良的新闻品质服务读者，为台湾开放报禁的时代意义做一见证，未料，经过11年苦心经营，仍然无法摆脱长期亏损，以及媒体商业化竞争的压力，又适逢台湾经济景气遭遇空前变动，只能忍痛宣布休刊。

在某种意义上，《自立早报》的确为台湾开放报禁的时代做了见证，只是，它见证的诚如其所言，是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生存之维艰。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更是夕阳西下；《苹果日报》的登陆，又带给台湾报业一片风声鹤唳。2001年，《自立晚报》停刊。2002年，《劲报》停刊。2005年，《中时晚报》停刊。2006年，《大成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民生报》《星报》先后停刊。

① 黄天才：《新闻通讯事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4—26页。

② 胡元辉：《坚持——一个媒体人的真挚省思》，未来书城2003年版，第4页。

可以说，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市场经过一番热闹的过度拥入（over-entry）及激烈的防堵战、投资消耗战，新报业几乎全军覆没。两大报系表面上曾一度“赢家通吃”，但为此也代价不菲，头两个月即大跌20万份，^①而且从此一路下滑，连连“跌停板”，^②再也没有回到150万份的最高纪录，长久地受困于这场战争的后遗症中。加上经济不景气、阅读率下降和新媒体的冲击，报禁开放不到两年，便开始减张、减薪、裁员，最后关闭子报，甚至转让整个报系。报禁解除初期带给台湾报业的蓬勃兴旺景象，原来是一场短暂的泡沫。新报倏创倏停的命运，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威权时代到竞争时代

总体而言，从1988年元旦报禁开放，至今30年来的台湾报业，除了最早两年出现短暂的繁荣之外，此后基本上是一个报纸不断走向消亡的大失败过程。《首都早报》可以“干！反对军人组阁”，却没有“干”成“一份真正属于台湾社会的报纸”——因为“资金不足”。《自立早报》虽号称“将投资报业视为一种奉献，投资人不以经营报社作为生活之根本”，但终究没能“办成功一份自由报业的典范报纸”——奉献也不会是无止境的。投资人最后追求的终归还在获利，如果得不偿失，则宁可作别的奉献。老报人成舍我临死之前，也终于向老朋友承认，《台湾立报》没有办得像众所期待的那样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钱”。^③

“没有钱”，一语道破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生态最本质的变化。它表明，从报禁到报禁解除的过程，也是台湾报业从威权时代走向竞争时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局的强暴从前门被赶出之后，资本的强暴却悄悄从后门溜入，或者说，政治巨魔虽被打倒，资本巨魔却随之粉墨登场，而且前者戴上市场的面具与后者合体，形成更加恐怖的官僚商业勾结体（Bureaucratic-commercial complex），^④并迅速成为传媒业的新主宰。当资本成为报业的决

① 续伯雄辑注：《台湾媒体变迁见证：欧阳醇信函日记（1967—1996）》，时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② 彭岸新：《今年的报业会很冷》，《新闻镜周刊》第73期，1990年3月26日至4月1日。

③ 卜少夫：《我的老板成舍我》，香港《新闻天地》，1991年4月7日。

④ 李金铨：《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圆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III~XVI页。

定性力量后，台湾报纸所有权逐渐集中到两类势力强大的经营者手中，一种是延续解严前优势并持续成为领导品牌的两大报系，另一种是财团，即报纸所有权或资金来源主要是财团或财团相关事业。^①从此，报业竞争成为赤裸裸的资本竞争。不只是《首都早报》《自立早报》见证了开放报禁后台湾报业资本化竞争异常惨烈的过程，就算是资金雄厚的报纸，像接办《大华晚报》的《大成报》，以及有中时、联合报系作为靠山的《中时晚报》《民生报》，甚至是有政党、当局作为后台的《中央日报》《台湾日报》，也只过多撑了几年，最后仍免不了停刊的命运。即使是那些没有停刊的报纸，像《联合晚报》《自由时报》等，虽然还在发行，却也亏赔不堪，不得不在报业之外寻找止损的办法；而报业自身的品质却日渐恶化。

新闻商业化

报业的资本化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新闻商业化”。报禁时代，各报均宣称自己“正派”、“无党”，竞争时代，牟利则成为报业的最高目标。《苹果日报》公开宣称“如果道德能卖钱，我们也会很道德”。流风所及，报纸苹果化，连一向以知识分子报纸自居的大报亦不能幸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精神分裂”状，并由报纸波及其他大众媒体。^②

商业化必然影响新闻和意见的品质，激情主义与市场取向于是相伴而生。^③1988年9月1日，报禁开放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报禁开放后许多报纸的表现提出批评，认为“开放有余，责任感不足”。^④1991年3月，辅仁大学主办了“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检讨报禁开放3年来报业面临的新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报禁开放后，新闻学向来秉持的真实性、精确性、客观性等专业理念不断受到商业化的冲击而发生动摇。许多触犯大忌的新闻文化，像所谓软性新闻，

① 苏蘅：《竞争时代的报纸：理论与实务》，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梁丽娟：《苹果掉下来：香港报业“苹果化”现象研究》，香港次文化堂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18页。

③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版，第20页。

④ 薛心谔：《编辑台上：三十年以来新闻工作剪影》，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去政治化、趣味化、娱乐化、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揭人隐私、夸大渲染、描写犯罪、夹叙夹议、煽情主义等等，大行其道。^①《环球日报》停刊时，老板吴德美就宣称，停刊原因为“记者报道不实，破坏报社形象，因而停刊以示负责”——虽然有些矫情，却有不少事实根据。^②

尤其可悲的是，威权时代，报纸被政治束缚，言论上没有自由；报禁开放后，已迈向自由时代的台湾报纸，却在政治立场上自觉地分化成蓝绿不同派别，言论和报道公然违背新闻的真实客观原则，而改以老板立场为准绳。《首都早报》停刊，自称是因为财务困难，但有评论者指出，实际上是由于该报“反对色彩过浓，新闻报道和言论均不脱‘预设立场’的影子，难为开放而多元的社会所接受”。^③资深记者商岳衡进入《自由时报》工作仅仅三个月，便因为该报“沦为党派斗争之工具，凭着二手传播之小道授意，对非主流派不断展开恶毒攻击”、“报道台独及民进党消息已达泛滥地步，诸多作法与他对报业的理念南辕北辙”，因而提出辞职。^④

总之，报禁开放后，各报新闻报道和言论并没有像预期一样，由于自由竞争而变得更加公正客观，相反，各报原来持有的立场倾向更加彰显。^⑤也就是说，伴随着市场化，政治力对于报纸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不再以外显的控制方式，而是隐没地转以市场的机制操作。市场新闻学，百无禁忌地成为媒体操作的最大律则。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报禁解除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言论自由。有人评论报禁开放后台湾报纸的言论状态，“百家争鸣已成为百家乱鸣”。《洛杉矶时报》甚至称台湾媒体，由报禁时代的哈巴狗变成解禁后的疯狗。挣脱束缚的言论空间并未成为提升民主品质的公共领域，打破

①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版，第13、35、93页。

② 叶毅祥：《经营方式失措 环球日报停刊》，《新闻镜周刊》第99期，1990年9月24日至9月30日。

③ 尹子扬：《首都早报宣告停刊 报业经营更添寒意》，《新闻镜周刊》第96期，1990年9月3日至9日。

④ 商岳衡：《辞呈》，《新闻镜周刊》第106期，1990年11月12日至11月18日。

⑤ 杨孝嵘：《报社经营策略的观察》，载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八十年版》，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1年版，第86页。

禁锢的民间活力亦未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公民社会。^①

“拜托，把警总恢复一下好不好？”

新闻商品化无疑是对报禁开放最大的反讽。似乎没有人记得媒体还是社会公器。一名电视工作者自我解嘲地说，“我们被绿买，也被蓝买，这样很公平，大家都沦陷”。^②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及商业利益的魔咒下，台湾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形象与工作尊严也快速沉沦。新闻业似乎是一个在自我遗忘的行业，既没有共同尊崇的专业价值，也缺乏社群集体意识，^③ 甚至被读者讽刺为“制造业”、“修理业”、“屠宰业”。

忆往昔峥嵘岁月，曾经与报禁作战的老报人居然有些想念起从前的敌人。著名报人南方朔说：

我觉得应该比较辩证的看待戒严时期和解严时期的媒体。不要老是绕着戒严、白色恐怖跑。这种单一史观解释，把媒体更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都忘掉了。戒严时期，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媒体有一批人很努力，在台湾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现在大家都疏忽掉了。那时，只要你言之合理，谈政府都市计划、环保和财税政策的不对，政府也愿意改。这对社会的进步贡献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假设一个社会不进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设政府不改革，老百姓没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民主化。我们都忘记了呢?!^④

怎么能忘记报禁时代的白色恐怖呢？可是，南方朔让大家记住的却是，除了政治迫害和言论控制，报禁时代，还是一个记者有作为的时代，还是一

①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14页。

② 林照真：《谁在收买媒体？》，《天下杂志》第316期，2005年2月。

③ 陈世敏：《为了见证历史》，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第15页。

④ 南方朔口述，韩福东撰稿：《台湾报禁解除前后》，《先锋国家历史》第14期，2008年4月（下）。

个媒体受尊重的时代。戒严时期，存在着威权政府这种明显的目标，又有警总在背后盯着，身为新闻从业人员，反而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要解放思想，扶正社会。南方朔如此“辩证看待”戒严时代，与其说是对于过去报业的记忆，不如说是对于报业现状的批判和理想报业的想象。无独有偶，面临报禁解除后台湾媒体的种种不堪局面，当年的新闻斗士、曾任《自立晚报》社长的吴丰山也不无调侃地说：“拜托，把警总恢复一下好不好？”^①

由突破报禁到对报禁的“怀旧”，台湾报业走了一个怎样的轮回？报禁又是如何形成的？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52页。

第二章 报禁政策及其新闻管制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警总——黄富三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浪潮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蒋经国

台湾报业的发展史，与台湾人民的开拓史和命运史息息相关。从十九世纪初期的筚路蓝缕，到刘铭传时代的报业初成，历经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光复后短暂的新闻自由，报禁之前的台湾新闻史，有过坎坷，有过辉煌，可歌可泣。

第一节 从戒严到报禁

报禁之前的台湾报业

史载，台湾第一家印刷店——“松云轩刻印坊”出现在1821年，由卢崇玉创立于台湾府城。松云轩使用雕版印刷，主要是印刷善书经文，也有出版治台舆图、科考范文、诗文集、童蒙读本、谱牒签诗等。^①五口通商后，中国沿海地区新出的报纸，像上海的《申报》、宁波的《甬报》、广州的《述报》等开始流传到台湾。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仿北京《京报》发行了台湾最早的中文报纸《邸抄》，为手抄或木刻制作，内容主载法令规章与官员动态，定期利用旧城门贴出示众。^②同年7月，英国长老教会牧师巴

^① 辛广伟：《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 洪桂已：《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载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1979年版，第535页。

克礼创办了台湾第一份印刷刊物《台湾府城教会报》。该报采用教会罗马字书写的台湾话，除了传播教会信息，也刊载了不少有关台湾政治、军事、经济以及风土民情等方面的消息，功能与综合性报纸无异。^①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1896年6月17日，也就是日人据台一周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偕同海军大臣西乡抵台，同一天，大阪府警部长山下秀实，凭借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同乡之谊，带着大阪《雷鸣新闻》的活版铅字印刷设备，到台湾创立《台湾新报》，为台湾第一份近代化的报纸。创刊初期为周刊，不定期发行，每周一两次。7月，台湾总督下令以《台湾新报》为台湾总督府公报，刊登政府律令，得总督府津贴补助，成为一份半官半民的刊物。10月改为日报，销路极差，全台有费报份仅4810份，主要读者为日本在台军警。^②1897年，第三任总督在台北创办《台湾日报》，1898年，《台湾日报》与《台湾新报》合并为《台湾日日新报》。戊戌变法后，著名报人章太炎因逃避清政府，曾出任该报记者。此外，日本人还在台湾中南部创办了《台湾新闻》《台南新报》等。1900年，殖民政府为控制言论，颁布《台湾新闻纸条例》，规定台湾报纸须经过许可并受检查始准发行，严禁台湾民众发行报刊。日人所办的报纸，文字以日文为主，但当时台湾300万人民多不懂日语。于是，《台湾日日新报》于1905年创办了中文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民族掀起自决浪潮，台湾同胞也于此时期提出“自治”诉求。1917年，在东京留学的台湾青年发起组织了台湾青年会，并创办《台湾青年》月刊。发行人为蔡培火，编辑人员包括林呈禄、吴三连、陈炳、郭国基等人。《台湾青年》创刊词称：“本刊创立的目的在于介绍内外文明，详论台湾政治应改善之事，兼谋日华之亲善。”该刊发行前虽向总督表示旨在图台湾文化的向上，但第一期刊出后便被禁止在台湾发行。1921年，台籍人士又在台北太平街春风得意楼集议，成立台湾文化协会，选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温连卿、蔡培火等任理事。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初为半月刊，全以汉文出版，为台籍人士创办的唯

^① 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② 洪桂己：《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载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1979年版，第536—537页。

一报纸。《台湾民报》在创刊号中提出：“民报达民情，民权任你评，民心真未死，民族自增荣。”1927年8月1日，《台湾民报》经总督府同意，以增设日文版为许可条件之一，从东京迁台北出版，由半月刊改为周刊，广受欢迎，发行量达到一万五千多份。1932年4月15日，改为日刊《台湾新民报》。版面由四开三张改为对开两张，以中文为主，三分之一日文。报纸改为日报后，殖民政府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由警务局保安课人员对报纸实行严格管制。每天报纸在印刷之前，须先将原稿交保安课“高等特务”人员检阅，凡涉及批评政治或有关台湾民族思想以及指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都在删除之列。^①二战期间，台湾报业更沦入军部的掌控之中。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报纸所有中文栏全部废止。《台湾新民报》改名为《兴南新闻》。1944年4月1日，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总督府为便于新闻管制及应付战局的紧张情势，强迫全台规模较大的六家日报《台湾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湾新闻》《台湾日报》《高雄新报》《东台湾新报》合并为一家，名为《台湾新报》，日出八开一大张。日本战败投降后，《台湾新报》也宣告结束。^②

光复初期“短暂的自由”

从日本投降到二二八事件前，台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报业自由时期，形成一股办报热潮。

台湾光复后，废除了殖民政府的新闻许可检查制度，改取“创刊不须许可，言论不受检查”的政策。老报人金生丽回忆说：“因为没有申请登记的限制，最简单的只要借一个门脸，挂起报社的招牌，随便租赁和占据一两间廓作为编经两部，接洽一家小印厂承印便成。”^③1945年10月10日，台湾战后第一份报纸《民报》创刊，比《台湾新生报》早半个月。由于新刊

① 时任《台湾新民报》总编辑的吴三连回忆说：“日本统治当局实施出版审查制度。报纸出版前要将样板送审，通过审查才能印刷发行。日本人随时会把不中意的新闻和评论径行刮除，刮除不中意部分后的铅版就像开了一个个天窗，印出来后东一块黑，西一块黑。报社乐于留下这些乌黑的记号，让读者了解异族统治下言论不自由，益发激起同胞奋斗和同仇敌愾的心。”吴三连口述、吴丰山撰记：《吴三连回忆录》，自立晚报社1991年版，第72—73页。

② 洪桂己：《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载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1979年版，第554—563页。

③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8年版，第27页。

登记很简单,《人民导报》登记证尚未到手,即于1946年1月1日先行出版,只在刊头标示“本报业已呈请备案中”。据统计,1945年10月至翌年2月间,经内政部核准登记的报纸有《民报》《台湾新生报》《人民导报》《大明报》《艺华》《台湾日报》《国是日报》《大同日报》《中华民报》《自强报》等。二二八事件前,台湾已登记的报刊计有28家,其中日报17家,3日刊两家,5日刊两家,周刊3家,旬刊4家(见表1)。1946年3月至9月,台北一地即有8家新报。^①其中,民营报《民报》销售量最多可达七万份。

表1:抗战胜利至二二八事件前台湾创刊的报纸^②

报刊名称	发行地点	发行人/社长/主编	创刊日期
民报	台北	吴春霖/林茂生/陈旺成	1945/10/10
兴台新报	台南	沈瑞庆	1945/10/22 (周刊,1946年8月改为日报)
台湾新生报	台北	李万居/周白如	1945/10/25
光复新报	屏东	黄金殿/曾国雄/林斌	1945/11(三日刊,后改为日报)
鲲声报	台南	高怀清	1945/12(原为月刊,后改为5日刊)
民声报	台中	徐成/许庚南/徐沧州	1946/1/1(周刊,1946年5月6日 改为《台湾民声日报》)
人民导报	台北	郑明珠/宋斐如、王添灯/苏新	1946/1/1
东台快报	花莲	陈笃光/吴万恭	1946/2/1(一个月后改为《东台日报》)
中华日报	台南	卢冠群	1946/2/21
台湾经济日报	台北	谢汉儒/吴竹有	1946/3/1
大明报	台北	林子畏/艾璐生/马锐筹	1946/5
国是日报	台北	林紫贵/陈万里	1946/5/1
工商日报	台北	林梦林/张茨	1946/5/1
和平日报	台中	曹先锬/李上根/陈洗	1946/5/5
台湾日报	台中	张兆焕/陈骏驹	1946/6

① 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2010年版,第44—45页。

② 何义麟:《战后台湾报纸之保存现况与史料价值》,《台湾史料研究》第8号,1996年版。
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5页。

续表

报刊名称	发行地点	发行人/社长/主编	创刊日期
大同日报	台北	任先志	1946/6
国声报	高雄	连谋/王天赏/陈香	1946/6
自强报	基隆	周庄伯/顾培根	1946/8/6
自由日报	台中	黄吾尘/陈茂林/路世坤	1946/12/1
中外日报	台北	林宗贤/郑文蔚/寇冰华	1947/2/1
重建日报	台北	林台山/苏泰楷/李曼若	1947/3/1
台东新报	台东	陈振宗	

1945年3月，抗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为了胜利后顺利收回台湾，组织制定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第4项规定：“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通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第7项规定：“接管后教科书及报纸，禁用日文。”^①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制定了《中央宣传部接管台湾文化宣传事业计划纲要》，其中第2项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社、通讯社、出版社及电影制片厂、广播台等，一律予以查封，由本部会同省长官公署接管，其已停办而设备未毁者亦同时查封。”对于已没收的各项文化宣传事业财产，“中宣部有优先利用之权”。同时规定：“在未恢复平时状态前，新闻、电影、杂志刊物、通讯社稿均应实行检查审定，由本部特派员协助政治部办理之。”^②

《台湾新报》接收后改为《台湾新生报》，作为行政长官公署的机关报。^③该报“言论纪事立场，完全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报纸”，“以源源介绍丰

^①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辑：《光复后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110页。

^② 薛月顺编：《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一）》，第43—44页。转自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③ 在《台湾新报》的接收问题上，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陈仪的行政长官公署发生了冲突。国民党中宣部原拟接收该报设备创办台湾《中央日报》，但长官公署不同意。陈仪任命青年党人夏涛声和李万居分别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台湾新生报》社长。中宣部大为不满，以台湾须办党报为由，强令分出《台湾新生报》一半的印刷机器，命特派员卢冠群筹备《中华日报》，陈仪则以《中华日报》须办在台南为条件，予以同意。参阅沈云龙：《事迹的追忆》，《历史月刊》1988年4月号。

富的中国文化，以标准国语写文章，以最大篇幅刊载祖国消息，及传达并说明政府法令，做台湾人民喉舌三事为其主要任务”。光复初期，由于大多数台湾民众不识中文，《台湾新生报》每期出版对开一大张，除前三版新闻以中文刊载外，第四版仍以日文译刊当天重要消息，直到光复一周年才将日文版取消。

1945年12月25日，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台湾省行政长官暨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抵台，接受日本投降。同日，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象征着国民政府体制进入台湾。随着政权转移，大陆法规也移植到台湾。1945年11月3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发表布告：

民国一切法令，均适用于台湾，必要时得制颁暂行法规，日本占领时代之法令，除压榨籍制台民，抵触三民主义及民国法令者，应悉予废止外，其余暂行有效。^①

11月23日，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新闻纸、杂志的发行，均应依照《出版法》规定办理登记，是为《出版法》在台湾发挥作用之开始。1946年6月1日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办事细则》，确立该会掌管“刊物违禁取缔”和“杂志登记与审查”，此后加大了报刊登记检查及违规处罚力度，许多报刊因“登记”问题遭到处罚，甚至被处以停刊（见表2）。

表2：台湾省停刊报刊表（1946年6月至11月）^②

报刊名	社址	原因
光天迅报	台中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已三月
晚钟	台中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
民声报	台中	该刊尚未申请登记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
政治经济新报	台中	该报未申请登记台中市政府已予以停刊处分

^①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5日。

^② 1946年11月宣传委员会公布的《台湾新闻纸杂志调查表》，转自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续表

报刊名	社址	原因
新知识	台中市	该报尚未申请登记台中市政府已予以停刊处分停刊已二月
远东时报	台北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五月
法治常识	台北市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停刊已六月
自由报	台北市	该刊因未申请登记已由地方政府先行予以停刊
新力周报	台北市	该刊以内政部未准登记已自动停刊
交易迅报	台北市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六月
民主评论	台北市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八月
小朋友	台北市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一月
经济周报	台北市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
台湾评论	台北市	该刊奉中宣部予以停刊
经济通讯社	台北市	该刊尚未申请登记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
台湾公论	台南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
基督教会公报	台南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六月
青年周报	花莲	该刊因未申请登记已由地方政府先行予以停刊
晒钟	高雄	该刊登证手续尚未完备已饬地方主管依法处理停刊已三月
原子能报		该刊尚未申请登记证已饬地方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注：民声报、经济通讯社在该公告发布时尚在出版。

对于光复之初的台湾报业，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翼中十分不满。除了批评陈仪将长官公署宣传主委和《台湾新生报》交与青年党人，为“异党操纵宣传”，对其他报纸也多有指责：

《人民导报》初为宋斐如所办，宋氏任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借《导报》为不利于处长范寿康之报道，为陈仪不满卸职。《人民导报》亦改组，由王添灯主办，之后报道诸多歪曲事实，不利于政府。《台湾评论》为宪政协进会主办，发行人林忠，其总编辑为李纯青，台湾人，《大公报》记者，实为共产党员，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不胜骇然。而《新生报》虽为政府所办，然其社长为青年党李万居；《大明报》为林子畏创办，实为民主同盟之喉舌；陈旺成之《民报》，林宗贤之《中外日报》，纯为地方主义色彩。”在李翼中眼中，新闻言论堪称正确者，

只剩下《中华日报》《和平日报》等寥寥数家而已。^①

可见，在李翼中眼中，光复后台湾主要报纸中，真正符合国民党立场要求的，几乎没有。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这些报纸的言论和报道，更是为国民政府所痛恨。

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报业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也是台湾现代报业史上的重要事件。

光复之初，挣脱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对于国民政府的喜盼之情，如久旱遇甘霖，沛然莫之能御。“六百万人同快乐，箪食壶浆表欢迎”、“欢喜江山归依旧，近来旗帜庆重生”。1945年10月，国民党第七十军在台湾登陆，台湾民众热烈欢迎的感人情景，著名作家吴浊流在《台湾连翘》一书中曾有描述：

10月17日，从祖国来了第七十军的三千人，与长官公署的官员一起在台湾登陆，这一天的欢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说，远从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赶来的也不少。军队所经过的道路两旁，砌成了人墙，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的并排着，使我觉得异乎寻常。学生、青年团员、还有乐队……军队进入台北市时，有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高唱《国军欢迎歌》。^②

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会场外的广场被争睹盛况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当天及隔日，岛内各地均有盛大游行庆祝活动。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贪腐和陈仪个人错失，在此后的接收和行政长官公

^① 李翼中：《帽檐述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404—406页。

^② 吴浊流：《台湾连翘》，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53—154页。

署施政过程中，屡屡发生漠视，甚至侵害到台湾民众利益的事件。加上当时大多数台湾人不懂国语，造成在政治权力、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同胞高涨炽热的爱国热情因之逐渐消退，特别是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米价暴涨等等原因，最终由一次台北街头缉私人员和摊贩之间的小冲突为导火索，酿成了震惊历史、令人痛心的二二八事件。

在新闻管理政策上，陈仪及其政府人员，同样蛮横无理。经过日本人50年的同化统治后，不少台湾记者已不能用中文采写稿件。光复初期，台湾报纸都是用中日两种文字印刷。^①《台湾新生报》中，台籍的日文记者仍然留用，中文编辑则交给大陆人。日文编辑和中文编辑，各自分开，新进中文记者的薪水几乎比日文记者多一倍。薪俸制度的差别，不仅在新生报发生，其他政府机关也有相同情形。对于台籍记者而言，日据时代尝过比日本人待遇低六成的滋味，没想到光复后同样要接受这种命运。由盼望到失望，许多台湾报人由此对行政公署的措施提出了诸多批评。^②诗人王白渊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说：“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③《民报》也发表社论中指出：“自祖国来临的大人先生们，时常说我们奴化，当初我们很愤慨，不知道指什么为奴化，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礼义廉耻于度外，才能够在这个‘祖国化’的社会里生存。”^④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奉命抵台查办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和何汉文，在关于事件的调查报告中提出，陈仪执掌行政长官公署一年来，在舆论上采取放任主义，全台十余家报纸，“几无日不有批评政府、诽谤政府，甚至不依事实任

① 1946年10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规定：“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所有本省境内新闻杂志附刊之日文版，应一律撤除。”

② 就连作为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的《台湾新生报》对当局都多有委婉批评。参阅张耀仁、杨晓忆：《二二八事件前媒体述之社会问题与媒体定位——以〈台湾新生报〉社论为例》，中华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http://ccs.nccu.edu.tw/history_paper_content.php?P_ID=1057&P_YEAR=2008。

③ 王白渊：《告外省人诸公》，《政经报》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5日。

④ 社论：《可怕的心理破坏》，《民报》1947年2月19日。

意谩骂、恶意丑诋”。^① 而广播无线电台为暴民控制，也是变乱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陈仪自己也认为，“舆论不当之影响”，是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控制报刊便成为陈仪控制整个事态发展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从1947年2月28日事发当日起，《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连续四期全文连载了《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施行细则》《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告知各著作人，著作出版前如未经注册，须加惩处。此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了平息局势，曾向陈仪提出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后增至四十二条），其中两条是：“废止新闻纸发行声请登记制度”；“撤销宣传委员会”。这一意见由于蒋介石派来援军而未被采纳。台湾军政当局与国府决定以叛乱处理二二八事件，并随之进行绥靖清乡。绥靖清乡期间，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表公告，所有新闻杂志书报均应呈送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检查，否则不准发行。台湾的新闻出版事业由此进入军方“事先审查”阶段，光复之初曾经短暂出现的言论自由也随之紧缩。许多报社被查封，一批报人被捕（表3）。

表3：二二八事件中被查封的报纸^②

报社	主持人	查封日期	查封理由
人民导报	林茂生、陈旺成	1947/3/13	思想反对、言论荒谬、诋毁政府、煽动暴乱之主要力量
民报	宋斐如、王添灯	同上	同上
大明报	林子畏、艾璐生	同上	同上
中外日报	林宗贤、郑文蔚	同上	未核准登记
重建日报	柯台山、苏泰楷	同上	未出版，擅发号外
青年自由报		1947/3/5	言论荒谬、诋毁政府、煽动暴乱
大公报台北分处		同上	社论荒谬
经济日报		1947/3/17	奉警总不予复刊
工商日报		同上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2年版，第306页。

^② 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2010年版，第52页。

续表

报社	主持人	查封日期	查封理由
自强日报		同上	
和平日报	李上根	1947/3/23	言论反动，并潜入共党分子
兴台日报		不祥	发布“台南县长袁国钦潜逃阿里山区”等新闻

报纸被大量查封的同时，一批报人遭到逮捕，甚至枪杀（表4）。1946年4月，台湾省新闻记者公会成立时，当日选举产生的17名理事中，台籍人士占了9位。二二八事件后，继续从事报业工作者仅李万居一人。

表4：二二八事件中被牵连的新闻人员^①

牵连结果	新闻人员
被捕后失踪	《人民导报》第一、二任社长宋斐如、王添灯；《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日文版总编辑吴金练；《民报》社长林茂生、幕后创立者李仁贵、廖进平、法律顾问王育霖。
被捕后遇害	《大明报》发行人艾璐生；《国声报》发行人王石定、总编辑钟天福、采访主任李言；《台湾新生报》印刷厂厂长林界、嘉义分社主任苏宪章、台中分社主任吴天赏、台北记者吴思汉；《自由日报》总经理陈南要。
被捕后入狱	《人民导报》总主笔陈文彬；《大明报》总编辑马锐筹、主笔王孚国、马剑之、编辑陈逊桂、文野；《台湾新生报》社长李上根、副总经理林西陆、记者刘占显、蔡铁城、嘉义分社主任钟逸人；《重建日报》社长苏泰楷；《兴台日报》发行人沈瑞庆、主笔彭启明、总编辑刘清龙、主编朱受；《中华日报》屏东记者林晋卿；《中外日报》社长林宗贤。
被通缉后逃亡	《民报》总编辑许乃昌、总主笔陈旺成；《人民导报》总编辑苏新、高雄记者周传枝；《台湾新生报》赖景煌、高雄分社记者谢有用；《中外日报》记者吴克泰。
事件之后	《人民导报》编辑杨毅，1949年夏天失踪；宋斐如之妻严华协助陈文彬逃亡被枪毙。

^①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版，第93页。

走向戒严

二二八事件平息后，为了缓和民怨，蒋介石派白崇禧等人赴台宣慰。白崇禧一行经过实地调查，倾听台湾社会各界声音，了解到台湾较为真实的民情民意，向蒋介石建议撤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建立与内地各省相似的省政府，吸纳台籍精英，扩大执政基础。

1947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决议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各厅处各增设副首长一人，尽可能起用台籍人士。

魏道明履任后，宣布解除戒严令，结束清乡；撤销新闻、图书、邮电检查及交通通信军事管制；调整台币与法币汇率。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后，延揽台籍人士徐庆钟任农林处长，王民宁任警务处长，李连春任粮食局长，颜春辉任卫生处长。对于台湾警备司令部向台湾高等法院检查处控诉的30名内乱罪犯，主张依法宽待处理。除了王添灯、黄朝生、李仁贵、廖进平、陈屋、徐春卿、林连宗通缉前已被杀，蒋渭川、张晴川、白成枝、吕伯雄、邓进益、潘渠源、王明贵、骆水源、陈瑞安、张忠诚、张武曲、颜钦贤等陆续准予自新。林日高、郭国基被捕后，被判无罪。谢雪红、林梁材、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离开台湾，到内地或海外。廖文奎在香港，廖文毅在上海。对参加二二八事件的青年学生一律免于追究，在押的约4000名参与暴动人员全部释放。^① 魏道明的系列措施，较有效地恢复了台湾秩序，平抚了台湾民心。

遗憾的是，随着国共内战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很快又随同全国一起进入戡乱动员状态。1947年7月4日，为解决国民党面临的军事政治危机，蒋介石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实行“戡乱”救国。1948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除新疆、西康、青海、台湾、西藏外，均宣告戒严”。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自20日

^① 褚静涛：《魏道明与二二八事件善后》，《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零时起开始全省戒严，严禁结社与游行，取缔言论。^①从此，台湾新闻管制进入战时体制，也就是报禁时代。

报禁，虽然也包括限价——即所有报纸价格都由当局规定，办报人无权自行调整价格，但主要是指当局对新闻纸采取限证、限张、限印。

限证

民国《国家总动员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为一定之记载。”

第23条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台湾省政府成立后，即宣布依据《国家总动员法》，有权对报社、通讯社涉及印刷出版品采取限制、停止措施。^②该法虽然没有规定人民不准创办新报，但依此条，政府可以不核发新闻纸申请登记证，就连办理卖主登记者也往往遭到主管官署拒绝，从而形成台湾报禁的事实。^③1947年9月，国民党颁布《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1951年年初，台湾省政府指示各县市政府“恪遵节约用纸办法之规定”，严格限制新申请登记报刊，并下令将台北、台中、高雄等市停刊逾限及逾期尚未发行之报刊，依规定注销登记。同年6月14日，台湾“行政院”颁布“台40（教）字第3148号训令”，其中第7点规定：

台湾省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为节约用纸起见，今后新申请登记之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应从严限制登记。

一般认为，这是台湾报禁政策中“限证”的起点。从此，《出版法》规

① 中央社讯：《总统播告全国同胞》，《中央日报》1949年5月17日第1版；中央社讯：《当局今日宣布全省明起实施戒严》，《中央日报》1949年5月19日，第4版。

② 《台湾省政府公报》，1947年冬字号，第60期，1947年12月11日，第938页。

③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8年版，第56页。

定的“登记制”，变成了实际上的“申请制”。^①台湾新办报纸需要先买报纸登记证。但是，一张新闻纸登记证转让费往往达到数千万甚至数亿元，^②加上当局管制与党政军力量介入，使得报纸经营权易主困难重重。其后获准发行的报纸，《中国邮报》《中国日报》为英文报，《青年战士报》《马祖日报》属军报，《中国晚报》《成功报》属地方性晚报，均以所谓“当地确有需要”和“均衡文化发展”为评判标准核准登记。1960年《中国日报》创刊后，台湾报社就一直维持在31家（表5）。

表5：报禁时期台湾报业概况^③

报名	原始报名	改为今名年份
联合报	全民日报、民族报、 经济时报联合版	1953年
中国日报	新中国报	1956年
台湾新闻报	《台湾新生报》南部版	1961年
台湾日报	东方日报	1964年出售后改为今名
经济日报	公论报	1967年出售后改为今名
中国时报	征信新闻	1960年易名《征信新闻报》，1968年改为今名
忠诚报	精忠日报	1968年
更生日报	更生报	1971年
台湾时报	东台日报	1964年易名《中兴日报》，1967年易名为《台湾晚报》，1971年出售后易为今名
工商时报	工人报	1964年易名《农工日报》，1968年易名为《大众日报》，1978年出售后易为今名
民生报	华报	1978年出售后易为今名
中华日报南社	中华日报南部版	1980年改制升格
新闻晚报	成功报	1956年易名《成功晚报》，1986年易为今名

① 吕光、潘贤模：《中国新闻法概论》，中正书局1956年版，第50—52页。

② 原以娱乐新闻为主的《华报》，以二三千万转卖了登记证。原为工人报的《大众日报》登记证也卖了数千万元。台中《台湾日报》的转让费超过2亿元。陈思莹：《违反潮流的报禁》，载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2页。

③ 彭明辉：《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88—89页。

续表

报名	原始报名	改为今名年份
台湾晚报	台湾民声日报	1985年易名《大众报》，1987年改为今名
青年日报	青年战士报	1985年改今名
自由日报	台东新报	1978年出售后易名《自强日报》，1980改为今名。《台东新闻》曾经8次改组，6次易名
现代日报	商工日报	1982年由国民党买下经营权后曾于1986年停刊，1987年改名复刊

限张

限张的起因同样由于战争和戒严。1937年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第27条规定：

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工作方法，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

国共内战再次导致物价飞涨，蒋介石政权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1947年2月，为节约外汇，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报纸缩减篇幅暂行办法》，将纸张列为限制进口的物品，并要求各报缩减篇幅。由于上海、南京是报纸集中之区，该办法特别针对性地提出，上海南京报纸，原有篇幅在三大张以上的，缩为三大张，其余依次递减为两张半或两张，原有篇幅在两张以下者，可自由缩减。

当时，台湾最大报纸《台湾新生报》，已因为纸张紧张缩减为一大张半，属于“可自由缩减”者，因此，上述办法对台湾报业影响不大。同年9月，政府颁布《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再次要求各报缩减篇幅：原来一张以上的缩为一张，原来在两张以上的不得超过两张。不过，该办法在台湾也没有确实执行。《公论报》1947年10月创刊，1950年便增至两张，《台湾新生报》到1950年底更增至两张半。

台湾光复以后，纸价开始飞涨。1946年3月，《台湾经济日报》创刊时，便感受到物价飞涨的压力。一令白纸价格涨至倍数以上，而原来收的报费无法另加，广告费也无法随行就市加以调整，致使报纸承受巨大压力。^①每份报纸，仅纸张费就需1元，加上其他费用，成本达5元，读者每月所付的报费却仅有50元，扣掉10元的贩卖费，报社虽有广告收入补充不足部分，仍须节省个人生活费用，方可维持。^②光复之前，台湾有16家日本人经营的造纸厂。1949年，国民党成立台湾造纸公司，独家生产新闻纸。1950年开始，当局又禁止外纸进口，包括各报自行购买外纸。^③1950年年底，台湾省政府以节约用纸的理由提出限张：“鉴于目前国内生产白报纸不足，仍需节约用纸，以及避免部分报纸垄断广告市场，并辅导各种类型报纸均衡发展起见，仍有必要暂为报纸限张措施。”1950年11月30日，台北市《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华日报》《公论报》《民族报》《全民日报》等六家报社发表联合启事，将报纸减为一大张半。《联合启事》称：

敝报等于十一月廿九日接奉台湾省政府……代电，以案奉行政院台卅九（教）字第六五一六号训令，以国际风云日益险恶，制纸木浆改做军用，纸张减产，纸价高涨，而台湾纸业公司报纸产量不敷新闻业之用，为使台湾宣传文化事业，不致因纸荒而陷入停顿起见，是不能不就减少消费，增加储备两方面，做通盘之筹划。其第一项规定各报应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减缩篇幅，不得以任何名义增加篇幅。敝报等自应遵办。自十二月一日起，一律改为日出一张半，特此公告。

此为台湾第一次限制报纸张数。1952年12月，“行政院”颁布“新闻用纸供应办法”，由各报自组用纸调查委员会调查分配，再由有关机关审核后定量供应。其第3条规定：“政府根据在台报纸杂志实际需要新闻用纸量，一次确定配纸总额，以后不再增加。”1955年4月，“行政院”决议酌

① 谢汉儒：《关键年代的历史见证——台湾省参议会与我》，唐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② 佛生：《新闻事业的困难》，《民报》1946年9月1日。

③ 《纸业公司生产近况》，《台湾新生报》1947年1月31日。

准新闻事业进口洋纸应用：“至于报纸篇幅，则仍基于战时节约用纸原则予以限制。”同时颁布“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限定除特别纪念日外，报纸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半，这是台湾地区报纸限张最重要的法令依据。^①

1958年9月，为因应民营报业的兴起，篇幅限制增为两张。1966年，台湾3家晚报扩为两大张，对日报形成新的竞争，加上《联合报》收购《公论报》，改名为《经济日报》，被其他报纸指为“变相的扩充篇幅”，均要求增为三大张。1967年4月，当局将报纸张数增至两张半。1973年年初，当局外汇充裕，限张政策不够严格，各报皆以广告量多寡决定出版张数。1974年，世界能源危机，当局重又限制各报不能超过三大张。1988年增至五张（表6）。

表6：戒严时期台湾限张、限证政策演变表^②

日期	法令/事件	内容
1950/11/30	各报联合启事	自十二月一日起，一律缩减篇幅，至多不得超过一大张半
1951/06/10	“行政院”令	从严限制登记（限证）
1952/04/09	“出版法”第四章第28条	纸张供应问题
1952/11/29	“出版法”施行细则第27条	限制报纸、杂志家数
1952/12/09	新闻用纸供应办法	
1955/04/21	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	
1957/09/01	第一次增张	两大张
1967/04/20	第二次增张	两大张半
1974/03/01（据《联合报》载，1972年已有报纸日出三张。此日期为报价调整时间）	第三次增张	三大张

报纸张数受限，但台湾民众的知识水准不断提高，工商经贸不断发展，对于报纸信息和广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读者批评报纸广告太多，侵占了

^① 程宗明：《对台湾战后初期报业的原料控制（1945—1967）——新闻纸的垄断生产与计划性供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6期，1999年12月。

^②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87—90页。

新闻版面；广告客户也指责报纸没有足够篇幅刊登广告。报纸经营者有苦难言。为了满足读者和客户的需要，各报采用发明了许多增加报纸容量的办法，除了减小字号（据说，台湾近视眼人口居世界之冠与此有关），“缩版”、“换版”、“分版”等技巧也应运而生，^①但仍然无法容纳各种资讯。这些资讯于是假其他媒介散播，这也是促使20世纪80年代台湾各式杂志纷纷问世、形成一股热潮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限印

限印是指限制同一份新闻纸在其他地点印刷出版。其依据为1952年“出版法”第9条^③及1937年“出版法施行细则”第6条。^④表面上，“出版法”并未限制同一报纸在他地出版发行，实际上，报禁期间，当局却不曾核准任何一份报纸在申请登记地之外的他方印刷或发行。台北的报纸不能在南部设立印刷所，南部的报纸也不可能在北部设立印刷所。因此，“限印”，乃是“限证”的必然延续。^⑤

当局实行限印的理由是，保护地方性报纸生存，使之免于大报的垄断竞争。不过，它也同时使得地方性报纸只能拘守地方一隅，难以成长为全国性大报。就经济效益而言，限印政策增加了报社运报的成本，因为限地限印造成资源浪费严重。以《联合报》为例，该报在1981年拥有运报车26辆，

① 缩版主要是指各报将分类广告所用字体照相缩小，原先每一版版面由上到下有20批，由右至左有110行，缩版后，由上至下可增至26—29批，由右到左增至180行，最多可增至195行，每天刊登的分类广告由此加多70%—80%。换版是指只在某个地区版刊登对该地区有用的广告，如以台北市民为对象的广告只在北部版刊登，同理，在南部有用的广告，也只刊登在南部版。由于在4个地区版（北部版、桃竹苗版、中部版、南部版）的同一版面，分别刊登只对当地有用的广告，广告量由此可提高3倍。分版则是指每天发行的报纸分成A、B版，每一版占发行数一半，在该版刊登广告的费用以全价65%折扣优待，使广告费用收入又增加了30%。1978年9月，《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将北部版分为台北市与市郊版，形成“一报五版”。王惕吾就曾总结，新闻报纸每日印行的统一规定，是报纸发展的最大限度限制，《联合报》在此限制下作了几乎不可能的突破，那就是印行各地地方版，增加每页的专栏数以及广告的换版。这使《联合报》的三大张篇幅，奇迹地扩充为十数张的内容。参阅王惕吾：《联合报三十年的发展》，联合报社1981年初版，第7页。

② 南民：《台湾的新战场——新闻与文化》，《九十年代》第206期，1987年3月，第39页。

③ 该条规定，登记申请书需载明“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

④ 该条规定，“出版业公司或书店另在他地设立分支机构者，或同一新闻报纸或杂志另在他地出版发行者，仍应依照‘出版法’第九条之规定办理登记”。

⑤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8年第2版，第56页。

平均每月消耗汽油约 6000 公升，柴油约 70000 公升，二者合计每年支出达 1400 万元。^① 从社会效果看，以法令限制区域报业发展，既破坏了市场竞争，也伤害了言论自由。

报禁的理由

从战时需要，到节约纸张，当局列举了种种实行报禁的理由。包澹宁总结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报禁有如下几大理由：报社家数已达饱和说、节约用纸说、战时需要说、避免恶性竞争说、他种印刷媒体代替说、历史背景说、“宪法”说或不等价说。^②

直到报禁解除后，曾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的楚崧秋还认为，报禁实施，虽出于行政命令，却不无合情合“法”之处。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在接战地区，当局可以调节民生物资。既如此，将报纸看做民生物资，当时觉得纸张不够，才有节约用纸的行政命令出来。从实际效果看，报禁还收到了言论比较不太复杂的效果。所谓言论不太复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很大一段时期，就没有哪一个提出要成立反对党”。^③ 由此可见，报禁表面上是对新闻纸的版面、数量、出版、发行地点等的控制，其实质内涵乃在于——对于言论控制。^④

报禁是戒严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从本质上说，台湾的报禁政策，是国民党威权主义统治在新闻制度上的反映。因此，要了解报禁政策的根源，需要对台湾威权统治进行分析。

第二节 大棒子加胡萝卜

三民主义报刊制度

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新闻传播从来不仅仅是新闻工作问题，而是政治

① 彭明辉：《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稻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8 页。

②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③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公司 1985 年版，第 104—105 页。

④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所有的新闻体制都体现了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为革命和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相应地实行三民主义的报刊制度。三民主义报刊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新闻制度。^①

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开始引进“党治”制度，也就是党国体制。北伐成功后，国民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宣布实行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统治。^②根据“党治”原则，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代表全体国民行使中央统制权，任何政治问题都应绝对根据党的主义、政纲和政策来决定，党随时监督政府。党的力量，即是全国国民的力量，即是领导政府的力量；党的利益，即是全国国民的利益，即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党国一体的体制下，党权等同国权，甚至高于国权。党权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③与此相应，三民主义新闻政策则是“党治”理论在报刊领域的具体运用，其目的是要确立三民主义“党义”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和新闻统制政策进一步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战争的军事需要，但由于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舆论监督缺位，民意不伸，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民主生活。在国内政治方面结下无限恶果，最显著的就是贪污盛行，政治腐败。^④在国际政治方面，则造成外国驻华记者和新闻检查官员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导致美国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失望。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也曾出现一股改革呼声，^⑤但形势的发展没有给它这个机会，最终在两党内战被共产党所败。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国民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在战后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中具有关键地位。^⑥

①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页。

② 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

③ 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④ 曹增祥：《中国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概论》，燕京大学学士毕业论文（194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⑤ 吕芳上：《痛定思痛：战后中国国民党改造的酝酿》，载《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史馆”2000年版，第571页。

⑥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湾大学2005年版，第265页。

威权——侍从体制的建立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立未来的方针政策，提出进行党的改造。1950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修正通过蒋介石交议的“本党改造案”，决定采用“民主集权制”，试图将国民党的政策透过民意机关与在当局服务的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和命令。依据《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党对民意机关和当局的关系，以组织指挥党员的原则，分别建立民意机关和当局中之党部、党团或政治小组，使其遵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命令，贯彻党的主张。^①同年8月5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作为中央政策最高决策机构。随即拟定四项“当前急切工作要领”，其中第四项为：“确立党政关系，做好地方选举工作，培养政党政治风气。”国民党改造，旨在为其党国体制的威权统治纳入民意，事实上是以其全面性组织支配民间社会的优势，利用地方派系的大众政治控制机制，即以党国精英（政治精英）、地方派系、地方选民三者间的二重侍从主义机制，也就是以“恩庇——依随二元联盟关系”（patron-client dyadic alliance）来完成对政治社会体系的动员与控制，使国民党政权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并柔软地克服在台湾社会的孤立，进而存续“疑似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②由于戒严令的实施，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因而又表现为一种“军事的——威权侍从体制”。^③

从时间发展上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可以蒋介石父子掌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比较而言，前20年蒋介石的统治是一种“刚性威权主义”，主要特征是白色恐怖；后20年蒋经国主政，推行本土化政策及行政革新措施，逐渐驯化成“柔性威权主义”。由蒋介石到蒋经国，台湾的威权统治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威权”转变成“发展型威权”的过程。^④与此相应，有学者将战后台湾新闻史划分为蒋介石硬性威权统治（1949—1972年）与蒋

① 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中正书局1986年版，第66—67页。

② 若林正文：《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3页。

③ 杭之：《迈向美丽岛的民间社会》（上），唐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④ 林丽云：《台湾传播史研究：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9页。

经国软性威权统治（1972—1987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威权重组期（1949—1960年）和威权控制期（1960—1972年）。后一个时期也分为两个阶段：威权危机期（1972—1979年）和威权体制分化期（1980—1987年）。^①

“枪杆子”加“笔杆子”

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的军事独裁政权。^②只是，权力的高度和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军政特警等“国家镇压机器”来维持有效统治，与其说表明了该政权的强大，不如说暴露了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③因此，国民党政权在以“枪杆子”镇压内部造反或抵御外部侵略的同时，始终不忘记抓“笔杆子”，企图让被统治者对于既有秩序的效忠消融于日常意识中而不自觉。^④于是，该政权自成立伊始，便努力推行一套以党义为标准、以积极宣传和严密审查软硬两手政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统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①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91—110页。

② 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③ 王奇生认为，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以之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嫁接一体，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某些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依据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即一方面依照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连陈果夫也感到苦恼：“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因此，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但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更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它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360—361页。家近亮子也认为，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最终之所以在大陆失败，基本原因就在于其权力渗透不够。南京国民政府经常在“应采取的政策”与迫于政治现实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中间摇摆不定；面临这样的选择，其内部的意见往往形成对立。参阅〔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译：《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④ 李金铨：《从威权控制下解放出来——台湾报业的政经观察》，载朱立、陈韬文编：《传播与社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1992年版。

的，由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一种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挟持着现代政党组织的力量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①

同样，在台湾统治期间，国民党为了合法化其统治，并稳定其统治基础，仍不能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军政特警等“国家镇压机器”，而必须辅以新闻文化教育各领域的“国家意理机器”，以教化人民，并赋予其统治正当性。^②因此，建立了一套“国府代表自由与正义，继承中华文化的道统”的道德论述，^③并透过大众媒介以巩固其意识形态霸权，对报业采取一种既镇压又笼络、赏罚分明的双轨策略，除了用棍子管制，也运用胡萝卜收编侍从报业。一方面，当局透过制定“法律”及行政命令等外在力量来干预媒介的运作，对于异议性言论，进行压制；同时，党政机关又通过文工会等，扮演指导辅助性角色，对公私营媒介进行干预或影响——以这种介入市场运作的方式，有效影响媒体在言论市场中的行为，防止政治异议人士进入媒体，达到宰制新闻、政治压制的目的。^④国民党渗透民间各个部门的方式，是运用了统合主义策略，既以“硬式支配”的强制方式，由上而下扶持行政部门所成立的团体，并排斥各部门自主性的组织，又透过政党动员进行“软式支配”。^⑤从统合主义的角度看，国民党对于大众媒介的干预亦同于对工商业的干预，是透过各种所谓民间团体身份的新闻及传播团体进行统合。例如，“中国新闻学会”乃是国民党新闻党报的另一形态，国民党文化工作会可以透过新闻学会与各大媒体负责人“沟通”；“中华民国”新闻评议会，作为新闻传播事业的“自律”性团体，其使命为针对各新闻机构的新闻报

①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9—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② 陈顺孝：《新闻控制与反控制——“纪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五南文化2003年版，第72页。

③ 林丽云：《台湾传播史研究：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71页。

④ 陈师孟等学者认为，戒严时期台湾的政经社会属于“党国资本主义”，其经济结构呈现四层：最外层是“自由经济”的外套，允许市场运作与私人经济活动，31家报纸可以自由竞争；内穿“资本主义”的内衣，报业商业竞争优劣，仍取决于资本多寡；脱去衣物后是“国家主义”身躯，党政军一体的利益结构，握有压倒性的资源；内藏一颗“集权主义”的心，控制报业、控制舆论。陈师孟等著：《解构党国资本主义》，澄社1992年版，第23—24页。

⑤ 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1950—1952）——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中正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道、评论及广告进行评议，可是，其成员亦与党政高层人士关系密切，实际上，国家机关正是透过此组织对于媒介表现进行“他律”。^①

相对而言，在蒋介石的刚性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于报业的控制方式主要为强硬方式，包括“制定法令宰制媒体”（实施报禁限制报纸经营、以“出版法”管制出版品、以“戒严法”限制言论自由），“授权军政新闻监控与取缔”（情治单位对新闻人员的外部控制、警备总部的新闻取缔），手段上包括整肃异议媒体、迫害异议媒体记者、保障公营媒体、收编民营报业等。^② 蒋经国的柔性威权主义时期，则主要借由威权机器掌控媒体所有权与经营权，或示惠新闻事业，或透过新闻指导及消息来源的优势影响媒体内容，包括“太上编辑部”式的“事前指示”和“事后检查”、党政人事控制等软性措施。^③

从第四组到文工会

报禁期间，台湾国民党威权统治结构中，负责管制新闻言论的系统主要有三个：一是“行政院内政部”以下的行政系统，依据“出版法”审核报纸杂志的言论；二是警备总部以下的军事机关，依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报刊杂志的内容加以限制；三是国民党系统对新闻言论的控制，有时透过行政体系，有时又以党的身份引导舆论走向，或限制刊物发售，游走于法规之间。^④ 三个系统中，实际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事机关，而理论上的最高主管者则是党的相关组织。

1950年，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专门设置第四组，接管过去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负责制定或推动新闻政策，成为国民党负责新闻及言论政策最后的决策单位。第四组主要职责有三项：“宣传工作之指导”、“党义理论之阐扬”、“文化运动之策划”。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 “颁发宣传通报”，也就

① 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风云论坛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② 国民党收购民营报业的著名案例包括《公论报》《台湾日报》《工人报》等。其经过情形，参阅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2010年版，第83—90页。

③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91—110页。

④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是“宣传指示”，分析研究各种问题，给予言论界正确立场与观点；2. “取缔反动刊物”，第四组邀同各有关单位，成立报刊杂志审查会，调查、审查书店出售书刊，并将反动书籍编成书目；3. “报刊之指导”，注重事前联络新闻界，每遇重要事件，必先举行记者座谈会，一方面传达中央意见，另一方面听取新闻界之反映，集中意见，统一言论；4. 新闻政策之检讨。^①

1952年，国民党成立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组工作重点变成新闻政策制定与实施机制拟定。蒋介石经常亲自主持宣传会议，领导党政主管宣传的相关党员，研讨宣传方针。1954年9月18日，国民党成立宣传指导小组会议，为蒋介石主持的宣传会议作预备。第四组实际所掌控的新闻业务，包括核准报刊杂志发行、配纸、取缔新闻言论、新闻人员教育等。^②

因为隶属于党务系统，第四组事实上并不是集中事权统一领导的新闻政策机构，它也缺乏明确的新闻政策。^③曾任第四组主任的陶希圣，曾提议设置新闻政策讨论会。1961年7月，阳明山会议期间，发生墺公圳分尸案等命案和一连串舞弊案，国民党中常会对社会新闻、犯罪新闻进行了专门讨论。此后，第四组提出“改善犯罪案件报道之新闻政策纲要”，要求主管机关严格依照“出版法”加强审查，并希望利用座谈会、小组会议和个别晤谈等方式，与新闻从业人员沟通观念，并策动新闻界推举社会公正人士、法界权威及新闻学者组织新闻评议会，对报纸的言论与报道进行常规化审议，逐渐将当局的纪律隐形化为报业的“自律”。

20世纪70年代后，蒋经国接掌政权，当局进一步改进对于媒体的控制，多以新闻指导（或协调）方式代替强硬的干涉。1972年，第四组扩编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负责文化及宣传工作之指导。文工会最初设立4个业务室，后来扩增至8个。其中第1室负责舆论指导与新闻联系，第3室负责广电传播事业之指导，第5室则负责各种书刊杂志出版之审查。

^① 乔宝泰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资料汇编（上）》，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讨》，转自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③ 李瞻：《我国新闻政策》，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75年版，第63页。

“太上编辑部”

第四组和文工会，经常透过正式的行文、非正式的聚会或以直接电话的方式，针对某些敏感的议题指示各媒体负责人处理原则。警备总部有时也举办新闻背景说明会，指示新闻处理原则。这些原则指示，有政策性的指示，也有技术性的建议，不仅是报禁期间媒体处理重大新闻的标准，也成为新闻人日常作业的准绳，因此，第四组和文工会被报界称为“太上编辑部”。只要有了事前指示，报纸没有刊登新闻的自由，也没有不刊登的自由。^①

1951年，当局颁布“报社及记者处分原则”，该原则规定：“中央”各机关有关重要政策性及国际性新闻，统一由当局发言人办公室发布，一般新闻由中央通讯社发布，军事机关的新闻则由“总政治部”发布，省政府所属机关新闻，由省政府新闻处发布。各通讯社和报社所采访的涉外新闻，应向当局发言人办公室证实后，再行发布。各机关所发布的新闻，由各发布机关负责，各报自行采访的新闻，由各报自行负责。遇上国民党召开全会等重大会议，由中央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处理大会新闻工作，负责协调记者采访与新闻发布工作，而主席谈话、决议案等还必须经达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审核。^②

根据这一规定，党政重大新闻只能由中央社发布。权力大，意味着责任也大。因此，该社对新进记者上的第一堂课，往往是告诉记者其职责是采访报道文工会审核过的新闻，千万不可自己认定什么是新闻。新闻能不能发，发到什么程度，都是核稿人的责任。审核的结果，才是记者更关心的。事实上，往往新闻性愈高的新闻，记者失望愈大。听到“不发”的命令，像被判了死刑。最经常接到的指示，则是所谓“淡化”处理。简单两个字，含有无限技巧、玄机和无奈。^③ 1977年中坆事件，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中央社记者都在现场采访，也作了完整报道，但是均不能立刻发稿。像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文工会一定会以正式的行文，或以直接电话的方式，向中央

① 王晓寒：《白色恐怖下的新闻工作者：兼谈人生的甘苦》，健行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7页。

② 黄肇珩：《记者》，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26页。

③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33页。

社以及各大报下达新闻处理意见。如果希望以社论或专栏方式配合政策，通常会直接与《中央日报》董事长或社长联络，至于新闻报道的角度，则会与总编辑、采访主任或线上记者直接联络。对于这些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中央日报》大都是“全盘接受”。民营报刊虽然不一定全盘接受，却也不敢违背。曾任《自立晚报》社长的吴丰山说：

国民党文工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不找我，因为我不是党员，找我就碰钉子，但是会找报馆其他党员。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去开会很好啊，了解背景回来告诉我”。所以这情形我大部分都知道，通常就是说明国民党的观点、立场，对事情提出说明，最后就是拜托往他们所希望的一个方向处理，他们认为那是政府的利益，通常是这样一个模式。^①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访美时遇刺。对于该新闻的处理，当局态度犹疑反复。著名记者欧阳醇在与友人通信中说：

25日凌晨一时台北已收到外电，深夜无法请示，日报都不敢照发。到25日上午，起先晚报也不能登，到11时又说可。中央社乃发出可以见报的新闻稿，各晚报都据以刊登，可是到中午十一时，又传出不能刊的指示，各晚报又收回消息，延到下午三点再次说可以，唯需以中央社稿为准。25日晚，龚声涛（国民党第四组总干事），电话各报不能渲染，所以26日各报都是中央社的消息。^②

1972年，尼克松访华，文工会下达三点指示：不能刊登照片，不要自译外电，不许作头条新闻。1975年双十节，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在家中被一枚邮包炸弹炸伤，有关单位规定新闻只能使用政府机关发布的“通

^①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80—82页。

^② 续伯雄辑注：《台湾媒体变迁见证：欧阳醇信函日记（1967—1996）》，时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稿”，全文为：

[本报讯] 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于10日下午2时许，在家中拆阅书报时，左手受伤，蒋院长亲往探视慰问，谢主席伤势正在由医生细心诊治中。

明明是有人行凶，新闻报道却极尽委婉，乃至令读者莫名，其“淡化”处理，实在无法再“淡”了。

新闻工作会谈

依据“出版法”规定，“内政部”为出版品的最高主管机关。但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部”事实上对出版品有极大管理权限。加上广播、电影又由“交通部”等部门管理，新闻文化事业因此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1963年，为了“协调各方步骤，发挥统一的力量”，第四组邀请三军“政治部”、“作战部”主管、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和新闻宣传有关的国民党党员，召开新闻工作会谈。此后，至1978年，先后举办了五次新闻工作会谈，主题都是传达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并对新闻从业人员提示党的新闻规范，希望媒体配合党的文宣政策。这五次新闻工作会谈的内容要点如下（表7）。

新闻工作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成立新闻党部。1964年8月，新闻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首先在台北各大新闻机构、《中华日报》南部版等单位设分党部，将各单位国民党新闻从业人员纳入组织；然后将该党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全部纳入；直到各县市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分部组织完成，新闻党部即正式成立。通过成立新闻党部，国民党借此直接渗入媒体，逐渐控制新闻产制过程。^① 1978年第五次新闻工作会谈中，更明确提出：

新闻工作者应该全力支持并协助主管当局，积极加强思想武装，导正分歧观念，以扫除一切赤色的毒素，黑色的原罪、灰色的污染、桃色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第二次新闻工作会谈实录》，第75页。

的戕害，并以“增进团结，反对分化”、“崇尚法治、反对暴利”、“诉诸理性、反对偏激”……作为新闻报道评论、节目制作之基本态度与立场。^①

由此可见，所谓新闻工作会谈，并非双方对等的会谈，主要还是官方训导新闻界，向后者宣导政令^②。

表 7：五次新闻工作会谈内容要点表^③

次别	时间	主要内容
一	1963. 4. 16	1. 巩固国民心防，配合反攻情势案；2. 加强国际宣传工作方案；3. 加强新闻从业同志之组织关系案；4. 积极推行新闻自律运动案。
二	1964. 11. 5	1. 发挥大众传播力量以促进社会心理建设案；加强精神武装巩固国内心防，以促进社会心理建设案；2. 加强海外及国际宣传，促进反共团结案；3. 加强新闻与文艺工作合作，以扩大文艺战斗功能，促进反攻大业案。
三	1969. 6. 24	1. 如何扩大新闻评议委员会组织，以履行新闻事业社会责任案；2. 如何防止新闻工作者滥用职权图利，以提高新闻事业之品格案；3. 如何强化军中宣传工作，以鼓舞民心士气案；4. 如何加强“匪”情报道，借使“国内外”人士对当前“共匪”混乱情势，及其即将崩溃命运，有正确认识案；5. 如何加强“国内外”新闻界之联系与团结，以充分发挥联合作战之功效案；6. 如何群策群力，加强国际宣传，以争取国际人士对我“反共复国”之同情与援助案；7. 如何发挥舆论功能，促进政治革新案；8. 如何加强宣扬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达成文化复兴之目标案。
四	1974. 4. 7	1. 如何弘扬立国精神，确立三民主义新闻政策，以达到“复国建国”之目的案；2. 如何动员新闻事业，推动整个社会，发挥全民力量，支持“国家”九项建设，并借以转移风气，激励人心案；3. 如何配合有关机关，掌握大陆敌情变化，适时对“匪伪”之重大暴政及阴谋策略，从“国”内海外及大陆予“匪”以有力打击，并加强对内心防教育案；4. 如何发挥新闻之编采，评论工作效能，以促进新闻事业健全发展，加强维护国家利益案。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编：《第五次新闻工作会谈实录》，第 112 页。

②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2 页。

③ 倪炎元：《威权政体下的国家与媒体：南韩与台湾经验之比较》，《东亚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1995，4）。

续表

次别	时间	主要内容
五	1978. 11. 6	1. 积极发挥大众传播事业之功能, 以加强全民团结, 革新社会风气, 建设现代化国家, 贯彻“国家”目标案; 2. 发挥新闻传播功能, 加强对“匪”文化作战, 以彻底粉碎“共匪”统战阴谋案; 3. 发挥大众传播力量, 增进民主教育功能, 弘扬民主法治精神案。

掌控新闻从业人员

除了成立新闻党部, 台湾省政府还规定, 新闻记者必须加入工会, 并且规定加入哪个工会。报社新进人事任用, 往往要先通过“情治部门”的忠贞检查。新闻组织高层人事任命, 尤其要得到党国体制的认可。例如吴三连入股《自立晚报》, 有关方面即指定前《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接任社长。新闻党部成立后, 连民营媒体的编采主管人事也多由忠贞国民党员担任。1985年调查显示, 台北市8家报社记者中, 国民党籍占了77.6%, 父亲职业属军公教者占47.4%。1992年, 一项针对台湾报社总编辑的调查显示, 报社总编辑典型面貌是: 46岁左右的大陆省籍男性, 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出身中等社会阶层的家庭, 父亲是大专毕业的军公教人员, 母亲是中学毕业的家庭主妇。^① 总之, 在威权主义统治下, 当局掌控记者的方法除了意理教化、法令限制、检查取缔、编辑指令、威胁囚杀等多种软硬不同的方式之外, 严格的人事控制也是其重要的基本一环。^②

宰制媒体的法令

制定法令管制新闻出版自由, 是威权主义宰制媒体的最主要控制方式, 也是其新闻政策的中心内容。

管理新闻出版最重要的法令是“出版法”及其实施细则。国民党政府

^① 杨志弘:《台湾地区报社编辑部主管人口背景与管理型态之研究》,《传播管理学报》第2卷第1期。

^② 陈顺孝:《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五南文化2003年版,第105—108页。

第一次制定公布《出版法》是在1930年12月，此后直到1999年废止，期间在1935年、1937年、1952年、1958年、1973年及1997年先后6次修正。每次修正都是进行内容调整，并无实质改变。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由于“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始终在“行宪”与战时体制两者交错的情形下运作，不同时期颁布的新闻出版法规除了重复和含糊，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致规定当局有权控制和审查新闻，因此违背了“宪法”。^① 同样，报禁时期台湾新闻管制政策的演变，特别是有关规定的变化，其显著特征也是为了强化对于新闻的控制。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及出版之自由。”但是，在党国体制下，当局可以依据公众利益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使“宪法”11条成为但书。^② 1930年12月颁布的《出版法》第19条第1、2项便规定：出版品不得刊载“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以及“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等内容，其以“意图”定罪的做法，曾招致舆论的强烈批判。^③ 此后，1931年10月颁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更是呈现出党政一体与党政双向并行的特质。^④

1949年，台湾省警备总部根据《戒严令》，制定公布了“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成为戒严时期警备总部管制新闻言论的主要依据。其第2项规定：

凡诋毁政府或首长，记载违背三民主义、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散布失败投机之言论及失实之报道，意图混淆人民视听妨害戡乱军事之进

①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37页。陈翠莲认为，台湾戒严时期长达38年，在勘乱戒严体制下，施行军事统治，“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参阅陈翠莲：《台湾戒严时期的特务统治与白色恐怖氛围》，载张炎宪、陈美蓉主编：《戒严时期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论文集》，台湾历史学会、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9年版。

② 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0页。

③ 张仁善：《国民党政府出版法的滥施及其负面影响》，《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④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行或诲淫诲盗之记载影响社会人心秩序者均查禁之。^①

法令中以“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挑拨情感”模糊不清的规定，给予当局无限的解释空间，也使1930年版《出版法》中为人诟病的几条条文——“意图损害公共利益或破坏社会秩序者”、“违反三民主义”、“妨害本国元首”等，得以借尸还魂。

1952年，当局颁布实施新修订的“出版法”。与1947年的修正草案相比，新“出版法”的最大变化是，增加“出版之奖励与保障”一章，禁载事项有所简化，^②删除了“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等规定，并将“意图”修正为“触犯或煽动触犯”。但是，第9条新闻纸杂志登记需说明“发行旨趣”，成为后来当局处分报刊杂志的理由之一。^③同条限制印刷地点需在发行区内，则成为“限印”政策的根据之一。第28条“出版品所需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主管官署得视实际需要情形计划供应之”，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出版法施行细则”第27条——“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工作方法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更是“限张”、“限证”政策的重要来源。

“文化清洁运动”

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报禁政策是服务于其在台湾威权统治的产物。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霸权，需要不断清除歧杂的声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台海局势，台湾安全得到保障，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吴国桢、王世杰等

①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制办法》（1949年5月28日），载杨秀菁、薛化元、李福钟主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七）：新闻自由（1945—1960）》，“国史馆”2002年版，第364页。

② 主要包括：1. 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内乱外患罪；2. 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妨害公务罪、妨害投票罪、妨害秩序罪者；3. 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褻渎祭祀罪或妨害风化罪；4. 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

③ 据陶百川回忆，以“违反发行旨趣”的罪名，作为查禁的理由，始于“内政部长”王德溥（1954—1958年）在职的时候。1958年，因违反发行旨趣予以报“部”停刊者五种；1959年，因违反发行旨趣而报“内政部”予以停刊者，计有六种。陶百川：《困勉强猊八十年》，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40页。

被迫请辞或遭到免职，原来拥蒋的自由派也完全和权力核心疏离，当局对于言论的整肃和控制也变得更为严厉。

1953年7月，“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修正本）”颁布。“修正本”对出版品的禁止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包括：“未经军事新闻发布机关公布属于‘军机种类范围令’所列之各项军事消息、有关国防政治外交之机密、为‘共匪’宣传之图书文字、诋毁国家元首之图书文字、违背反共抗俄国策之言论”等等。^①

1954年7月，台“中国文艺协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扬言要扫除文化界里隐藏的“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所谓“黑色的罪”，事实上包括新闻界的扒粪者，被指为“某些不肖新闻工作者”，其揭露社会黑幕的调查性报道，也被污名为“专门揭人疮疤，或捕风捉影、捏造事实”；“赤色的毒”，无疑是指蕴含共产思想的读物；“黄色的害”，则被用来指代所谓伤风败俗的内容。

同年11月，“内政部”颁布“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是为著名的“九项新闻禁例”，除了“有关国防政治外交之机密”和“为共匪宣传之图书文字”等，还加入了对“黄色新闻”的查禁，如：“夸大描述盗匪流氓等非法行为而有海盗作用者”、“描述自杀行为而有助长自杀风气之虞者”等，引发了包括《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中华日报》三家党营公营报纸在内的新闻界的共同反对，“内政部”不得已宣布“暂缓实施”。

“文化清洁运动”和“九项新闻禁例”的公布，是国民党新闻政策由宽转严的第一个转折点。1955年蒋介石于孙中山纪念月演讲中说：

原来自由是应该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言论自由亦复如此。对于刊载不正当的报刊，政府依出版法规定，予以定期停止发行的处分，是合法、并且合理的措施。否则诲淫诲盗，甚至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任其发表，则腐蚀民心，扰乱秩序，其后果必致其不堪设想。

^①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修正本）”（1953年7月27日），载杨秀菁、薛化元、李福钟主编：《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七）：新闻自由（1945—1960）》，“国史馆”2002年版，第387—388页。

1958年2月，蒋介石亲自主持宣传座谈会时，再次强调：

现在在台的一切反党、反政府、反民众利益、反国家需要的言论和出版物，更应有一个具体办法，决不能长此放纵姑息过去，否则养痍贻患，终有噬脐莫及的一日。^①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内政部”对“出版法”进行修正，并将其草案交“立法院”，秘密通过，报界一致表示激烈反对，下文将专门论述。但是，在蒋介石的硬性威权统治时期，所谓“依法”统治，至多是给白色恐怖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白色恐怖

蒋介石退台后，为使政权能在台湾“和缓着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方面，让“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率领技术官僚执行社会经济改革外，也同时让长子蒋经国统率特务建筑“地下小朝廷”，委以政治“里层”监视“表层”——孙立人事件与吴国桢事件都是对陈诚最大的警告。在威权体制重建时期，台湾社会在军警特等“国家”机器的严密控制下，充满了白色恐怖。^②

早在1949年1月5日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就职记者会上，他就宣布将以“杀头”警告“不法”。《扫荡报》记者萧枫在杂志上发表一篇《与陈诚谈杀头》的文章，引起陈诚不悦，公开怒斥。后来，萧枫曾离奇失踪一阵子，从此态度转为低调。1949年4月，由于不满警察殴打本校学生，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学生集会要求惩凶。6日，陈诚下令军警包围台大与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逮捕多名学生，其中有学生后来被枪决，是为“四六事件”，象征着战后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序幕的开启。

1958年5月15日，台湾警备总部成立，隶属“国防部”，被授权执行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总裁重要号召及有关宣传问题训示集要（增编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4年版，第238、248页。

^②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93页。

“戒严法”，承接过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工作。在“戒严法”授权下，警总拥有指挥“司法”与行政官权力，同时掌握了对异议言论的整肃权。^①修正后的“出版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径向出版品采取警告、罚款、禁止出售、扣押、没入、撤销登记等处分，而不需经“司法”程序。警总大权在握，政工人员横行，角色凌驾于“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文工会之上。^②如果说国民党文工会是报社的“太上编辑部”，那么，“警总就是新闻的主宰”。^③

在警备总部业务中，“总政治作战部”六处专门负责文化审检。1951年，警备总部制定的“台湾省政府保安司令部检查取缔违禁书报杂志影剧歌曲实施办法”，规定保安司令部、市府人员、警察人员于突击检查与执行一般勤务时，均有权取缔违禁刊物。警总要求各县市成立检查书刊小组，由教育科、警察局和社会科成员组成，警察局长兼任组长。1967年，“县市书刊检查小组”改名为“各县市文化工作小组”，市政府由新闻主任担任小组长，县政府指派秘书一人担任小组长，后来曾改由县市首长、县市警备分区指挥部指挥官担任。

对于发表异议言论的报刊，警总可采取命令改组或“管训感化”，也可以“叛乱”、“匪谍”罪判处责任人徒刑。涉嫌为中共作正面宣传、诽谤“国家元首”、煽动当局与人民的敌对情绪、违犯反共“国策”的言论和著作，均可以煽动叛乱罪处以死刑。白色恐怖下，新闻工作者人人自危，社会一片寒蝉。

① “戒严法”第11条规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一、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上述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必要时并得解散之。二、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动有碍治安者。三、对于人民罢市罢工罢课及其他罢业，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四、得拆阅邮电电报，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之。五、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车辆航空机及其他通信交通工具，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并得遮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

② “立法委员”康宁祥曾质询“新闻局长”宋楚瑜，“混淆社会视听”是什么意思。宋推说“新闻局”从未以“混淆社会视听”没收出版物。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55页。

③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50页。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警总

警总人员和特务无所不在。警总人员有时明目张胆地到报社监督记者写稿或审读新闻，至于派到报社卧底的“明桩”、“暗桩”，更是防不胜防。有时报纸还没印出来，警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显然是有“内线”通报。戒严环境下，几乎所有媒体里都有很多帮安全单位工作的人。按照惯例，各报“内线”均由“调查局”里派人“布建”，但在《联合报》，据说沈之岳经常让王惕吾自己挑选。^①

雷震等人估计，1960年全台湾从事监控的人数至少达到12万，占当时15至64岁人口总数的2.14%，此外还有很多被强制、收买或自愿而来的“线人”。据《纽约时报》推测，加上“线人”在内的特务人数可能达到55万，相当于15至64岁人口总数的8.9%。^②“调查局前副局长”高明辉则透露，1981年，仅“调查局”就有3万监控人员。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包括潜伏在新闻组织内部，以及被收买的记者。《征信新闻》编辑吴博全有一次在报社编辑部发现有人在偷看同事的信，见状大骂：“大陆就是被你们这种王八蛋搞丢的，现在又搞这一套。”马上被告发，坐了两年牢。^③

在特务的种种监控下，新闻界一片风声鹤唳；新闻工作者则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司马文武回忆说，记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党外的政治人物讲话，见面，得到什么消息，回去只要写报告给安全单位，都会有奖金。报社里的人，若跟党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点，就会被贴上标签。有时，记者在写文章的时候，里面偷偷藏些讽刺的隐喻文字，虽是一些小动作，第二天刊出后，等着有关方面的反应，如果没事，就会有一种偷渡成功的乐趣。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谨慎下笔，自我约束，以免被约“悬谈”或“喝茶”。某杂志编辑，曾因为被某机关请去“悬谈”，竟将印刷起来的纸面的一部分，涂以“墨杆”。^④有一年10月1日，《台湾时报》副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有一行字被拿掉，换成“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报社在上午五点多发现，立

① 叶邦宗：《报皇王惕吾》，四方书城2004年版，第193页。

② 若林正文：《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19页。

③ 戴独行：《白色角落》，人间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④ 社论：《本省言论有无自由》，《民报》1946年9月14日。

即将所有印刷机暂停，结果还是有少量报份送出。警总认为一定有“匪谍”，派人到报社坐镇清查。查了一个多月，原来是一名工人为了私仇，利用职务之便篡改文章，嫁祸于另一个工人。后来这名工人被关三年多，左腿被打断。另有一次，几位记者在家打麻将，警总听到麻将声，敲门盘问，一位同事当场吓得晕倒。^①

白色恐怖之下，“人人心中有一个小警总”。^②自由记者在当时无法被忍受。束缚不一定源自党国体制或报社内的压力，而是来自当时整个新闻界和政治环境气氛。记者若抱着挑战心态挖新闻，往往会产生双重挫折，或者挖不到新闻，或是被别人利用。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胡适那种“胆小的君子”，已经难能可贵了。^③于是，大家转而以沉默和隐遁消极抵抗。久而久之，互不信任和阳奉阴违的社会风气很快蔓延，奉承和追随得志权贵者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统治者而言，白色恐怖政策的最大作用，乃是无需对每个人进行迫害，就可使全体被统治者完全屈服。^④

文字狱

白色恐怖时期，警总的日常作为之一便是大兴文字狱。诚如论者所言，书报审查“是国民党用来抵抗反对派的批评却不必答复他们责难的武器”。^⑤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二条规定：“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著及匪伪之出版物一律查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大陆的文化统战，但此政策如果执行得偏差的话，“不仅损伤文化命脉，妨碍学术自由，更进而造成整个文化、思想乃至政治界的畸形禁忌”。

在这一苛严的规定下，许多与时政完全无关的纯学术著作也被列为禁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52、425—426页。

② 黄富三：《台湾地区戒严政治事件五〇—七〇年代文献辑录：美丽岛事件》，台湾省文献会2011年版，第11页。

③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66—67页。

④ 陈芳明：《已归与未归的望乡人》，载陈芳明：《危楼夜读》，联合文学1996年版，第281页。

⑤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29页。

书。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陈寅恪的《论再生缘》、熊十力的《原儒》、陈垣的《佛教典籍概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被列入“匪统战书籍”。^① 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留在大陆的五四运动后的知名作家，他们的著作、翻译书籍也都被列在查禁范围内。就连金庸、王度庐等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某些反共文学，如孙陵的《大风雪》等，也都被查禁。有些从大陆迁到台湾的作家，在大陆时期所撰写的书刊，像郭良蕙的《心锁》，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乡土文学作品，像吴浊流的《无花果》、陈映真的《将军族》等，全都被查禁，禁忌无所不在，报人动辄得咎，触犯理由有时简直令人啼笑皆非。1949年11月8日晚，《时报杂志》发行人童轩荪被检举与“匪谍案”有关，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查无罪证，结果以搜查得到的一本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理由是“马克·吐温与马克思可能是一家人”。1950年11月17日，《自立晚报》副刊《万家灯火》因转载一篇文章《草山衰翁》，被指影射蒋介石，被处以“永不复刊”的处分，主编吴一飞被捕。次年9月才复刊。1967年9月，《经济日报》刊登执政党与“立委”在非正式聚会中就琉球主权问题交换意见，被以“违反宣传指导”罪名“停刊四天”。

1963年4月23日，《联合报》副刊刊登王凤迟的诗《故事》，诗中写道：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至于迷航海上
船只飘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① 沈光华：《破坏学术自由的禁书政策》，载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由于她的狐媚和谎言致使他迷惘
她说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起航
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

她曾经表示要与他结成同命鸳鸯
并给他大量的珍珠玛瑙和珠宝
而他的须发已白，水手老去
他却始终无知于宝藏就在他自己的故乡

可惜这故事是如此残缺不全
以致无法告诉你以后的情况

诗作刊登后，“总统府”亲自打电话过问此事。此后，作者王凤池被情治单位以“匪谍案”论处，罪名是：“影射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政府反攻大陆无望的论调，打击民心士气，无异为匪张目”，被关押3年。副刊编辑林海音在刊出诗作的第二天，被迫离职。^①此后13年中，台湾各种报纸副刊均不敢刊登新诗。一直到1976年，《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才重新刊登诗作。

1968年，发生著名的柏杨案。柏杨本名郭衣洞，本为跟随国民党来台的流亡学生，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曾写作脍炙人口的《异域》一书，描述滇缅孤军的血泪故事，轰动一时。柏杨在专栏中曾不时对时政提出批判，早已引起情治单位注意，最终导致“大力水手案”发生。^②

① 王润华：《重新解读〈联副〉的“船长事件”——台湾戒严时期被判“叛乱”罪的一首现代诗》，http://www.njucml.com/news_detail.asp?id=958。

② 事情起因于柏杨的妻子倪明华在《中华日报》兼职翻译漫画《大力水手》。1968年1月3日，《中华日报》家庭版刊登的漫画为柏杨翻译，内容是大力水手与小孩的对话，父子合购一岛，竞选总统不相让。柏杨模仿蒋介石口吻，将“follow”译为“全国同胞们”，译文中还有“我是国王，我是总统，我想是啥就是啥”等对白，被警备总部认为影射蒋家父子，打击“国家领导中心”，污辱“国家元首”。“调查局”约谈，结果以柏杨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未向有关机关自首，在台进行文化统战”为由，判处徒刑，下狱七年。

逮捕、判刑、失踪

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批报人因言贾祸。1949年3月，受台大“四六事件”牵连，《新生报》副刊“桥”主编史习枚、《经济时报》记者董佩璜、《中华日报》记者董大江等新闻人员被捕。

1949年11月，《民声日报》总编辑黄胤昌、编辑唐达聪、陈正坤、林宣生，被控利用报社及学校宣扬“匪党毒素”，分处有期徒刑10年。黄胤昌在狱中又被控组织同犯准备暴动而判死刑，被枪毙。其同案黄鸿基被判刑7年，黄耀钦、郑文导、柯荣华、张南雷、丁静、古若贤、赵笃先等人被判感训。

1951年，美国在台设立军事顾问团，首任团长蔡斯抵台第一天在机场被盗。5月13日，《大华晚报》因刊登独家新闻，报道警方破案的消息，总编辑薛心谿被保安司令关了10天，提供新闻的刑警被判了几个月徒刑。

1957年5月，《联合报》记者林振霆因报道刘自然事件引发的反美示威，^①被以“匪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绿岛关了25年。受林振霆案影响的还有《中华时报》记者戴独行、印刷厂经理温维馨、《台湾日报》编辑主任李望、《国语日报》编辑朱传誉、台广记者夏禾、中央社编辑严仲熊、国语实小教师席淡霞、建国高中教员陆静珍等。这些人受到牵连，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林振霆同样毕业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是该校校友。审判的结果，戴独行以“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判5年，温维馨被判10年，朱传誉交付感化，其他人保释。

《公论报》是白色恐怖期间被迫害次数及人数最多的报纸。《公论报》发行人李万居曾在一个月內接到五封恐吓信，每信都附一颗子弹。1953年，《公论报》创办人之一陈其昌因“意图煽惑民心”、“意图变更国宪及资匪”罪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2月，《公论报》记者高庆丰被控受“潜匪”张

^① 1957年3月20日深夜11点，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担任职员的刘自然，在驻台美军上士雷诺的住宅门前，遭雷诺连开两枪毙命。两个月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美国军事法庭以“杀人罪嫌证据不足”为由，宣判雷诺无罪释放，引发了台湾民众大规模反美暴力冲突，史称“刘自然事件”。为了平息美国人的不满，蒋介石撤换了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台湾省警务处处长乐干，并将三人与林振霆一起送到绿岛关押。

雅韩吸收，收集军情，判处10年徒刑，张雅韩等处死刑。此后，总编辑黄星照、副总编辑李福祥、总主笔倪师坛、编辑阮景涛、陈秀夫、记者黄毅辛、林克明、江涵、嘉义办事处主任童金龙、礁溪营业部主任兼记者张光炽等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先后被逮捕、判刑或被管训，有的被送往小琉球拘禁。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打压新闻自由的事件是《自由中国》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被捕，被判刑十年，编辑傅正、马之肃被判处交付感化三年。

20世纪60年代，报界另一白色恐怖事件是《台湾新生报》案。事件起因于台湾情治单位的内讧。“军统”出身的“调查局长”沈之岳，为了整肃“CC派”，利用中统旗下某一成员在大陆失陷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的罪名，指控“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是中共地下组织，将该会成员蒋海溶（“调查局”三处处长）、李世杰（“调查局”一处副处长）、姚勇来（《台湾新生报》编辑主任）、沈嫫璋（《台湾新生报》党政记者）、路世坤（《台湾新生报》编辑）及陈石奇、余振邦等十余人逮捕。沈嫫璋是当时名记，尤以采访蒋夫人和妇联会新闻出名，新闻界称她为“沈大姐”。在审讯时被“调查局”人员全身剥光逼供，最后不堪刑罚上吊自杀，“调查局”认定“畏罪自杀”。蒋海溶亦自尽。沈嫫璋丈夫姚勇来与其他人被判刑15年。姚勇来出狱后，在台北顶好市场后巷的香江大厦当管理员，兼卖香烟，九十年代病逝，终老于大厦管理员之职。^①

继《自由中国》雷震案之后，情治单位秘密逮捕《大华晚报》董事长李荊荪，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震动新闻界的事件。

李荊荪曾任《中央日报》总编辑，是《大华晚报》创办人。1970年11月17日，因“匪谍”案被捕，经过两天的“疲劳审讯”——寒冬天被要求躺在大冰块上，19日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当局找不到合适的罪行，竟然将陆铿1947年7月29日在《中央日报》揭露孔、宋贪污国家外汇三亿多美金案的行为，算作他的罪行。另一个“犯罪事实”是，1946年5月在一封给当年福州《南方日报》同事俞棘的回信中，李荊荪曾表示“对不流血革

^① 戴独行：《白色角落》，人间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命还不死心，报纸是方式之一”。没想到俞棘一直保留这封信，并上交情治部门，作为自己立功脱罪的工具。最后公开审判时，俞棘还当庭作证李荆荪已参加共产党。李荆荪先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 15 年。出狱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停刊、停刊

报人被警告、被逮捕，甚至被判刑、被枪杀。报纸也不时因为报道言论，甚至副刊文章上的错误，而招致停刊数日、数月甚至永久停刊的处分（表 8）。

表 8：报禁期间台湾报纸被处“停刊”情形^①

报纸	停刊原因	政府处置	备注
民族报	1949 年 8 月 23 日，主笔张铁军在社论中呼吁政府提高军人待遇，有关单位认为这挑拨人心，制造不安。	停刊一个月后复刊。	
天南日报	1949 年，台中总社总编辑朱传誉因停发稿费，剪贴上海等地副刊稿件刊登，其中一篇比较陈诚和何应钦的名人轶事文章，引发陈诚不满。	陈诚以“挑拨军事长官感情”为由，下令查封，该报结束经营。	朱传誉后来因办《中国文选》时因刊登抗日烈士、新四军将领鲁雨的抗战文章，被判处七年徒刑。
自立晚报	1950 年 1 月 17 日，副刊“万家灯火”刊登的《草山哀翁》，被认为影射蒋介石。	勒令“停刊，永不复刊”，为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第一家被勒令停刊的报纸，副刊主编吴一飞被捕。1951 年 9 月 21 日复刊。	
	1952 年 10 月 14 日，一版刊登孔祥熙回国消息。	报社第二天主动刊出更正启事，但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沈昌焕以该报刊登《我将废除中苏条约》泄露“国家”机密为由，要求停刊一个月。经省新闻处周旋，改为停刊一星期。	

^① 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 2010 年版，第 101—102 页。

续表

报纸	停刊原因	政府处置	备注
自立晚报	1953年10月10日，四版一则“国庆”花絮，被认为有诋毁“元首”之嫌。	停刊三个月，总编辑张煦本引咎辞职，撰稿记者田士林及编辑分处徒刑，田士林并送绿岛管训八年。	
公论报	1948年7月，刊载黄纪男（因廖文毅案入狱三次）会见合众社记者新闻。	停刊五日	
	1949年5月3日，刊载台大教授陈正祥的《生活水准与人口问题》，被认为有违当局反攻大陆政策和国父增加国族人口政策。	停刊三日	
	1958年，发表社论《对北港高中禁止学生订阅事件的抗议》，抗议云林县北港高中禁止学生订阅《公论报》。	报纸遭查扣	
经济日报	1967年9月19日副刊刊载社会写实小说《恶梦》，被认为有损国军形象；21日刊载有关“琉球主权”报道，被认为涉及敏感国际事务未能淡化处理。	停刊四日	
民众日报	1985年6月7日，刊载美联社电讯《中共将继续走开放路线》，及《三十位旅美前国军将领建议政府：取消戒严令另订他法》。	停刊七日，是报禁解除前报纸被停刊的最后一次。	

《美洲中国时报》的停刊，是报禁期间被迫停刊的著名案例。1978年，中美外交关系即将生变，蒋经国希望余纪忠到美国办报，强化侨界及美方对台湾的支持。1982年9月，《美洲中国时报》创刊。此前，《中国时报》因

为声援陶百川而与警备总部产生矛盾，但余纪忠依然期许《美洲中国时报》成为不同立场的旅美华人彼此沟通的桥梁，成为华人移民与台、港、大陆人民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该报在采访与报道时不排斥大陆留学生、侨团，甚至包括名列台湾黑名单而无法返乡的“异议”人士，再度引起国民党文工会及某些权臣的不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大陆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美洲中国时报》及时予以报道后，被文工会指责为“为匪张目”。《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控其“掉进红色的陷阱”，《大华晚报》的社论则要求政府“肃奸防谍”，国民党中常会上也批评该报“严重偏离党的立场”。此后，该报刊登一篇讨论里根总统施政的文章，又被指控破坏“中美关系”。文工会高层致电余纪忠要求撤换总编辑和总主笔，余纪忠没有照办。当局转而刁难给《美洲中国时报》汇款的程序，使该报资金周转出现极大压力。余纪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宣布《美洲中国时报》停刊。

第三节 新闻自由与自律

修改“出版法”

如前所述，国民党从1930年12月第一次颁布《出版法》，到1999年废止，期间曾先后6次提出修正。每次修正本质上并无多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新闻控制。有学者评论说，20世纪中国颁布的新闻出版法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一致规定政府有权控制和审查新闻。这些法律和法令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重复，二是含糊。^①

每次修正“出版法”，新闻界都予以高度关注；1958年“出版法”修正更引发新闻界最激烈的反对。

早在1947年国民党修正《出版法》时，就曾遭遇过新闻界的抵制。那一次修正案公布后，《大公报》就在上海报馆举行时事座谈会。会上发言时，傅况麟认为新《出版法》与《宪法》11条相抵触，应予废除。成舍我

^①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40页。

也认为,《出版法》各条已包含于《刑法》《国家动员法》等既有法律中,不必重复。韩德培、储安平等人则对修正案第21—24条有关禁载事项的条文逐条进行了批评。^①

由于新闻界普遍持反对意见,新“出版法”直到1952年才公布施行。1954年11月,“内政部”颁布“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即“九项新闻禁例”,被舆论界称为“史无前例的新闻禁例”,同样引发了包括《中央日报》在内的新闻界的强烈不满,“内政部”不得不宣布“暂缓实施”。此后,蒋介石多次要求加强新闻控制,特别是“出版法”等有关“法令”,要求“从速提出修正,不可再事拖延”。^②

既要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又担心舆论界的反弹。1958年3月28日,“内政部”以“密件”方式将“出版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请求审议,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先后导致“立法院”复议案、台北报业公会请愿和临时“省议会”三波反对浪潮。

4月19日,“立法院”内政、教育、民刑商法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出版法修正案”,委员们就该“修正案”以应公开审议或以秘密会议审议问题,激辩三小时未获结论。4月29日,程沧波等24位“立法委员”主张公开审议,提案交付表决时,遭多数“立委”否决。程沧波会后发表谈话说:“有人想活埋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是埋不死的。”5月2日,彭承善等161位委员提出复议案,再度主张修正出版法案应公开举行,又被否决。3日,《联合报》发表社论《异哉!立委们的坚持成见》,提出强烈批评,《自由中国》也连续发表文章表示反对。^③

6月5日,“立法院”内政、教育、民刑商法三委员会不顾报业公会的请愿,快速通过“出版法修正案”。6月13日,“立法院”举行第10次秘密会议,就修正“出版法草案”进行二读,文群等13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

^① 韩德培:《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一)》,储安平:《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二)》,载《观察》第3卷第15期。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总裁重要号召及有关宣传问题训示集要(增编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4年版,第238、248页。

^③ 社论:《国民党当局还不悬崖勒马?》,《自由中国》第18卷第12期,1958年6月16日;社论:《国民党当局应负的责任与我们应有的努力》,《自由中国》第19卷第1期,1958年7月1日。

主张重行审查，仍被否决。文群在说明提案理由及提案要旨时称，当局有对“立法院”提案之权，人民有“立法院”请愿之权。此次下令提出“出版法修正案”，系代表当局之意见，台北市报业公会的请愿案，系代表人民之意见，“我们站在立法院的立场，至少应对双方意见同等重视。今内政、教育、民刑商法三委员会只审查政府提案，不审查人民请愿案，只知承受官意，拒绝民意，就立法权而言，无异自毁立场。因此希望全院同仁能慎重考虑，将修正案交回三委员会，与台北市报业公会的请愿案合并同时审查，方符法定程序”。成舍我委员发言支持文群委员的意见。他特别指出，“修正案”中的撤销登记等行政处分，对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有极大影响，绝非如部分官员所说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故审议此案时，必须出之以最谨慎、最理智的态度。那天正好是13日星期五。成舍我希望“立法院”在明智而谨慎的决定下，不使这天成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五”。萨孟武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也表示，如“内政部”不先经由“法院”处理，而据以此类控罪禁止某刊出版即为“违法”。^①

当局本意，乃在借修改“出版法”以加强言论管制，不料引发舆论界巨大反弹。为平息事态，蒋介石亲自接见各报社发行人，承诺不任意动用新修正的“出版法”，同时威胁将讨回各报借款，抽回官方股份。威逼利诱之下，各报不再坚持反对修正“出版法”。随后由“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协调出一个折中办法：“立法院”照案通过“修正案”，但当局承诺永不采用。于是，“立法院”在出席者不到全体代表的五分之一的情况下，开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出版法”。该“法”通过后，《自立晚报》发行人李玉阶宣布脱离加入了40年的国民党，并从此在报头下注明：“无党无派，独立经营。”《自立晚报》还发表社论，警告将要执行这一法律的人：“你们的名字将永志于历史，使你们的子孙引以为憾。”

修正后的“出版法”，在第9条中加入新闻杂志登记手续，规定受理机关得依“除特殊情形者外”，将办理登记的时间无限延长，以此限制登记证的取得；同时增加“撤销登记”的处分，并将撤销职权交与行政机关而非

^① 陈国祥：《新闻自由的历史对照》，载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2月版。

司法机关执行。同年10月，当局通令依据新“出版法”加强审查报刊图书，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出版品进行警告、罚款、扣押、没收、定期禁止发行，甚至撤销登记等行政处分。1973年8月，国民党再次对“出版法”提出修改，1974年4月又修正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主要内容仍在于将行政机关不须经由法院审查即可处罚出版品的权力予以合法化。

报业评议会

反对修改“出版法”，是报禁期间民营报业与政治权力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角力，结果以民营报业的失败告终。各报从此调整与威权体制的关系和斗争策略，由积极争取新闻自由转向以消极的新闻自律防御外来的控制。

1961年7月，国民党第二次阳明山会议上，李玉阶仍然主张修正甚至废除“出版法”。他一一指出“出版法”不合理之处：第五章、第六章关于禁载事项、行政处分的若干条文，应予修改；第33条“侦察或审判的诉讼事件登载限制”，应有明确界说，应请“大法官”或请“立法机关”加以解释。王惕吾主张“由新闻界制定积极性的自律公约，以代替消极性的‘出版法’”。^①他希望以报业负责人成立新闻协会，并设立新闻言论评议会，聘请新闻界、法律界、社会公正人士参加，以负责监督新闻言论的失实、失当等事项；并具体拟定了三条“自律”办法。^②会议最后就王惕吾的意见达成建言。根据此一建言，1963年9月2日，台北市新闻报业评议会成立，首任7位委员萧同兹、黄少谷、成舍我、陶百川、阮毅成、程沧波、端木恺全部为国民党党员。1969年，第三次新闻工作会谈通过决议，新闻报业评议会专门设立“报纸内容审查室”，以报业自主审查代替被动接受检举。1974年第四次新闻工作会谈进一步提出，扩大新闻评议会组织与功能，“使成为全国性之自律组织”。

^① “行政院”编：《阳明山会谈实录》1961年印，第44页。转自杨秀菁等编注：《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第七册《新闻自由》，“国史馆”2002年版，第5页。

^② 具体为：第一，公约内容依“出版法”“立法”精神拟订并包涵其所有内容；第二，组织新闻评论审查委员会和新闻业务调处委员会分别审议新闻责任问题并调处新闻同业争端；第三，新闻言论记载违反“法律”者，由审议会移送“法院”审理。

新闻评论会的成立，标志着新闻界将当局的新闻控制内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无独有偶，新闻自律一时也成为台湾新闻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新闻自律

新闻学术研究与新闻教育密不可分。早在1953年，鉴于台湾新闻人才不足，台北市编辑人协会就曾呼吁台湾大学成立新闻学系。台大校长钱思亮和教育部门均表赞同，但当局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在当局的想象中，新闻主要是宣传工具，而不是传播学术。1954年，为了“配合国策及培养高级通才”，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该校最早成立的四个研究所即为政治、外交、教育及新闻，均与政治及文化宣传有关。^①曾虚白、谢然之等党内主管宣传的官员先后出任新闻系主任。

战后台湾新闻学术发展史，同样经历了一个由短暂的宽松到长期的严格控制的过程，体现之一就是，研究的主题由新闻自由转向新闻自律。1950年代初，《报学》初创刊时，特别“欢迎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的探讨”，每一期都有几篇讨论新闻自由的文章，并刊载了胡适谈论新闻自由的文章。胡适说：

我说言论自由必须培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

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主管官员的曾虚白等人，同时也是新闻学术界的领头人。在他们的倡导下，学术界也开始将官方新闻管制的逻辑翻译成学术语言，以正当化当局的新闻管制，包括对媒体的掌控与收编，以当局的逻辑建

^① 林丽云：《台湾传播史研究：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9月版，第79—80页。

构新闻学理论。这一逻辑的本质为：社会有共同的目标，媒体有“社会责任”达成此目标，媒体过度放任会危害此目标，因此当局必须加以管制。

1959年《报学》开始接受官方补助，刊载“自律”专号；在逮捕雷震等关键事件上，《报学》均发表文章为当局做理论辩护。谢然之强调要结合“国情”以树立正确的新闻自由观念，他说：

我们应当审度自己的国情与时势，树立正确的新闻自由概念，而政府与新闻从业人员尤宜精诚合作，协办促进新闻自由的发展，为建设健全的、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事业而共同奋斗。

于是，“社会责任”、“媒体自律”等成为报禁期间台湾新闻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巧合的是，这些话语同时也在美国新闻界开始流行，看上去颇与国际学术接轨。可是，同样讲社会责任，媒体自律，美国是自由竞争导致媒体垄断，而台湾是报禁政策妨害新闻自由，语境迥然不同。

美国学者提出社会责任论，是因为媒体垄断对新闻自由造成了伤害，因此主张当局应积极地保障一般公众的新闻自由，但不宜控制媒体。20世纪60年代，台湾传播研究者选择性地转译美国的“社会责任论”，则强调媒体应受政府控制才会负起社会责任。这样提的第一个理由是战时“国家安全”。为了“国家安全”，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自律”、“自觉与自反”，并进而做到“自制与自治”，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成全国家民族的自由。

不过，由于台湾并未开启战争，战时安全的理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发生问题。于是，1965年开始，曾虚白提出了第二个限制新闻自由的理由——避免恶性商业竞争。曾虚白主要援用李普曼的理论，主张新闻媒体应由专家与精英经营，以负起社会责任；但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媒体内容粗俗，因此媒体应加强自律，公众也应组织起来制衡媒体。如果媒体无法自律或公众无法发挥制衡作用，那么当局应介入管制媒体。曾虚白说：

倘公众对传播事业的愿望无法达成，政府不得不插身进去为公众服务。换言之，如传播事业不负责，无其他势力可使之负责，政府不得不负责处理了。

曾虚白的论述逻辑，正是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理论的论述逻辑。但是，同一套逻辑，针对的现实显然完全不同。曾虚白完全没有提及当时台湾媒体的寡占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当局的控制所造成。尽管其中的荒谬显而易见，但他的这一说法仍然“经由场域内互动仪式一再流传与复制”。^①

1965年8月，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举行“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研讨会。会上，曾虚白作了关于“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主题报告，吕光讲了“新闻自由与法律责任”，曾虚白的学生李瞻则报告了“新闻自由之演进及其趋势”。1967年，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学研究》，第1至第3期的主题，均围绕着社会责任、新闻自律和当局管制。谢然之的《新闻自由与自律》一文，告诫新闻记者要自觉自制。文章认为，只有表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爱“国家”的行动时，新闻自由才是可贵的。文章还特别引用了蒋介石在第二次新闻工作会谈中训勉新闻界人士的一段话：

要本着良知良，以国家、主义、责任为自律的标准，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要站在时代的前面，不要站在时代的后面。要站在道德的前面，不要落在罪恶的后面。

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威权主义政体逐渐从“军事威权”转变成“发展型威权”，台湾的新闻学术生产也如同报业生产一样，积极配合当局，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恪守职责。但是，世易时移，伴随着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台湾的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也由涓滴汇聚，逐渐成为滔滔洪流，既不是当局的压制，也不是报人的自律可以束缚的了。

第四节 潮流变了

质疑报禁政策

尽管国民党的报禁政策及其实施理由，随着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有所变

^① 林丽云：《台湾传播史研究：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9月版，第99页。

化，报界和民间对于这些理由却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

1950年11月30日，台北市《中央日报》等六家报社发表联合启事，将报纸减为一大张半，此为台湾第一次实行限制报纸张数。1952年12月，“行政院”颁布“新闻用纸供应办法”，由各报自组用纸调查委员会调查分配，再由有关机关审核后，“定量供应”。李玉阶即代表同业要求废除定量供应制度。^①台湾新闻纸民营化后，在无纸张进口竞争的情况下，纸价反而一直上涨。针对这种状况，有人公开提出批评：

现在的配纸制度，不仅不是对新闻事业的贴补，而是新闻事业对政府的纳税。何以言之？新闻纸配价远高于外纸输入价格百分之卅十以上，纸质不逮外纸，犹在其次。要是我们有权选择的话，没有理由选购价格较高纸质较低的纸张来印报，所以配纸制度对新闻事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享受，同时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负担。^②

1955年3月4日，老报人、“立法委员”成舍我在“立法院”也对配纸制度提出质疑。成舍我说，台湾虽处于战时状态，但是海上并未被敌人封锁，一切物资均可随时进口。因此，在台湾根本没有必要施行配纸制度。再者，现今纸业公司既改由民营，在自由选购下，或许反可促使台纸改进品质，减低成本。成舍我公开表示，因节约纸张及印刷原料，就可以禁止新的报纸杂志出版，这是天下奇闻。^③

在报界和社会一再呼吁之下，1955年4月，“行政院”决议酌准新闻事业应用进口洋纸，但同时强调“报纸篇幅，则仍基于战时节约用纸原则予以限制”，并颁布“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限定除特别纪念日外，报纸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半。这也表明，当局以节约纸张为理由实行报禁，不是“奇闻”，而是借口，真正目的还在于控制新闻言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立法院”针对报禁问题提出不少质询，只

① 李玉阶：《欢迎老兵马星野》，载《天声人语》，“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1980年版，第164页。

② 范鹤言：《配纸制度是否需要？》，《报学》第1卷第6期，1954年7月。

③ 成舍我：《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自由中国》第12卷第6期，1955年3月16日。

有两次获得“行政院”答复。分别是1954年9月19日“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与1955年3月4日“行政院长”俞鸿钧的答复，他们申述的主要理由仍为“节约资源”。俞鸿钧说：

至于讲到报纸不许发行的原因，各位也许知道，今天我们正处在与共匪生死存亡斗争的关头，我们要节约人力物力，各位知道过去台湾有许多毫无价值的报纸杂志，说起来这也是非常浪费的，这一点大家都有同感，所以对于新的杂志不希望多出版，这也无非是一种节约的本意。^①

1974年9月，“立法委员”黄信介要求“行政院长”蒋经国严令治安机关，不能以违背“国策”或莫须有的罪名，随便逮捕人民或查封人民所办的刊物，蒋经国答曰：

关于言论自由，我要趁此说明一下，对于新闻事业，我们有几种规定：国内的报章杂志，凡是登记的，一律不查，外国记者在我国发出的新闻电讯也不检查，但是为了防止共匪的统战或利用某一部分人作渗透工作，由外国发来的新闻与寄来的书刊，是要检查的。因为这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安的必要措施，是政府要必须做的……对于这项指责，今天有很多新闻记者在场，我觉得也不是公道的。目前发证的报纸有31家，通讯社有44家，杂志社有1500多家，出版社有1900多家，我们都不检查，而极大部分都能为民喉舌，主持正义，黄委员还说言论不自由，我觉得不公平。^②

20世纪80年代，“立法委员”黄天福、许荣淑、费希平、苏秋镇、康宁祥等人多次就报禁问题提出质询，“行政院”主管报禁的“国防部”、“法务部”、“内政部”曾分别答复，又一再重复“国家安全”理由。此外，

① “立法院公报”第15会期第3期，1955年6月16日，第162页。

② “立法院公报”第63会期第72期，总728期：第49页。

“新闻局长”宋楚瑜还提出了“市场饱和”的新理由。宋楚瑜说：

“报禁”问题，对这个名称的本身有待澄清，因为我国现在无报禁问题，我们对报纸根本没有不准发行的情况，同时也不会禁止。事实上，目前台湾已有报社31家，报纸每天的发行量估计约350万至370万份，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份报纸，与先进或开民国家相较并不低，因此，我国并没有所谓报禁的问题。政府之所以暂不开放新报登记和不增加报纸发行张数，系基于非常时期的处境暨维护报业健全发展的实际需要，由于报纸同业间竞争激烈，若干家报纸的生存已面临考验，以致报道言论及广告等内容常未能顾及读者的利益……为避免放任报纸恶性竞争所可能发生的各种弊端，仍暂不接受增加新报纸的登记。^①

从战时需要，到节约用纸，到避免恶性竞争，到加强辅导，种种关于报禁的理由，当局虽不断翻新，却日显无力。直到1987年10月，“新闻局长”邵玉铭在答复“立委”吴淑珍质询时终于宣布，根据“行政院”决定解除戒严的宣示，台湾将于1988年1月1日开放报纸登记，正式解除报禁。

奔向自由

报禁政策的解除，不是一朝一夕间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天纵英才伟大领袖的恩宠，而是累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一连串来自民间反对运动冲撞后的结果。^②

战后台湾新闻事业几十年发展的见证人王洪钧颇有感触地指出，台湾新闻事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乃是情势大气候使然。其中，台湾政治民主化发展，反对党争取分享传播资源，反对执政垄断，应居首功。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民众消费能力提升，教育水准提高，视野扩大，对于资讯的需求扩大；工商企业投资传播事业，并寻求政治权力；年轻一代社会精英、专业人才、管理人才，投身新闻传播及相关事业者越来越多——凡此种种，都表明

① “立法院公报”第72会期第22期，总1611期，第64页。

② 黄顺星：《记者的重量》，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30页。

台湾整体社会已发生本质改变，并且促进了与台湾新闻事业的互动关系。当局适时宣布解除报禁，不过俗语“临门一脚”而已。^①

进入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情势影响，国民党威权体制统治出现危机。蒋介石安排蒋经国正式接班。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为改革图存，甄补知识分子进入党政系统，采取“有限度的民主化”和“选择性本土化”，加速了政治上的新陈代谢，有效舒缓了政治参与压力。70年代末期，政治反对势力逐渐成为社会行动体系的一部分，“国家机构”对新闻传播媒体也由“垄断”转变为“领导”。媒介权力结构仍然非常封闭，但媒介成为社会势力结合点的情形略为可见，尤其是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上，党公营报纸与民营报纸的报道已有所差异。

对国民党威权体制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剧变的年代，面对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党外运动冲击，蒋经国选择了民主，对于党报也提出了开放的新方针。他指示《中央日报》：“言论应尽量反映舆情，文字要犀利有力，且不必避讳对当局施政的善意批评。”^② 无论促使蒋经国改变心态的是什么样的私人考虑，大体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公开形象的转变是在受当局严格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巧妙操纵下实现的。^③

当局有意逐步松动政治空间，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社会反对运动突破政治禁忌的努力，但后者过于急剧的冲撞却又超过当局可以容忍的限度。面对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威权统治者一方面试图以政策开放进行收编，另一方面，对于难以收编的反对势力，则施以更为严厉的打压。在意识形态宰制方面，警备总部加紧了对于党外杂志的扣押。^④ 1981年，警备总部发出“安基三号”密件，要求治安单位和媒体动员打击党外“阴谋分子”，党外杂志频以“混淆视听”名义遭查禁。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5年，共有340份党

①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进入新纪元》，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②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73页。

③ 包济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61—262页。

④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6—108页。

外杂志问世，其中 60% 被查抄。^①

对于当局的有限松动，民众的反应不是感恩戴德，而是要求更多大的开放。事实上，当局开放的步伐根本无法赶上民众希望的速度。于是，满腔怒气的民众由批判的武器走向武器的批判，80 年代因此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代。据统计，1983—1988 年间，台湾发生了 2894 起各类社会抗议事件（表 9）。

表 9：1983—1988 年社会抗议事件的议题类型^②

	1983	84	85	86	87	88
生计	89	89	114	116	293	407
环境	37	62	39	98	146	200
劳工	27	40	85	40	69	296
农民	3	0	3	2	24	51
特殊团体	10	2	8	9	49	53
泛政治性	6	6	18	12	34	29
反动运动	1	5	7	60	119	136
合计	173	204	274	337	734	1172

注：“生计”是公共建筑的土地征收、取缔摊贩等议题的自力救济。“特殊团体”指例如锡安山、学运、原运、妇运、老兵返乡、消费者等。“泛政治性”指无法纳入反对运动的政治抗议，涉及地方派系、职业团体的利益人事纠纷。

一次次社会抗议，一波波民情爆发，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主自由的潮流，浩浩荡荡，挟裹着国民党，逼迫执政者为了自己不被彻底抛弃，不得不改弦更张，回应民众的意愿。1985 年 10 月 15 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措施。唯有如

^① 冯建三：《异议媒体的停滞与流变之初探：从政论杂志到地下电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0 期，1995 年 8 月。

^② 吴介民：《政治转型期的社会抗议——台湾 1980 年代》，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年），第 50 页。

此，才能与时代浪潮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潮流变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6年，是台湾反对势力急速扩张的一年。那年，韩国的全斗焕、菲律宾的马科斯相继下台。为了避免相似的下场，蒋经国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民主相结合，下令有关单位研究如何回归“民主宪政”，节制情治单位的滥权，并批准国民党通过陶百川等人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党外人士却先行成立民主进步党，消息被《中国时报》和《自立晚报》报道，情势陡然变得紧张。最后时刻，蒋经国决定让步，只要新政党遵守“宪法”，反对台湾“独立”，就可成立。1987年7月14日，作为“台湾最后的强人”，^① 蒋经国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

在此之前，1987年2月5日，“行政院长”俞国华在“院会”中宣示，将以积极态度重新考虑报纸的登记与张数问题，并在兼顾新闻自由与报业善尽社会责任的原则下，尽速订定合适的规范与办法，以促进报业的发展。2月27日，“新闻局”邀约学界、业界成立专案小组，研究开放报禁问题。

研究小组于3月15日开始集会，经过多番调查研讨，5月15日提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建议开放报禁应遵守四项原则：维护新闻自由、确保公共利益、避免集中垄断、促进健全发展。为了预防报禁开放后可能出现恶性竞争情形，报告还建议当局预先就各项问题妥为规划，包括避免报业所有权集中垄断、促进报纸张数等之合理化、防止不实新闻、保护个人名誉及隐私权、维持广告公信力及优良品质、建立合理售价制度、规定新闻及言论刊出字体——以保护国民视力，增进民族健康等等。^②

“新闻局”采纳了研究小组的这些建议，并在全省分北、中、南三区邀集报业就各项问题进行充分协商。1987年12月1日，由“新闻局长”邵玉铭宣布开放报纸登记。同日，台北市报业公会、台湾省报纸事业协会及高雄市报纸事业协会，联合发表《迈向一个资讯健全的新时代》联合声明，提出“八项协议”：报纸张数规定为对开6大张，下限为对开1大张；新闻用字，不得小于6号、新6号，分类广告字体放大15%；广告与新闻的比例

① 司马文武等：《亚洲五强人的历史考卷》，《新新闻》创刊号，1987年3月。

②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记者公会1999年版，第65页。

不予限制；报纸新闻与广告分版以目前最高状况为准，加张后不再扩增；报价视各报发行张数多少，由报业公会分别审慎研商、研定；登记立案的报纸在不同地点发行及印刷报纸，应另行申请登记证；鉴于报纸开放登记证后可能形成恶性竞争，将组成九人小组，研究加强报业自律及强化新闻评论会功能。

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同一天，《自由日报》更名为《自由时报》。1月4日，《自立早报》由政治组召集人胡元辉前往台北市政府，正式申请登记成为第一家新报。

从默许民进党组党，解除戒严，准许老兵回乡探亲，到开放报禁，台湾一步步走过政治民主化之路。^①报禁开放后两周，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一个没有带头大哥、人人自主的民主时代。

^① 邵玉铭：《开放报禁之背景、过程与影响》，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4月版，第4页。

第三章 威权统治的侍从与对手

一生办公家的媒体，不太可能全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然无论如何，总要守住一个读书人的分际与骨气——楚崧秋

报纸的印刷，不论好坏如何，终究是外形的躯壳，报纸真正的价值，是存在于它有没有灵魂和特有的精神。——余纪忠

1945年12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新报》，改名《台湾新生报》。1946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中华日报》在台南出版。同年10月，《和平日报》在台中出版。至此，台湾光复后半年，国民党的党、政、军三报基本一统台湾报业市场。同时间内，虽有大批迁台的大陆报人，或创办新报，或复刊大陆时期的报刊，但由于这些报刊一方面要接受政府的严格审查，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极不景气的情况下，与党公营报刊竞争，结果，除了少数报纸通过合并（像《联合报》）或得到当局支持，不虞生存，其他报纸则处境艰难，勉强维持，甚至纷纷倒闭。

第一节 党报的荣与悲

《中央日报》迁台

1948年底，《中央日报》自南京迁至台湾，次年3月12日正式出版。《中央日报》的新闻及言论虽然坚守执政党的立场，但当时报社中人几乎全部来自南京，多半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加上社长马星野决心“不但办中央，更要办日报”，报纸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专业精神，其声誉与业务蒸蒸日上。^①

^① 迁台初期，有些地方开会，“长官训话”之后会有“中央日报记者训话”，可见当时中央日报的地位。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9年版，第33页。

《中央日报》将大陆新闻事业的传统与风格带到台湾，为沉闷的台湾报业引进了现代经营观念，刺激了其他报业的发展。叶明勋曾总结《中央日报》对台湾报业发展的影响：

第一、该报首先以代表中枢的姿态出现，促成了台北各大报由全省性到全国性的形态上的大转变；第二、由于该报高斯新轮转机的性能优、速度快，激起了各报在印刷方面的剧烈竞争；第三、该报套红印刷，在发行广告方面所获的效果，促成了报纸套色风气的竞争；第四、该报《牛伯伯打游击》《土包子下江南》等长篇故事漫画的连载，引起以后台湾报纸一窝风的连环画热；第五、该报迁台以后，在编辑发行方面，如各种专业性周刊、双周刊，及过去附赠星期杂志、飞机送报等，也使竞争更趋激烈。^①

在《中央日报》的促动下，《台湾新生报》自1949年5月起进行全面改进提升。首先是强化编辑部，其采编部门几乎网罗了前上海《申报》大部分人才，可谓“良将如云，谋臣如雨”。其次，改善印刷工厂。此外，为了争取新闻来源，除加强原有各县市驻地记者外，并在日本、香港及欧美各大城市增设特约记者。言论方面，改社论委员会为主笔室，延聘国内政论专家执笔，增辟“每日专栏”，并在高雄成立分社，发行南部版。通过一系列措施，《台湾新生报》的发行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全省第一。^②

在当局支持和特权政策保护下，《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台湾新生报》，长期并列成为台湾三大报，三报销售量占全台报纸总销售的近90%，在发行、广告方面都占据了大部分市场，民营报纸则在生存的边缘挣扎。^③

① 叶明勋：《光复以来的台湾报业》，《中央日报》1957年3月12日，16版。

②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7年版，第42—43页。

③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代表蒋先生说话”

《中央日报》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①一年后迁南京出版。创办之初，《中央日报》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社长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国民党宣传力量，将《中央日报》划出中宣部，直属中常会，建立社长负责制，社长由蒋介石直接委任。可以说，在党治理论和领袖独裁制度下，蒋介石本人的意旨实际上成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一条途径——虽然不是正式的途径，却常常凌驾在正式途径之上。^②同样，台湾威权统治期间，蒋氏父子的意旨，依然是党公营报刊，特别是《中央日报》办报的最高准则。

《中央日报》从迁台出版至报禁解除，出任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的高级主管人员，如马星野、萧自诚、吴俊才、潘焕昆、曹圣芬、姚朋、黄天才、钱震、林家琦、赵廷俊、邵德润、薛心谔、王端正、许志鼎等，大都出自与蒋介石、蒋经国关系密切的政治大学、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等机构，有的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第四组或文工会的领导职务。其中，在《中央日报》主政时间较长的陶希圣、曹圣芬和楚崧秋等人，更是和两蒋长期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陶氏在南京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曹氏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楚氏在中央政校研究部就读时曾任该校教育长蒋经国的秘书，到台湾后，又成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这些官邸出身者，既是党国干部，也是领袖“家臣”，^③主、侍之间带有超越组织纽带的

① 由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争，北伐后，国民党曾两度创办《中央日报》。1927年3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创办《中央日报》，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兼任，总编辑为中共党员陈启修。四一二事变后，该报刊载过不少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宁汉合流”后，武汉《中央日报》于9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6号。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又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中宣部部长丁惟汾任社长，彭学沛任总编辑。

②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年初版，第83页。

③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纪录：《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2月版，第8页。

私人恩情。^①

在独裁统治下，领袖意志成为党的意志，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机关报，自然也是总裁的喉舌。既然《中央日报》代表着“中央政府”及蒋介石本人，^②“代表蒋先生说话”也就成为党报撰述者的信条和规则。^③曹圣芬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日报》报社主笔会议时，就曾直白道出，“当初总裁派我来中央日报，当面交代：‘中央日报’是代表我的报纸”。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曹圣芬受蒋介石之派，两度任《中央日报》社长，后任董事长，在《中央日报》工作前后30年，始终铭记蒋介石交代的那句话，谨守不渝。^④1977年，因刊出许信良出书广告，《中央日报》社长楚崧秋“奉命”辞职。辞职当天，楚氏深感“冥冥中应该有所交代”，于是径往慈湖谒陵。在蒋介石陵前引用宋朝郑思肖的诗句——“生得贞心铁石坚，肯将识见与时迁”，以表心志。^⑤

《中央日报》迁台后头几年，蒋介石政权未稳，需要向美国显示其自由开明的一面，政治舆论环境比较开明，加上社长马星野带有专业报人作风，想把《中央日报》办成一份“可以摆在客厅里，成为家庭报纸”，言论报道因而颇有可观。1954年，国民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内政部”公布“九项禁例”，《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中华日报》三家党公营报纸均拒绝撰文支持“九项禁例”，并在报业公会一致发表共同反对意见。

马星野的办报理念，显然不符合蒋介石对《中央日报》的期许。1952年，马星野辞去社长职务。此后，《中央日报》逐渐变得越来越僵死保守，

① 曹圣芬回忆其首次拜会蒋介石时的情景：“会客厅面积不大，里面摆放着两组沙发，校长立在靠窗的一组沙发面前，我行过礼后，校长示意叫我坐，我想应该立着回话。校长含笑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家庭情形，便教我帮助（萧）自诚兄努力工作。校长的目光是威严的，然而我这次感到的不是威严而是慈祥，那澄澈的眸子中流露无限的温暖，有如冬日的阳光。”转自唐海江：《党报“转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台湾中央日报为中心》，《新闻学研究》第97期，2008年10月。

②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经世书局1986年版，第388页。

③ 唐海江：《党报“转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台湾中央日报为中心》，《新闻学研究》第97期，2008年10月。

④ 薛心谿：《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的新闻工作剪影》，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⑤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纪录：《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2月版，第117页。

成了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手中的大棒。1958年4月，国民党提出第二次修订“出版法”，借以管制言论，引发舆论界强烈批评。《中央日报》却极力拥护，^①要求舆论界停止议论，广刊各方支持意见，正式与民营报业分道扬镳。

“中央” VS “日报”

《中央日报》内容渐趋保守，赶跑了不少读者，特别是基层民众，连蒋经国都批评地方上买不到《中央日报》。1964年，《中央日报》社长曹圣芬到阳明山受训，蒋介石问他为什么最近《中央日报》的社论不太有力量？曹圣芬委婉地表示，由于情形比较复杂，《中央日报》说话顾虑比较多，在新闻上多有自我设限。^②

曹圣芬的回答表明，作为侍从报业的《中央日报》，其作为空间极为有限。事实上，自从创办以来，如何经营《中央日报》，向来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中央日报》的任务在宣扬党的政策与作为，不在乎赔钱赚钱；另一派则以做生意标准来要求《中央日报》，赔多不如关门，主张在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应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前一派意见多出自党内大老，后一派意见主要出自《中央日报》管理部门。^③两派意见的分歧，实际上是将《中央日报》办成“先中央、后日报”，还是“先日报、后中央”的不同，也就是将《中央日报》仅仅作为宣传机构，还是将它既作为宣传机构又当成新闻机构的区别。报禁政策的实行，使得前一派意见成为主流意见，属于后一派意见的马星野等人，注定要被扫开。曹圣芬所说的《中央日报》“自我设限”乃是迫不得已。

虽是迫不得已，也只能有苦难言。曹圣芬不像马星野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尽力将《中央日报》办成领袖个人的报纸，可是这样一来，受众必然不满意。《中央日报》报纸打不开局面，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另一份党报《中华日报》，希望后者能有所作为。

① 社论：《出版法的修正问题》，《中央日报》1958年4月16日。社论：《出版法补充修正祛除了两大隐忧》，《中央日报》1958年4月18日。

② 薛心谔：《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的新闻工作剪影》，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③ 薛心谔：《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的新闻工作剪影》，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964年9月，第四组主任谢然之通知楚崧秋：“总裁要你接办《中华日报》，而且应该早日接事。”楚崧秋自然明白，党报如果还像以往一样，拿政策和政令填版面，读者终将掉头而去。作为党员，他忠于领袖；作为报人，心中的榜样却是普利策。奉命执掌《中华日报》后，楚崧秋便仿照《纽约时报》和普利策的新闻理念，为该报拟定“新闻第一，言论第一”的方针。不过，他也深知，要真正按新闻原则办党报，无论是党报的传统习气，还是党内的人情面子，可能都不容许。就连忠勤敦厚的总编辑也疑虑重重。楚崧秋不得不反复向他提示：“新闻取舍，只要不背原则，不可太保守，登我们所应该当登的，去我们所不得不去的。”对于采编人员，他也不断给予鼓励：“大胆地写，大胆地编。”

所谓“登我们所应该当登的，去我们所不得不去的”，显然还是有所顾虑，而且其“该当”与“不得不”的含义模糊，难以拿捏，只会使人宁可保守地“自我设限”。楚崧秋却主张“不可太保守”，固然表现他的个人胆略，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本人乃是蒋介石的心腹，能深切领会主人的意图。说到底，无论是曹圣芬的“自我设限”，还是楚崧秋的“不可太保守”，无非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蒋介石对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有着不同的期许，从而给予不同的作为空间，并委派不同的侍从借以达成其旨意。

因为经营《中华日报》有所建树，1972年10月，楚崧秋奉命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此时，蒋经国已逐步执掌政权，让自己的亲信出任此职，可见《中央日报》在他心中的地位，并不比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轻。1973年4月2日，蒋经国约见《中央日报》主要负责人，包括社长、副社长、总主笔等人，就新闻言论等方针，亲自下达指示。蒋经国虽然没有要求将《中央日报》办成代表他个人的报纸，但反复强调“国家的前途，与《中央日报》的前途完全一致”。他要求《中央日报》本着“孤臣孽子”的心情，不计眼前一时的利钝，发挥“择善而固执”的精神，除了与当局的施政配合之外，更要作积极的建议和报道。从重大政策，到一般性小事，《中央日报》可以先与有关部门联系，作成建议，当局随时采取行动。当局借报纸改进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报纸则借当局权威增加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

本着“孤臣孽子”的心情，为“党国”服务，这是领袖对于《中央日

报》的期望。根据蒋经国指示，结合经营《中华日报》的经验，楚崧秋将《中央日报》的使命概括为：

本党政策的前驱和后卫，而不仅是信徒；政府施政的谏士和诤友，而不仅是护使；社会大众的良师和益伴，而不仅是工匠。

楚崧秋深深懂得，《中央日报》在争新闻、抢镜头、论时政、探问题各方面，不免受到若干局限，需要自我设限，但决不可以此作为惮于采访、怯于论事的借口。像马星野一样，楚崧秋主张报业是一种现代企业，必须面对市场竞争，回应时代新冲击，包括科技进步、经营观点和不同媒体的挑战等等，审慎把握“国内”办报环境，方能完成蒋经国交办的使命。^①

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五年时间，楚崧秋继续以“新闻第一，言论第一”方针，改革言论报道，取得了一定成效。1978年，楚氏转任文工会主任委员，依然以国民党发言人的立场自期，“做好一个守分寸、讲事实的代言人、辩护人，一个政策的执行者”。任职不久，台湾相继发生了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台美断交、美丽岛等重大事件。面对棘手而复杂的局面，楚氏坚守“绝对不能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而牺牲‘国家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努力“在宣扬政策与新闻言论自由之间，兼筹并顾”，其开明作风广受好评。^② 在致信蒋经国时，他如此诉说自己的心曲：

平日为何要去接触那些被视为问题的人，为何要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为何要去碰若干二、三十年被认定难解的结，一言以蔽之，此时此地，受良心的驱策，为了党国的利益，不应作乡愿，不容只求无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貌发生巨变，国民党威权统治已日渐呈现出拙于应对的僵硬之态，《中央日报》的言论报道也倍显呆板，在受众眼里仿佛成了一条恐龙。1987年，楚崧秋再度受命执掌

①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8月版，第131、161—164、173页。

② 林森鸿：《楚崧秋开明作风为文宣立下典型》，《自立晚报》1970年6月26日第2版。

《中央日报》。多年以后，他犹清晰记得蒋经国当时命他上任的情景：“以他疲惫而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要好好去挽救这个报纸’。”此时的蒋经国已不再是强人，他的声音疲惫而微弱，也象征着国民党的威权不再强大了。

经济起飞，教育进步，民情大变，开放的空气逐渐形成。报禁即将解除，扩张指日可待。作为执政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将如何执机制变，引人关注。临危授命的楚崧秋，心情相当沉重，苦心孤诣地提出了经营《中央日报》的三个方针：“有党性而无官气”，“守原则而重内容”，“求利润而贵报格”。楚崧秋明白，经营了60年的《中央日报》是一份党报，如果不能面对现实，顺应潮流，迎头赶上，必然会落伍，为大众轻忽或背弃。^①然而，新潮流却是要掀翻威权统治，要淹没威权体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楚崧秋拼尽全力，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完成主人的嘱托，依托于威权体制的《中央日报》，最终还是被时代潮流抛弃。

《中央日报》的消逝

《中央日报》1928年在上海创刊时，国民党元老吴敬恒专门题写《祝词》，要求该报以孙中山思想为指导——“非总理之政制，不必自造政制；非总理之主张，不必自造主张”。^②1928年6月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设置党报条例草案》《指导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等条例，要求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党报，“须绝对站在本党的立场”，“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须完全服从所属各级别党部之命令”。^③

作为党的喉舌，党营新闻事业宣传本党主义，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北伐成功后，国民党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各级机关党报也由一般的政党报刊转而带有官报色彩，其主义宣传也沾染了浓重的官腔官调，甚至“官”的成分渐渐超过“报”的成分，对读者自然缺少吸引力。《中央日报》的影响力，因此远远不及《大公报》《申报》等民营报刊。

为改进本党宣传，1931年11月，国民党重新拟定新形势下的宣传方

①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8月版，第123、145、174页。

② 吴敬恒：《祝词》，上海《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第3版。

③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略，决定将党营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文化宣传机构，由宣传部划出，成为独立机构，直属常务委员会，由此开启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的“经营企业化”时代。^①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日报》迁出中宣部，实行社长负责制，并进行企业化改组。1932年春，新闻才子程沧波被委以重任，出任《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程沧波曾任《时事新报》主笔，理想宏大，有志成为中国的李普曼。^②上任之初，程沧波第一件事便是筹借款项，给三个月未领薪资的员工发放薪资。当时的舆论环境，国民党正处于内外交逼的情势之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被舆论讥讽为勇于内战怯于外斗。为这一政策辩护的《中央日报》也被社会轻侮。程沧波懂得，要使《中央日报》真正成为舆论领导，决不能依赖政治力量，必须先把报纸办好。为此他特别写信向张季鸾请教办法。张季鸾回信说：“办报还是新闻第一，报纸版面应多登载一些新闻。”^③多登载一些新闻，言外之意，就是少登载一些宣传；也就是多一点“日报”，少一点“中央”。如何弥合“中央”与“日报”的关系，程沧波迎难而上，亲自撰写了《敬告读者》社论，提出《中央日报》言论方针。社论说：

中央日报在系统上为党的报纸，是其职守，应为党之主义言，为党的创建者之遗教言，故发扬党义与阐明遗教，允称本报使命之一。然而本报言论上与党之关系，仅止于此。所谓仅止于此者，本报所辨扬者为整个党与党之主义，而非党内之任何机关与党内任何之个人。本报不讳为本党主义之辩护人，而决不作党内机关或党内个人之辩护人。党内机关或党内个人之行为，苟其违反党的主义，本报凭其职责，不仅不能为之辩护，且将尽量予以批评，不仅本报予以批评，且将唤起全国之信仰主义者予以制裁。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② 程沧波：《自序》，载《沧波文存》，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1页。

③ 程沧波：《我所认识的张季鸾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收入朱传誉主编：《张季鸾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

依吾人之见，党之利益与人民之利益，若合符节。换言之，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①

程沧波的论证逻辑可谓用心良苦：既然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相一致，那么，党的喉舌自然也可以成为人民喉舌。换句话说，报纸对读者负责，也就是对当局负责。这一提法看似巧妙，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党的利益即人民利益”，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却是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会发生矛盾。对于两者的矛盾，党治理论主张以党的利益取代人民利益，程沧波却试图以人民利益为重。这种主张与蒋介石视《中央日报》为他个人代表的理念必然冲突。程沧波此后被迫辞职，根由或在此。

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从重庆返迁南京，蒋介石任命马星野为社长。总编辑李荆荪、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等人，均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是马星野的学生。报社总主笔则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兼任。对于《中央日报》的方针，陶希圣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也就是“先中央、后日报”。陆铿等人则认为，报纸如果没有人看，“中央”立场站得再稳也没用，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学生们的主张深得马星野赞许，陶希圣也得罪不起，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学生们和陶公之间、在党性与新闻性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报纸言论完全由陶希圣负责，新闻上则放手让学生们去做——《中央日报》因此有过一个“新闻报道几乎没有禁忌”的时期。

在党报体制下，“先日报、后中央”，在特殊时期遇上特殊总编，是可能出现的，但结局只能是昙花一现。随着威权统治在台湾的确立，马星野不再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事隔半个世纪后，1990年，《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曾请教陆铿：怎样才能办好《中央日报》？陆铿还是答以“先日报、后中央”的所谓“南京经验”。^②

① 程沧波：《敬告读者》，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5月8日。

②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97—99页。

世易时移。在办报理念上，楚崧秋与马星野或有相通之处，但是，《中央日报》却不再可能出现半个世纪前的辉煌。想当年，马星野创办政治学校新闻系，亲自为新闻系写了热情洋溢的系歌：“新闻记者责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微言大义春秋笔，誓为民族最前锋。”半个世纪后，《中央日报》不仅不再是民族的最前锋，而且已然变成时代的恐龙。迈入老年的马星野，每天看报纸、电视以及各形各色的杂志，文化界的种种表现，让他感到万分痛心：

我们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男的不做陆游，女的不做李清照，更谈不到怒发冲冠的岳武穆，击鼓长江的梁红玉。我们把台北当作纸醉金迷的上海，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有很多柳永型的颓废派文学作家，柳永的人生观是‘漫把浮生，付于短斟低唱’。醇酒与美人，是南宋偏安时代文学家们的追求目的，但是柳永之流，比起我们少数的文学家艺术家，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家看不起旧文化、旧文学、旧戏剧、旧绘画，而向美国的好莱坞、百老汇、花花公子、玛丽莲梦露靠拢。我们大报或小报的副刊，一味向刺激、男女、剑侠、妖姬的方向努力。^①

“漫把浮生，付于短斟低唱”，党营媒体只能无可阻挡地走向衰落，衰落到“连国民党都不支持自己的党报”。遇有重大事件发生，《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等党公营报纸的总编辑，就会用固定电话串通，商讨用哪条新闻当头条，哪条当二条，大家协调一致，以免惹事。如果记者采写了当局还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总编辑会让记者放弃。曾任《中华日报》副社长的黄肇珩回忆说，每次“内阁”改组前，记者都会大猜人事变动，民营报纸常常因此大卖。可是，这种“猜谜游戏”对党营媒体却是一种禁忌。有一次国民党中常会通过重要人事案，文工会直接提供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本是希望两大报不再要乱猜。第二天，两大报一版头条同时刊出，内容完全相同，有新闻有图片，只差一个字，像正式公布的人事案，与当天“行政院会”通过的名单完全一致。黄肇珩不服气，在党内新闻主管

^① 马星野：《读报观影罪言》，《中央日报》，1973年3月1日。

同志会议中质疑党部不支持党报，获得党营报业工作者的共鸣。^①

党营媒体的这种委屈，其来有自。作为国民党机关报和最高总裁喉舌的《中央日报》，委屈尤甚。其新闻言论尺度十分有限，不像中央社有独家发布中央重大消息的权力，却有不得泄漏中央机密的义务。^②同一消息，其他各报也许可以发表，《中央日报》却独独不能发表。社论则多半出自党报社论委员会。虽然《中央日报》的主持人大都是该委员会委员，但其领导人却是中宣部长或党内主管宣传的高级官员。报社主笔在民办报纸地位很高，被尊为论坛祭酒，但在党营报纸中只是个御用角色，被戏称为传声筒、^③打字机。^④党报工作者不得时常面对记者与党员的角色冲突，专业理想与机关报使命之间的冲突。偶尔记者天职战胜党员忠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中央日报》注定难逃“先中央、后日报”的宿命。

有心办报，无力回天。1991年6月19日，楚崧秋依例自请退休。回顾自己一生，跟随两蒋，服务于国民党的宣传事业，楚崧秋坦承办公家媒体不太可能全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让他感到问心无愧的是，无论如何，总算努力守住一个读书人的分际与骨气。^⑤

报禁开放后，党公营报纸失去了原有的政策性保护，开始面对读者和市场的选择。办报方针由过去的领袖导向变为市场导向。1988年元旦报禁解除当天起，《中央日报》增加为6大张。此后，不断调整报纸定位与版面设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1月版，第138—139、180页。

② 据陶希圣回忆，重庆时期，蒋介石对《中央日报》鞭策很严，责成其认真踏实地宣达中央政策；既要知道政情，参与机密，又不能泄漏机密。参与了机密，知道了政情，却又不能泄漏。同一消息，其他各报也许可以发表出来，只有《中央日报》不得任意发表。怎么办？这使《中央日报》感觉为难，结果在出报的时间上不如《新华日报》快，而言论新闻上又不如《大公报》——《大公报》甚至超越了《中央日报》而更能代表中央，其言论新闻也往往被视为反映了蒋介石本人的政策。参阅陶希圣：《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

③ 吴鲁仲：《解放前我在西昌宁远报的经历及其他某些活动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90年版。

④ 陶希圣、董显光都曾自称是打字机。陶希圣说，“我是打字机，我的意见没有提出的余地”；“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大抵暗示政治的动向”。董显光也说过，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他只不过是秉承上意，就像一架打字机而已。参阅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46、229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忆在重庆作记者的岁月》，《重庆报史资料》第17期，第3页。

⑤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8月版，第175页。

置，从家庭报、文教报到质报，但始终难以摆脱过去色彩。1988年6月20日，台湾省政府宣布，邻里社区负责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订阅《中央日报》，该报市场占有率从前一年的7.2%陡降至3.2%，由80年代初的50万份掉到10万份，再掉到只有3万份，而且主要是机关单位订阅。1996年6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下令市府各机关学校，不得订阅《中央日报》，也不得在该报刊登广告，又使得该报的机关读者群严重流失。《中央日报》不得不裁员减负，由最多时1000多人，减至700人、400人、300人、120人，到停刊前，该报与《中华日报》两家合并总计只有70人。高级采编人员大多跳槽，转往其他媒体或高校。^①在台南农贸市场上，《中央日报》居然被以吨计卖作包装纸用。

发行和广告严重下滑，《中央日报》亏损巨大，截至2006年4月，累积已达新台币8.14亿余元，平均每月亏损约844万元，令国民党无力负担。台湾社会又不断呼吁党政军退出媒体。在财政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2006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处分案》，停止挹注每年新台币9000万元的补助经费。5月31日，《中央日报》出版最后一期，当日报纸编号为28356号。虽然头版刊载《期待再相会》，宣称6月1日起只是暂时停刊，但是直到9月，该报才以“网络报”的形式与受众“再相会”。作为实体报，《中央日报》事实上已经永久停刊。^②有学者评论说，《中央日报》是过去的时代的尾巴，现在终于被切除了。

第二节 两大报系的崛起

侍从报业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采取了一手舞大棒、一手扔胡萝卜的双面新闻统制策略。棒子砸向不听命或拒绝被收编的媒体，对于服从与

^① 林正国：《中央日报改革的决心与作法》，《新闻镜周刊》第86期，1990年6月25日至7月1日。

^② “中国新闻学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97—2006》，世新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侍奉的媒体则给予扶持奖励。威逼利诱之下，除了极少数例外，此时期绝大多数台湾媒体都成为辅助当局或依赖当局的言论工具，也就是所谓侍从报业。根据林丽云的经典定义，侍从报业：

并不是自由报业，而是受到国家威权主义的控制，并与统治者发展出“保护主与侍从”的关系……以报业作为侍从的角色而言，他们的政治逻辑是要符合官方的要求，以争取更多的好处，他们的商业逻辑是要迎合市场的口味，以争取利润。在台湾的政治变迁中，报业必须迫于现实，平衡政治与经济逻辑，有时甚至要悖离侍从的角色。^①

侍从报业从保护者获得的好处是享有不少特权，包括提供较好的印刷设备，较充分的资金、纸张和资讯，税率优惠，^② 订报费补助，^③ 刊登当局广告，^④ 给予记者“乘车优惠”，^⑤ 对报社员工的米、油、盐等食品进行配给等等。^⑥ 余纪忠、王惕吾两位报业大亨更是被延揽进入国民党中常委。本质上，无论是50年代《中央日报》等党公营媒体一统天下，还是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两大报业王国霸权的确立，都是台湾报禁政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是侍从者获得的丰厚报酬。

尽管如此，侍从报业在报禁期间，也不是被动地完全苟且于生存，完全成为当局的应声虫。除了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博弈，作为报人的专业

① 林丽云：《台湾威权政体下“侍从报业”的矛盾与转型：1949—1999》，收入张笠云等编：《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结构分析》，远流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② “出版法”第24条规定，报纸不必缴纳发行收入之营业税，附属于报团的出版事业公司及其所得或其附属作业之所得免交所得税。

③ 台湾省政府每年编列政宣补助费专款，补助基层村里邻长订阅五家党公营报纸——所谓“村里邻长报”，文工会发函当局各单位、农会、议会、学校等，要求订阅《中央日报》，台湾省政府所属各单位要订阅《新生报》，军中必须订阅《青年战士报》。

④ 1952年前，由于经济困顿，报纸在台湾属于奢侈品，订阅量低，广告业务难以推展，主要以当局公告为主，而当局广告70%由公营报纸包办；1952年3月，规定公告以轮流刊登于各公民营报纸为原则。

⑤ 1951年4月公布《台湾省各报社通讯记者搭乘铁路公路乘车优待办法》，新闻工作人员票价为一概票价的四分之一。

⑥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86页。

理念和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同样成为影响民营报业的重要因素。在与当局和受众的复杂互动中，报禁期间的民营报业，特别是两大报系，不断因时而变，伺机而动，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威权体制的改变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立场明确的文教人士”

报禁解除后，台湾报纸一年内就从 31 家猛增至 100 多家。然而，无论多少新报纸来势凶猛，《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垄断报业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两大报系在报禁期间确立的王国地位无法撼动。1989 年，王惕吾宣称联合报系四大报发行量占据报业市场的 52%，加上中时报系的三大报，两大报系发行量超过台湾报纸总发行量的 80% 以上。^① 报禁时代，《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系号称“两大王国”，王惕吾被人称为“报皇”，显示了两报在报禁时代的巨大影响力，是名副其实的大媒体。

报禁时代，与威权当局有良好互动，既是成为大媒体的必要条件，也是媒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威权政体掌控媒体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掌控媒体所有权。31 家报纸中，国民党中央直接经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台湾省政府经营《台湾新生报》《台湾新闻报》，“国防部”经营《青年战士报》（后改为《青年日报》）、《台湾日报》等。^② 当局以介入市场运作方式，有效影响媒体言论和报道，防止政治异议人士进入媒体，以达到宰制新闻、政治压制的目的。所谓民营报纸，往往也与当局有良好关系。由于报纸主办者必须为“立场明确的文教人士”，不少人出自蒋介石的护卫、秘书、学生、文宣人员，像王永涛、王惕吾、余纪忠等人（表 10）。^③

① 施和梯：《两大报系政治押宝——中时、联合各押各的宝》，《财讯》第 95 期，1990 年 2 月，第 144—148 页。

②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第 87 页。

③ 王丽美：《报人王惕吾：联合报的故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第 16 页。

表 10：报禁期间台湾民营报业负责人背景^①

报刊名	负责人	与国民党的关系
联合报	王惕吾	黄埔军校学生，曾任官邸警卫团团团长，蒋介石同乡
中国时报	余纪忠	曾任职国民党中宣部
大华晚报	耿修业	曾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副总编辑
民族晚报	王永涛	曾任蒋介石警司团军需处主任
更生日报	谢膺毅	曾任军事委员会上校组长
自立晚报	李玉阶	国民党党员，曾任“财政部”要员
英文中国日报	魏景蒙 罗学濂	曾任《中央日报》社长、“新闻局局长” 曾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
英文中国邮报	余梦燕	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公论报	李万居	省议员
自立晚报	吴三连	省议员，台北市市长
民众日报	李瑞标	省市议员
台湾时报	王玉表	其兄王玉霄曾任高雄、台北市市长

两大报系负责人，无疑是最典型的“立场明确的文教人士”。他们都出身军职。王惕吾曾任总统府官邸警卫团团团长，余纪忠担任过政战工作，是蒋经国的爱将。王惕吾喜称自己是由职业军人转为报人，^② 他经营管理《联合报》的许多理念，诸如重视组织、效率，强调整体力量等，确实带有明显的军营风格。但是，作为军人，最重要的品格乃是服从与忠诚。作为蒋介石的“子弟兵”，他效忠的对象无疑是蒋氏父子。^③

像王惕吾一样，余纪忠也有过很长的军旅生涯。1932年，余纪忠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两年后，到英国伦敦学院读书。七七事变后，整装回国，投入抗战，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校刊《力行》月刊主编。抗战后期，国民党成立青年军，他在蒋经国任主任的政治部任职。1946年，36岁的余纪忠先是奉蒋介石之命到东北负责与苏联接洽交接

^①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②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页。

^③ 彭明辉：《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事宜，后转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蒋经国的秘书。从大陆到台湾，余纪忠和蒋经国有数十年交情。无论是关于舆论民情，还是遇有重大政策，他都是蒋经国经常咨商的对象。

国民党退台后，王惕吾和余纪忠弃武从文，创办了各自的报纸。双双被选入专为培训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而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学习，接受蒋介石的亲自训导。据查，在研究院期间撰写的心得报告中，王惕吾表示：

余自军校受训及服务期间，均随领袖左右，故受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特深，为人处世，无不以领袖人格为准绳。

论及创办《民族报》的意图，王惕吾则称：

遵奉总裁训示：吾人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竭尽所能创办《民族报》（在台北出版），誓以一息尚存之决心与共匪奋斗到底，尽党员一份子之责任，以报党国。

有学者考证，《民族报》创办之初，便担负起促成下野的蒋介石到台复行视事的使命。^①

余纪忠的心得报告中同样饱含了对领袖的深情：

自问亦为党国干部之一，目系耳闻，总裁之检讨自咎，声声入耳，芒刺在心，感动之余，更不觉汗颜无地也。

年近40，余纪忠创办《征信新闻》，编辑部就设在竹棚里，没有检排印刷设备。虽然只是一张四开油印报，其惨淡经营，固然是以言论报“国”，更是以言论报“党国”。

^① 习贤德：《革命实践研究院档案中的王惕吾与余纪忠》，载《传记文学》第84卷第2期，2004年2期，第21—23页。

从民营报到“民营党报”

就像《中央日报》时时面临“中央”与“日报”的内在冲突，王惕吾、余纪忠等人在向威权者表白忠心的同时，也不能不面对市场竞争。在威权与市场之间，王惕吾走的是“稳健务实路线”，^①余纪忠则力求商业生存与政治生存的平衡。^②

1950年元旦，王惕吾刚接办《民族报》时，订户仅数百，发行量仅1000多份。^③为了突破困境，王惕吾与《全民日报》的林顶立、《经济时报》的范鹤言等人商议，集中人力物力联合出版，获得认同。1951年9月16日，《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发行，是为《联合报》的滥觞。3位合伙人各自出资30000元，200令纸，轮流担任董事长、发行人和社长职务，并约定“盈余不分配”，用于再投资。这种合伙方式，王惕吾自称是“中国报业突破‘文人办报’形态，转向企业化经营的一种发轫”。^④由于林顶立和范鹤言较少处理社务，王惕吾成为联合版的实际负责人，也被称作“《联合报》精神的孕育者与维护者”。^⑤

1950年秋，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余纪忠创办《征信新闻》，为四开油印报。最初的编辑部，是开封街一间小日式平房前的简陋竹棚，冬天冻死人，夏天可以烤番薯。报纸内容以民生物价为主，第一天才卖了十几份，后来因为物价报道得准，被称为“鸭蛋报”。1961年1月1日改名《征信新闻报》。1968年9月1日起更名为《中国时报》。

与党公营报业相比，王惕吾、余纪忠等人主持的民营报在新闻与言论方面，更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也后来居上。1949年到1957年，当局支持的报纸的销售量增长了58%，而私营报纸的发行量却增加了560%。1959年9月16日，《联合报》宣布发行量突破8万，超越《中央日报》，成为台湾第

① 叶邦宗：《报皇王惕吾》，四方书城2004年版，第169页。

② 张慧英：《提笔为时代：余纪忠》，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4月版，第37页。

③ 王丽美：《报人王惕吾：联合报的故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2页。

④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8页。

⑤ 马克任：《我站在联合报的屋檐下》，载张作锦主编：《一同走过来时路》，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5页。

一大报。

民营报比党公营报更受读者欢迎，自然不受当局欢迎。20世纪50年代，当局先后推动“文化清洁运动”，颁布“九项禁令”，用意明显都在规范和控制民营报的言论报道。《联合报》就公开呼吁，不要让“文化清洁运动”成为别有用心者假借的利器与当局钳制议论的工具。1958年，国民党提出修改“出版法”，党公营报纸不敢说话，民营报纸群起反对，并酝酿发动请愿，推余纪忠为首。《征信新闻》接连发表了多篇社论，对当局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行政院秘密提请立法院修正出版法，正是扼杀新闻自由的一大步，因为此一修正案严厉束缚新闻自由，违反宪法基本精神，在立院又以秘密会议审议，足见其隐藏畏惧舆论的不可告人机谋。本报呼吁立委们审议本法必须谨守新闻自由原则。^①

从3月28日，“行政院”以“密件”方式把“出版法修正草案”送达“立法院”请求审议，到最后蒋介石亲自干涉，强行秘密通过，在历时83天的“立法”过程中，《联合报》批评尤力，先后发表了11篇社论进行批评。^②在社论《异哉！立委们的坚持成见》中，该报尖锐指出：

那些始终反对公开审议的立委，所以不说理而只举手，另有他们的苦衷。因为他们明知公开审议之合法合理合情，没有任何必须秘密审议的理由可以说出来，但同时又受了某种幕后的指示和约束，非反对公开审议不可，于是只有出诸不说理而只举手的一途。

① 社论：《现代报人与现代报纸》，《中国时报》1958年9月1日。

② 11篇社论分别为：《我们沉痛抗议 论出版法修正草案之不当》（1958/4/13）、《民主法制不容摧毁》（4/15）、《借箸以代政府笔——三论出版法修正草案》（4/16）、《施政的几项原则》（4/18）、《立法院错了》（5/1）、《立法院历史荣辱的关键》（5/2）、《异哉！立委们的坚持己见》（5/3）、《从国家利害看出版法的修正》《立法院如何自立？》（6/6）、《论团结之道》（6/18）、《出版法修正案通过之后》（6/21）。

《从国家利益看出版法的修正》社论更是直接向蒋介石进言：

国家能否如众人的愿望蹶而复起，蒋先生正确的领导乃属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但正确的领导有赖于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必须有真实的资料以为依据。元首资料的来源，一部分当然要靠他的僚属，其另一部分则不能不期诸大众的舆论。官方的报告，因自我利害，本位主义，和主观认识每不免有所偏蔽与缺漏，甚至粉饰太平，则舆论的矫正乃为惟一获致代表真相资料的法门，再通过我们这一位最高领导者睿敏的判断，自就有其正确的领导产生。韩非子所谓兼听则聪，该即指此。倘使照拟议中修正出版法的条文，执笔者怵于随时得祸的恐惧，发行者害怕迟早有关门的一天，大家面对缺失不敢予以披露评议，则官方的报告便将成为领导者资以判断的唯一凭依，这弊害危险是无待繁言的。何况，此时而求政局的稳定，政府必须有知机与预防的能力，如何发挥这一能耐，去壅塞以显全貌，要为新闻界可以贡献其心力的地方。只要新闻界随时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杜渐防微日新又新，政府才有其充分的根据与可能。这又是我们不能同意出版法修正条文以束缚聪明之另一原因。……我们所最担心的还是，倘如这一出版修正条文不折不扣地获得通过，大家从此怵于祸患而对眼见缺失缄口不言，而出现满纸的颂扬好话，则乡愿、官僚、蒙蔽之风，将益无顾忌；而民情真相也将愈难上达于最高领导者，则中蚀内腐，有心人将益见其莫可如何了。

5月24日，“立法院”三委员会讨论报业公会要求保护新闻自由请愿案。次日，《联合报》头版新闻予以报道。28日，《联合报》头版报道了胡适反对修正“出版法”的态度。6月3日，台湾省临时议会通过“建议立法院慎重审议以昭公允”案，《联合报》头版予以报道。6月5日，“立法院”三委员会不顾报业公会的请愿，开快车通过“出版法修正案”。6月6日，《联合报》发表社论《立法院何以自立》，表示强烈抗议：

这一次对报业公会请愿案的决议，既未经充分辩论，又违反议事规则付表决，更不惜擅造决议，进而举手成城之下予以追认。其毁法乱

纪，至于斯极，已非复上次决议可相提并论，此所以我们已不欲再为我们新闻界请愿权利之被扼杀一事悲，而要为整个国家民主前途的晦暗前途，失声痛哭也。

“立法院”二讯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后，《联合报》发表《论团结之道》。社论说：

出版法的风波，闹到今天……我们所最不能了解的，为什么当局一定要拿这么一个严重问题来考验大家，仅仅为了如当局表面所宣布的“取缔黄色”而把民主与团结这两个宝贵的原则来牺牲？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修正案如竟通过，事实不仅损害民主，并且同时也损害了团结。民主与进步，是海内外人民所一致热爱的两大理想。如果说，政府措施都能与这两个理想相符合，则用不到任何特殊的努力，就自然而然可以达成广大的团结。如果说，政府措施统统都与民主与进步的理想相违反，那就不仅是在制造反对，甚至是在强迫人们非反对不可，因为人们终有一天会感觉到，不能为了团结而把一切值得珍贵的东西都全部放弃。团结之道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切事都做得合乎天理，顺乎人心，就自然会赢得普遍的支持与拥护，用不到去疏导，用不到去发动，更用不到去施行压力。如果一切都要强而后可，则即使做到形式上的团结，那种团结也发挥不出真正的力量来。

6月20日，“出版法修正案”通过后，《联合报》社论明确表示：“政府之抹杀一般舆论的存在自蔽聪明，势将影响在人民心目中的评价，其遭受损害的，将不是我们几家‘私家报纸’，而是整个政府。”《征信新闻报》的评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痛感于损害新闻自由的成分少，而痛感于政府及立法尊严受损者多。”

民营报业对于修改“出版法”的强烈反对，使当局大为不满。“行政院长”陈诚、“副院长”黄少谷均找余纪忠沟通，余纪忠始终不愿让步。国民党中常会上，陈诚甚至说：“像余纪忠这类人，都该送到绿岛去。”蒋介石约见五位国民党籍报纸负责人时，王惕吾也宣称病重住院。据王惕吾本人回

忆，当天晚上，他就回到报社，亲自主持编辑会议，对各级主管表示：“我有一天不在的话，就组织管理委员会，由总编辑当召集人，继续我的理念，联合报永续奋斗。”他还发下调查表给员工，结果八成五的人支持他。^①

反对修改“出版法”，是报禁期间民营报业与政治权力间的第一次较大的角力，结果以民营报业的失败告终。1960年，发生了《自由中国》和雷震案，引发民营报业与威权统治之间的又一次角力。

1960年9月6日，雷震被捕第二天，《联合报》就发表社论《我们对雷震案的看法》，率先打破新闻界的噤若寒蝉，表示“超然公正人士自有定评”。9月7日，《征信新闻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当局“应以事实来证明处理本案所悬的原则，并表示政府有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自由之决心与信念”。雷震案宣判前一天，《联合报》又以迂回方式引述胡适认为雷震案判决有欠公平的话，以示声援。为此，时任“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曾受蒋经国之命到王惕吾家劝说，^②并下令军方机构禁止订阅《联合报》，该报因此遭遇了第一次“退报运动”。“出版法修改案”过程中，蒋介石曾对新闻界有过威胁暗示，雷震案中当局又主导了《联合报》“退报运动”，重压之下，民营报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不得不有所收敛。与此同时，进入60年代，国民党开始面临新的危机，也不得不转而对民营报实行更多的笼络。威权和侍从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两家主要报纸负责人从此经常被邀请参加新闻工作会谈，恭听领袖训示；另一方面，对于表示驯服的报业，当局也转而给予更多的示惠。

1963年9月，蒋介石同意王惕吾访美，联合报系之后遇到状况，也一次次化险为夷。1967年当局同意《联合报》购买《公论报》，改办财经专业报《经济日报》。1972年，当局给予《联合报》无息贷款，以助其度过经济危机。1978年，又准其购买《华报》，此后改名为《民生报》。此外，《联合报》还获准发行《美洲世界日报》，为国民党作海外宣传。同样，《中国时报》获准购买《大众日报》，改为以经济事务为主体的《工商日报》。同年，蒋经国召见余纪忠，希望他到美国办报。1982年9月1日，《美洲中

^① 叶邦宗：《报皇王惕吾》，四方书城2004年版，第200页。

^② 叶邦宗：《报皇王惕吾》，四方书城2004年版，第191—193页。

国时报》创刊。

在国民党的大棒子和胡萝卜的双重政策下,《联合报》《中国时报》谨守报道和言论边界,以服务于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换取当局支持,逐渐取得台湾报业的垄断地位。当局同意两大报将报纸张数由两大张半增至三大张,并允许其发行十个以上的地方版,两大报乘机进军全台报业市场,挤压了其他报业的生存空间。《中国时报》《联合报》的发行量分别于1979年、1980年突破100万份。1987年,两报皆自称发行量为150万份。两家合计,占了当年台湾报纸总发行量为370万份的近80%。1986年,全岛报纸广告收入为两亿美元,两家占了其中的70%以上。报业收入愈丰,言论胆子愈小。1979年,蒋经国亲自提名余纪忠、王惕吾,双双进入国民党核心中常委。

由此可见,两大报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降,在报业竞争中迅速崛起,乃是与威权体制不断互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两报从与党公营报业艰难竞争,到逐渐取代党公营报业功能,配合当局舆论导向,成为国民党发声的重要出口,尤其是两位老板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后,两报也逐渐由民营报业转变为“民营党报”,^①甚至被称为“党国媒体”。^②换句话说,所谓民营报业,也就成了当局借政治和市场双重运作,防止政治异议人士进入言论市场,达到宰制新闻、政治压制目的的侍从报业。

“把握时代与社会的两重脉动”

如果说报禁政策下威权者的保护,是侍从报业得以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央日报》等党公营报刊有理由比一般民营报业获得更大成功。可事实上,经过60年代的发展,《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民营报业后来居上,市场占有率和舆论影响力均逐渐超过党公营报业,并取得垄断地位。可见,当局示惠报业,只是侍从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两大报业王国的异军突起,除了王惕吾、余纪忠与两蒋的特殊关系,其内在原因还在于两报能把握战后台湾的政经脉络与媒体环境,顺应时代,作出成功应对。王惕

①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② 金恒炜:《台湾媒体的结构性分析——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为例》,《当代》第138期,2006年。

吾总结自己的办报与经营方式就是：把握时代与社会的两重脉动；^① 余纪忠办报的特质，同样表现为对时代潮流敏锐无比的掌握力。^②

《联合报》创刊40周年纪念时，王惕吾回顾过去的历程，如此总结民营报纸企业化发展的“联合报经验”：就内容取向而言，《联合报》初期走社会大众新闻路线，也就是走入社会基层，走出都市，探索社会脉动，把握民众意向。其后，随着社会多元化变迁，价值观念变化，《联合报》在内容上不断配合与适应，而作出必要革新，特别是1983年将第3版改为现代生活版，“尤其是把握时代与社会脉动的又一次‘拓边’”。^③

1951年《联合报》创刊之初，台湾平均国民所得，按当年价格计算为新台币1275元，其中用于购买食品消费占56%。当时报纸销售仅限于少数较大的都市。《民族报》与《经济时报》《全民日报》三报单独发行均不超过1万份，广告收入每月都在3万元以下。三报联合版发行第二年，台湾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同时实施农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全省自耕农由124000余户增至693000户。原本冻结于土地上的6亿多新台币资本，由此转向工业建设，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国民所得年增长率，按当年币值计算达到12.6%。60年代，陆续推行第三、第四期经建计划。为突破“国内”市场限制，鼓励出口导向型经济，带动经济快速成长。媒体广告量每年以21%的速度增长，其中一半流向报纸。70年代到80年代，更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那时候有一句俗语：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④

与此同时，台湾民众适龄儿童就学率和识字率也不断提升。1953年，台湾适龄儿童就学率就已达90%以上。文盲人口率1950年为44%，1967年降为19.5%，1970年降为6.1%；报刊需求率也相应由1950年的340万份，上升为1967年的880万份，1970年更升至1020万份。订阅一份报纸的费

①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7页。

② 张慧英：《提笔为时代：余纪忠》，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4月版，第37页。

③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62页。

④ 南方朔口述，韩福东撰稿：《台湾报禁解除前后》，《先锋国家历史》第14期，2008年4月（下）。

用，则由1953年占总收入的10.8%，降至1971年的4.1%。^①从1951年至1958年，《联合报》发行量由12000多份增加到70000多份，广告收入由145万元增加到542万元，报社员工由150人增至259人。到60年代末，发行量猛增至40多万份，广告升至7800万，员工扩充至1000多位。1976年，发行量突破60万份，1980年达到100万份。^②

虽然发行量剧增，但是，由于报禁限张政策，许多新闻不得不删略或放弃；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不能不割爱；许多各行各业的广告被延搁，甚至刊登不出来。为了适应工商界刊登广告的需要，各报不得不改用换版的方法以尽量容纳。有时，商业广告在周末必须换4次版，分类小广告必须换6次版，仍不免有许多广告受到挤压不能及时刊出。《联合报》为此还多方扩增报纸栏数，以求增加新闻刊登量，最后被迫采取缩小字体的方法。此外，力求新闻精写精编，不断改版，做到“条条精彩，版版权威”，并尽可能增辟地方版。忠孝东路时代，《联合报》的地方版多达19版，使联合报的篇幅由形式上的3大张，增加为实质上的10张上下。^③

余纪忠也以自己的方式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壮大《中国时报》。他是亚洲率先推出彩色印刷报纸的人。1968年3月，余纪忠不顾众人阻拦，大胆将办报多年的盈余全部用于订购最新型的照相制版彩色轮转机。《征信新闻报》改为彩色印刷当天下午，老报人欧阳醇到报社道贺，但第二天只有副刊半张彩印，因为彩印成本太高，欧阳醇深感余纪忠创业精神可佩，却也慨叹不如将购买机器的巨资用于培植人才。^④同年9月1日，《征信新闻报》更名为《中国时报》。1970年代，台湾杂志数量不多，平均每百户订不到十份杂志。当时报纸只准出三大张，资讯承载非常有限，余纪忠决定办一本“最大的杂志”。他坚信，台湾的经济成长及教育已经累积了相当能量，民众对休闲娱乐等信息的需求增加，足以支撑一份娱乐性强的综合性周刊。1978年3月5日，《时报周刊》创刊。

① 赖金波：《台湾经济发展对报业之影响》，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72）。

② 于衡：《联合报二十年》，《联合报》社1971年11月版。

③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0—91页。

④ 续伯雄辑注：《台湾媒体变迁见证：欧阳醇信函日记（1967—1996）》，时英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无疑是两大报系崛起的根本原因。然而，王惕吾、余纪忠两位杰出报人能把握时代和社会脉动，在威权与市场之间求取平衡，其卓绝的报人品格与经营艺术乃是两报称王的决定性因素。^①王惕吾晚年曾提出“正派报纸”的观点。他说：

联合报不是官报，而是民营报纸，这是基本的报纸立场。但是，我们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也不是中立派，而是正派的民营报纸。正派的报纸也无所谓前进或保守。我们是正道的、正直的、正确的、正当的、正义的、正中的、正谊的报纸。^②

余纪忠也有过类似表述：

个人可以隶属不同的党派，报纸则无党派的歧别，报道本诸事实，评论一本是非，两者均不涉党派之私。

两大报系均信奉中立客观，固然继承了文人办报的传统，但作为“民营党报”，这些表述也不无标榜的成分。事实上，就像蒋介石会在不同时期会运用曹圣芬、楚崧秋等不同人物，在许多人看来，蒋经国对于两大报系的运用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大报系的竞争与矛盾，除了市场因素，当政者的操弄也是重要原因。早期的《联合报》被认为拥有一定程度独立性，1958年反对修改“出版法”便是体现。但是，1960年发生雷震/自由中国事件之后，《联合报》逐渐采取保守立场，通常代表国民党右翼的意见，有意向军方和“国安”系统靠拢。与此同时，《中国时报》则采取了较为自由的立场，特别是处理“国内”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时候，代表着国民党左翼

^① 王惕吾就曾表示：“怎样才能使报纸的独立报道与评论，符合国家社会利益的最高要求，是我经营联合报所面临最大的挑战。”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页。

^②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6—17页。

的意见。^①

“边缘带动中心，社会带动政治”

为了顺应受众需求和市场发展，同时避免在意识形态上挑战官方，《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民营报一直在寻找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结合点，寻找新闻与言论的突破点。由于时政新闻较多禁忌，结果导致以往主流报刊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社会新闻，在报禁期间得到超乎寻常的发展，甚至成为报业竞逐市场的主导产品。有的报纸几乎自创刊开始，就肆无忌惮地在社会新闻上作最大渲染，在销路上渐渐越过党报。^②

王惕吾自己也承认，走社会新闻路线，是《联合报》所确立的一个新闻报道原则，也是该报大受欢迎的原因。不过，他同时强调，《联合报》注重社会新闻，并不完全为了推广销路，而是该报走社会路线的必然做法。

王惕吾将《联合报》走社会路线的新闻策略，比拟为美国报业史上的进步运动与扒粪新闻。他解释说，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去正视它，提出来让朝野重视，才能获得正确合理的解决。《联合报》报道社会新闻，是要扬善，但不能隐恶。暴露和揭发若干社会问题，是报纸应有的勇气与责任。他深信，广大读者重视社会新闻，并不限于新闻本身，必然会引发大家对社会问题的重视。许多正确的进步的观念由此得以形成和确立。他举例说，譬如改善养女习俗，治安人员办案时不可刑求，尊重人民隐私权等等，这些观念都是经由社会新闻报道孕育产生的。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休闲时间增加，社会的构成也由少数士大夫阶级为主体演变为广大民众的共同体。社会所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情，利害关切者日益增多，大家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感也日益强烈。新闻事业必须有效地把握这些社会需要，适应大众需要，“使新闻报道与民众生活、与社会活动打成一片”，这才是《联合报》的社会新闻路线。^③

王惕吾从报业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社会新闻作了与众不同的解读——

①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47页。

②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8年6月版，第61页。

③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页。

将社会新闻与社会事务进行联结。他将社会新闻理解为“社会需要的新闻”，并非完全为了消除一般受众对于社会新闻的成见，替社会新闻披上一件有品位的外套，以答复社会质疑，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社会新闻的指责，作必要的辩解。事实上，《联合报》的社会新闻报道，确实在尝试突破以往那种耸动猎奇式的报道方式，而注意挖掘新闻发生的社会背景，分析新闻背后的社会关系，探讨新闻产生的社会影响，帮助读者完整、理性地认知新闻事件。按照王惕吾理解的社会新闻理念，凡是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事物，只要不违背公众利益、道德规范，无论扬善或揭恶，均为《联合报》社会新闻报道的对象。^①

走社会新闻路线的并非只有《联合报》。事实上，报禁期间台湾各报的版面上，每天都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联合报》第三版基本是犯罪新闻。1964年，《联合报》曾因为采访影后林黛自杀新闻，发行量在短短一周内增加3万份。^② 据统计，1975年，两大报各类新闻中，比重占前4位的，《联合报》是社会新闻（社会事务公共资讯）、财经新闻、犯罪灾祸新闻、体育新闻，《中国时报》为财经新闻、犯罪灾祸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新闻；到了1984年，《联合报》变成是社会新闻、犯罪灾祸、艺术影剧新闻、财经新闻，《中国时报》则是财经新闻、犯罪灾祸新闻、社会新闻、科学文教。^③

可见，社会新闻，既是报禁时期台湾各报用以竞争的制胜法宝，也是两大报系长期主打产品。如果遇上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各报更是蜂拥而上，打得不可开交。瑠公圳分尸案的报道就是著名的例子。

瑠公圳分尸案发生在1961年2月26日，从案发次日到4月19日警备总部破案后两日，连续52天当中，《联合报》几乎天天有报道，总计刊登了339则有关新闻，《征信新闻》登了264则，《台湾新生报》登了249则，连《中央日报》也登了232则。有关该案的新闻占各报版面的比重，日报最高为11%，晚报则占到18%。以当时全部新闻版面总量计，该案相关报

①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8页。

② 林思平：《通俗新闻：文化研究的观点》，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12页。

③ 李瞻：《我国中央日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三大日报内容之统计分析》，《新闻学研究》第17期；《当前我国三大日报内容之统计分析》，《新闻学研究》第36期。

道占到5%至18%强。^① 对于此案的报道，各报不仅刊载版面多，而且纷纷派出强大的采访人马，在新闻争夺中花样百出。除了《自立晚报》较为谨慎，其他报纸均屡屡突破专业规范。记者或者乔装刑警混入侦查指挥中心，或者在警方之前抢先“破案”，堪称台湾报业热衷追逐社会新闻最“投入”的一次，也是台湾报业渲染社会新闻的“经典之作”。^② 警总宣布破案后，《自立晚报》曾发表社论总结报界在这次事件报道中的教训。社论指出：

单纯着眼于新闻的“新”、“速”，而忽略了求真求实，未顾及其深远的影响，有时便会有违“负责的”报道的原则，无意中伤及无辜，铸成足以内疚的错误。^③

案件真相大白后，曾被各报指为犯罪嫌疑人的柳哲生将军和家人，立即向台北地检处提出诉讼，《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社长范鹤言等三人被控犯有诽谤罪。最后经《自立晚报》和国民党中央第四组出面协调，台北市报业公会组织“道歉酒会”，王惕吾等人当面向当事人道歉，事件才告平息。

瑷公圳案的新闻争夺战中，《联合报》在采编力量和版面投入上，均拔得头筹，王惕吾本人最后也被诉诽谤。但在王惕吾和《联合报》看来，此案在报道方式上或有许多检讨之处，在根本点上却没有错误。因为记者对于该重要新闻的采访是其神圣职责。该报社论说：

此次为了采访分尸案新闻，记者沐风栉雨、日以继夜的奔驰追逐，与其说是新闻记者的多事，毋宁说这是新闻记者为了职责不得不如此。这与治安人员不眠不休的搜查人证物证而力求破案以尽职责是一样的道理。^④

① 赵婴：《瑷公圳案新闻报道之比较与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62年），第240—241页。

② 王天滨：《台湾社会新闻发展史》，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③ 社论：《瑷公圳分尸案的教训》，《自立晚报》，1961年4月18日。

④ 社论：《分尸案的侦破与新闻采访》，《联合报》，1961年3月10日。

对于如何报道社会新闻，特别是犯罪新闻，一般人都认为不必过于渲染。王惕吾对《联合报》编辑记者的要求却是，渲染不必，但报道必须翔实。他认为这有助于民众对善恶、邪正、是非，获得更清晰的辨识。在他看来，社会上发生了的事情，并不会因为掩饰不报或轻轻带过，便可不再发生。因此，正当的方式是正视它，了解它的前因后果、背景与因素，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并且对读者起到教育作用。读者应该知道的真相，不单是犯罪行为本身，还要更深一层了解犯罪的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家庭的种种因素。也就是说，读者应该在社会新闻中认识社会，包括它的生机和它的症状。对于瑯公圳案的详尽报道，目的不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也引导着读者去探索案发背后的社会问题。

如此看来，社会新闻，不仅仅是《联合报》用来突破报禁政策下时政新闻受到限制的一种消极性的策略，^① 它也带有报业积极与政经互动、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因此，王惕吾赋予社会新闻以“革命”的意义。他从传统“公报”的观念出发，将社会新闻视为时代与社会脉动的反映，突破了一般人将报纸视为“刊载国内外大事”的狭义的媒介观念。

王惕吾认为，所谓国内外大事，包括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但是，报纸对读者的服务，至少不应该疏忽日常生活的身边环境。他以欧美、日本的报业为例，社会新闻往往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因为社会新闻与大众生活关系最密切，对读者具有最直接的影响。譬如，某个企业人物被绑票，是一条社会新闻，但对社会大众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下于波斯湾危机。许多社会问题，如养女问题、青少年问题、犯罪问题、迷幻药问题、伪药问题、空气与环境污染问题、青果菜市场问题、食物防腐剂与过期食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障问题、交通秩序问题、卖淫与色情问题、经济犯罪问题等等，都是如此。

按照王惕吾“社会新闻的革命”的观点，《联合报》所报道的社会新闻，“不是社会现象的新闻，而是社会问题的新闻”；其报道方针，也就要突破旧上海滩一些小报刺探内幕的境界，而将社会问题、社会新闻、民众活

^① 赖光临：《检验七十年代报业的发展》，载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八十年版》，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1年版，第68页。

动提高到开放社会的境界，使读者了解社会事务的前因后果，增加对善恶、邪正、是非的清晰辨识，并激发大众的参与感，打破大众对社会一片散沙的疏离状态。^①

由此，《联合报》的社会新闻之路，也就变成一条民生新闻之路，进而成为通向政治新闻之路。60年代以后，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报道，便开始面向大众的教育娱乐等需求，扩大资讯服务，倡导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开放、多元的新观念，致力于促进台湾民众的现代化。^② 1983年8月10日，《联合报》将原来刊登犯罪新闻的第三版改为“现代生活版”，题材转往环保、教育、科技、人权等新方向。后来创办《民生报》，王惕吾更是明确揭橥“实践民生主义、促进大众福利、提高生活素质、倡导健康活动”的方针，希望《民生报》带领读者做现代化公民，过现代化生活。^③

由社会走向民生，由民生走向公民，王惕吾的社会新闻果然具有“革命”的意义。可见，社会新闻一开始虽然是民营报业在报禁政策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策略，但是，当社会新闻的意涵被拓展为“社会问题的新闻”，社会新闻的报道，由讲述事件到分析事件背后的政经脉络，引导民众认知社会现象，特别是引导民众参与社会讨论，甚至采取社会行动，此时的社会新闻已然由社会走向了政治。至此，“社会新闻的革命”——“以边缘带动中心，以社会带动政治”，其意义也就完全呈现。

①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4—70页。

② 1965年2月开始，《联合报》基于“观念的革新，重于行动的努力”，发表了《我们亟须接受的新观念》系列社论共8篇。这些社论主张，勇于放弃旧传统中的糟粕，才能产生新的观念意识，蔚成新的气象，因而必须充分吸收新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生产性、建设性文化。具体包括：主张尊重人权厉行法治；主张确立公私权益关系；主张提高公益道德，划分群己道德；主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大企业，让企业发财，保护消费者利益；主张新重商主义；主张在求富中求均；鼓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倡责任政治观念；主张维护人权，尤其个人为维护本身权益不受侵犯而奋斗；提倡工业化的勤俭观念，工业社会的财经立法、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开；主张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念等。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6页。《中国时报》同样坚信“中国前途唯一的希望，是寄于民主自由的实践”，不遗余力地倡导符合民主自由的进步观念。1982年9月，创办《美洲中国时报》。发刊词《自由、民主、爱国家——我们一贯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称：“中国时报在以往的岁月中，殚精竭虑以赴者，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实践。我们踏实报道新闻，期待促成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传播观念，希望导致社会的革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评论时政，旨在匡正缺失，趋向进步。”

③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3页。

“社会新闻的革命”对于威权体制所可能产生的解构和冲击作用，必然会引起当局警惕，防堵也随之而来。事实上，早在1954年，当局推动“文化清洁运动”和“九项新闻禁例”，社会新闻便是“清”与“禁”的重点内容之一。埤公圳案发生期间，国民党中常会以社会、犯罪新闻为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当年5月，第四组在中常会会议上提出的报告中，也特别批评了报纸对于犯罪新闻的报道：

查近年来本省报纸，基于纯业务观念，不惜夸张犯罪新闻，以迎合读者心理，以致新闻报道，显失平衡。埤公圳分尸案发生后，继之公路局及公车处舞弊案，各报竞争激烈，报道尤形混乱。流弊所及，不惟罔顾法律，累及无辜，使凡涉及案情之人，名誉信用，横遭损害。且各报采访不择手段，治安当局，深遭困扰，几致无法执行公务。且造成社会乖戾，供共匪利用为心战之资料。^①

此后，第四组专门提出《改善犯罪案件报道之新闻政策纲要》，要求主管机关严格依照“出版法”对相关新闻加强审查。同时，希望利用座谈会、小组会议和个别晤谈等方式，与新闻从业人员沟通观念。新闻评议会成立后，社会新闻自然也成为“评议”的重点内容。但是，毕竟青山挡不住，社会的脉搏，时代的洪流，总以其不可遏止的力量，冲撞并淘汰掉妄图阻拦的意图。

从社会到政治

一般而言，社会新闻对促进一张报纸的销路有极大贡献，但一张报纸要想确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还得靠时政新闻。就这一意义言，社会新闻由社会走向政治，既是民营报业把握时代与社会双重脉动的结果，也不无市场策略的考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联合报》便由社会新闻为主，逐渐转向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并重，最后树立起政治新闻报道的权威性。

如果说，社会新闻路线是报禁政策下报人选择的一条既保护报业存在，

^①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同时又发挥报业力量的路线，是一种避祸策略，^①也是一种迂回的进攻战略。那么，非社会新闻，特别是时政新闻报道，对于威权当局的刺激就更为直接，风险也更多，需要的勇气与智慧也就更高。

早在1957年4月10日，《联合报》社论揭橥“反共、民主、团结、进步”，作为该报新闻言论最高准绳时，就要求当局：“用民主宪政来争取民心，以民主宪政实效来达成革命所悬的理想。”《联合报》一再强调“政府固有许多可批评之处”，但是，“争取民主不能用非民主的手段与方法”，力主维护和巩固当局领导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戒严时代《联合报》的当局中心论，颇类似于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两者都将维护现当局作为其生存和立论的前提与基础，而同时要求当局不断求变求新，“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化各方面计日呈功”；并且向当局呼吁：“今天与其介怀于受到国内外什么批评，不如以行动上的表现来赢取同情拥护。”^②同样，余纪忠主持《中国时报》，一方面，主张“争自由与爱国家，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两项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又一再告诫同仁：“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抱负之外，对于整个时代趋向和国家处境，更应有明确的认知与关怀，才能对国家全民所关切的问题有周延的考虑和积极的贡献。”总体上，还是将“国家”自由置于新闻自由之先，将政治逻辑置于商业逻辑之先，将生存置于发展之先。总之，在报禁政策下，两大报系谨守“该争取的必争取，该配合的必配合，该适应的应适应”的原则；勉力而为者，乃在忠于党国、服从当局的原则立场之下，尽量表现出适应客观条件的弹性。^③

进入70年代，台湾威权统治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交相作用的压力。留美学生掀起的保钓运动对台湾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冲击，也开启了他们对于戒严和威权统治的反思与批判，在这场被称为台湾的五四运动的引领下，新世代的台湾大学生开始走出书斋和校园，深入到工厂农村，去做启蒙工作。威权高压下的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初春大地般的松动。

① 陈顺孝：《新闻控制与反控制——“纪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五南文化2003年版。

② 社论：《纪念社庆，忧心国是》，《联合报》1960年9月16日。

③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22页。

在这一历史时刻，才子诗人高信疆创办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戒严时期，文网恢恢，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在非政治领域，报纸有较大的自主权。除了走社会新闻路线拓展市场，两大报系还曾透过举办文学奖项，希望借此另立文化正典，提升自身地位。^①高信疆在此基础上，利用副刊题材较为安全的条件，大胆革新版面，全力尝试改变传统文人副刊的性质，将文艺副刊发展为文化副刊，将文人副刊提升为报人副刊，使副刊具有现代传播的新思维，譬如新闻性、现实性、时间感和速度感等。比起“高式副刊”在版式上带来的革命，高信疆的真正贡献在于，当时台湾民间开始萌动许多呼声，因为无法登上新闻版（正刊），他巧妙地借助副刊管道，为知识分子开辟一条言路，也为社会舆论搭建一个讨论的平台，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会参与功能。^②

高信疆曾先斩后奏，冒着被革职的可能，刊出李敖刚出狱后写的《独白下的传统》。但是，他经营人间副刊的第一个创举，则是开辟“海外专栏”，巧制议题，广邀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作家执笔，特别是在美国定居的台湾学者，举办座谈会、演讲会，撰写文章和评论。这些学者文章与以往副刊上的文学作品不同，大多直面台湾社会问题，展开理性对话，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众声喧哗中，既产生了一批意见领袖，更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人间副刊因此一度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在戒严时代，高信疆以一己之力，为台湾开展言论自由以及多元化所做出的贡献，被公认为“纸上风云第一人”。^③

高信疆的人间副刊，加上痲弦主持的联合副刊，可以说是两大报系继社会新闻革命之后，开辟的另一条突破报禁的副刊革命之路。报禁前夕，两大副刊通过专栏经营借题发挥，举办种种座谈会、演讲会，偷渡某些敏感议题，以适当缩短报纸言论与现实民意的距离，有限度地扮演起公共论坛的角色，发挥启蒙及沟通的功能，为台湾正在发生的社会巨变，在民众心智上预作准备。有些栏目名称，即能反映编者的用心，像“话题与观念”，实际上

① 黄顺星：《记者的重量》，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0页。

② 痲弦：《高信疆与我》，载季季编：《纸上风云高信疆》，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③ 江迅：《高信疆是黑夜里的星星》，《新民周刊》2009年9月2日。

为了启蒙民智；“见仁见智”，则是将一个题目分成正反意见来对照，意在帮助读者对某些社会现象作辩证思考。总之，是要让读者知道，时代在变，观念和思考也应逐渐转变。《联合报》的黄年将这种工作视为“活化人心的使命”。^①

最后的突破，也是最难的突破点，无疑在政治新闻。如果说副刊还可借题发挥，那么时政新闻往往只能暗度陈仓。在名记者王健壮看来，一部戒严时代的新闻史，喜怒哀乐尽在曲笔中。名记者戎抚天在《联合报》担任政治记者时，曾以曲笔写作著称。他总结自己处理新闻的核心价值为：现场主义、平衡主义、存在才有力量、与人为善。存在才有力量，要存在，就不得不对某些敏感的报道或言论进行软化或隐讳的处理。曲笔乃是一种无奈的新闻报道艺术。

曲笔之下，常常会“埋地雷”。为了让某些敏感新闻顺利通过警总和文工会的审查，记者们想方设法地玩文字游戏，搞“偷渡”，偷渡成功则兴奋不已。每一次犯禁成功，都意味着报道自由度又拓宽一点。戎抚天回忆说，他与《中国时报》的党政记者，每天在竞争新闻之外，也形成了一种配合的默契，就是在新闻尺度上，这次他跨一点，下次我跨一点。大家不断去试探，寻找新的界线，然后想办法跨线。不断试探，不断跨越。慢慢地，新的领域就冲出来了。禁忌，就一步步打开了。在试探政治禁忌方面，两报立场一致，也是国民党在民主化问题上被迫让步的重要原因。

1977年11月，发生中坜事件。^②事发当晚，有关方面指示各报，一律不准报道。但是，有几家国际通讯社驻台北的记者冒险发出了电讯。第二天，“国外”报纸上刊登了有关新闻，形成了“外国媒体独家，台湾媒体独漏”的奇特现象。《联合报》因为没有相关报道，居然引发一场退报运动。后来，派出所烧火了，《联合报》说，烧火了，我不能不登，但《中央日报》到了半夜，上面还是叫不要登。有些民营报，尤其是《自立晚报》，反而在新闻处理上无所顾忌。结果是，《中央日报》不登，《中国时报》《联合

^① 何荣幸策划：《黑暗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475页。

^② 197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中，由于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投票过程中做票，引起中坜市民愤怒，上千名群众包围中坜市警察分局，捣毁并放火烧毁警察局，史称中坜事件。

报》各登了一点，《自立晚报》登得大一点。^① 11月26日，事件发生后一星期，王惕吾顶住压力，《联合报》以三个整版篇幅完整报道了中坜事件。此后，在重大新闻报道上，各报不再遵守约定，纷纷触线，以满足读者需求。中坜事件，因此成为台湾报禁新闻史上的另一个分水岭。它表明，威权当局再也无法压制在经济迅猛发展中业已产生的社会力量，无法制止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1979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② 事发第二天，《自立晚报》以《高雄市昨有严重暴戾事件 国办集会不幸引起冲突 宪警由于奉命容忍 四十七人受轻重伤》为题，作了报道。虽然标题上做了掩饰性处理，比如“宪警由于奉命容忍 四十七人受轻重伤”，但所谓“揭露”报道，本身即是对事件的大胆传播，已触犯新闻戒律，却并未遭到当局镇压。次年，《美丽岛》案大审判时，台湾各报均以大篇幅版面，完整报道法庭讯问及答辩过程，并忠实记录相关被告及辩护律师的说辞，被论者视为自主性新闻场域的胎动。^③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是台湾社会的关键时代，各报都在揣摩蒋经国的底线在哪里。余纪忠、王惕吾两人努力方向都一样，但可能在方法、风格上有所差异。比较而言，余纪忠的《中国时报》更加开明一些。当时，《中国时报》记者化名在党外杂志写文章，情治单位查出后，将名单交给余纪忠，对他提出警告；余纪忠通常是顶了下来，只是看情况交代记者小心点。1980年，《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王杏庆因报道林宅血案，治安当局要传讯他进行调查，余纪忠认为此举严重伤害新闻自由，面见蒋经国。蒋当时表示，“林案非破不可，任何线索都必须调查，没有例外”。余纪忠力辩说：“新闻记者有忠实报道新闻的责任，而没有为政府提供情报的义务。”在余纪忠的坚持下，事情最终有了转机。

^①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81页。

^② 事件经过，将在下节叙述。

^③ 黄顺星：《记者的重量》，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8页。

1984年10月，江南案爆发，^①《美洲中国时报》详细报道了案情，并刊载了陆铿的分析文章。陆铿认为，此案财杀、情杀的可能性都不大，有人认为此举是影射为政府谋杀。此后，该报又由于对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表现等的报道，被指为“为匪张目”、“掉进红色的陷阱”，终于导致在申请汇款补助时被当局气绝，当局要求他放弃言论权，否则封报，余纪忠选择了后者。^②

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当时，台湾政府虽已宣示开放党禁，时程却未敲定，此举对当局构成挑战。党政部门紧急通知各报，要求对此新闻不予报道。但余纪忠考虑，此事件关系台湾民主前途至巨，立即亲自电告政党决策人士，决定做忠实报道。第二天，《中国时报》用了九栏高的醒目标题和近千字的大块篇幅作了报道，是全台湾唯一详细报道的媒体。谢长廷回忆说：“如果民进党成立的消息被封锁，那么民进党的历史、台湾民主化的历史都可能会不一样了。”第二天，《中国时报》又发表社论，明确表示：“党禁必须要逐渐开放，而且，开放形势业经形成，不可强加阻遏。”民进党成立10天后，《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瑞翰女士率团访台，在会见蒋经国之前，访问了余纪忠。随后，蒋经国在接受葛瑞翰访谈时，正式向世界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

迎接开放时代

对于台湾而言，80年代，是一个经济已然强劲、社会正在蓄力的时代，一个沉默被逐渐打破、集体开始发声的年代，一个酝酿大变动，并且尝试各种可能性的年代。^③民众已有很强的民主共识，在走向开放的动力系统中，不同媒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时、联合、自立、党外杂志、党外运动，一

^① 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遇台湾黑道分子刺杀身亡。后经调查，凶手为台湾情报局雇用，引起美国方面震怒。为平息美方，蒋经国下令逮捕了“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② 李金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湾报业与民主变革的崎岖故事》，载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

^③ 陈文茜、杨渡：《运动就像剧场表演》，载杨泽主编：《狂飙八〇：记录一个集体发声的时代》，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6页。

层一层的，层层的绵密互动，共同松动国民党的威权体系。^①

1982年，《联合报》迎来30周年大庆。30年来，《联合报》的发行量从不到6000份增长到突破百万，成为台湾第一大报。庆贺之余，王惕吾不失时机地提出台湾报业尚需解决三大问题，呼吁当局放宽报纸篇幅，开放报纸登记，制定“新闻法”。^②此前两年，在1980年的“国建会”上，《联合报》发行人王必成、海外学人祝基滢教授等共同提案，呼吁当局开放报禁，取消报纸限制。王必成说：

现在报纸限制只能发行3张12页，无法配合国内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外知识与新闻的需要。严格的限制篇幅，使建设性的言论与解释性的新闻无法畅所欲言，妨碍报纸功能的发挥。^③

由于和蒋经国有数十年交情，余纪忠也利用不同渠道，向当局建言献策，主张适时解除戒严、党禁、报禁，改选“国会”及开放两岸探亲等。1986年6月，国民党通过六大革新议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改善社会治安与风气、党务革新。余纪忠对上述议题进行专题研究，邀请各界学者研拟革新方案，《中国时报》以系列专栏方式刊出，广受重视。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已成为台湾最强的时代之声。万山不许一溪奔的日子就将过去，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情景已近在眼前。戒严令、威权体制，连同蒋经国本人，一起迈入黄昏的日子。1988年1月13日，报禁开放不到半个月，蒋经国去世。保护主不在了，侍从体会到的却未必只有自由的喜悦。虽然两大报系一路走来，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与威权者发生冲突，但是，没有保护主，也就没有侍从，没有威权体制的保护，也未必会有两大报系的辉煌。信心满满地迎接报禁开放的余纪忠和王惕吾，当时无论如何也想

① 何荣幸策划：《黑暗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311—314页。

②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5页。

③ 许由：《也谈开放“报禁”与增加报纸篇幅》，载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3页。

不到，报禁的黄昏，其实也意味着侍从报业的黄昏，意味着两大报系的黄昏。

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最高层曾经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虽然在此过程中，余纪忠曾起过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不久即向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请辞了中常委职务。随后亲书《中国时报》新闻与言论七项基本信条，勉励同仁。七条信条如下：

一、笃信三民主义

二、全力推动民主政治。

三、对政府改革脚步的迟缓，加以督责批评。对政府采取革新的作为，加以宣扬。我们支持一个进步而安定的当局也促进执政党走向民主政党的大道。

四、赞成反对党制衡功能的正常运作，但反对行为，更反对台独思想。

五、我们的采访，要力求公与平，不听片面之辞，要采证求信，对“为反对而反对”的作法，要有辨别，不附从。

六、时代要向前看，才能跳出传统的樊笼，打开新的境界。但国人更要珍惜国家艰难缔造的不易。不要自毁立国的基础。

七、蒋氏两代，收复台湾，建设台湾，鞠躬尽瘁。还政于国民，必须敬之重之，不应有轻率不当之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七项信条中，第三项支持一个进步而安定的政府，第五条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第七条对蒋氏两代必须敬之重之，等等主张，显然是针对后威权时代台湾报业立场多元化后的某些论调。对于蒋氏两代，余纪忠竟与楚崧秋有着相同的情怀——“决不因他们仿佛繁荣落尽，近年遭受种种有意的贬抑与羞辱而充耳不闻”。^①

站在解禁元年，无论是回望来时的路，还是瞻望将行的路，余纪忠和王

^①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纪录：《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2月版，第8页。

惕吾，虽是竞争对手，更像一对战友；与其说他们在相互竞争，不如说他们在并肩作战。准确地说，他们就像同属于一个主人，只不过分属于这个主人的左右手。他们的风格、人格、报格各有特色，却又相映成趣。在同一种体制下，他们同是一个时代的胜利者；当这种体制结束后，在另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将遭遇同样的挑战。王惕吾和余纪忠不可能预见到，报禁前两大报所达到的成就，此后不仅别的报业难以超越，就连他们自己再也无法超越。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市场并非两大报系如风卷残云，鲸吞一切，而是在短暂的厮杀后，自身也终将被致命啮伤。毕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国民党迁台之初，两报在言论立场上均强调维护“国家安定”巩固领导中心。进入60年代后，台湾民众所得逐步增加，教育水准因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而大幅提高，于是将报道和言论重点转向致力于催生民主政治。蒋经国逝世之后，两报又为维护健全“宪政体制”，为族群和谐、两岸和平而鼓与呼。^①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报禁时代，两大报系不避风险，以忠以勇，为净臣为畏友，进逆耳良言，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立下功劳，付出过被退报和被迫停刊的代价。报禁解除后，面对新的舆论环境，两大报系有弃有守，不愿因职业利益而犯错误，也不愿凭借新闻言论自由而铸错，^② 又同样遭到被退报和被迫停刊的命运。

新时代，自然会有新的大媒体出现。两大报系的辉煌，终于逐渐消退。

第三节 “小媒体”的反抗

“大媒体”、“小媒体”

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下，报禁时代的台湾报纸，发展好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威权体制的亲疏关系：甘为侍从、与保护主保持良好互动者获得众多好处，迅速发展成为所谓“大媒体”，拒绝成为侍从、坚持独立办报的异

① 张慧英：《提笔为时代：余纪忠》，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84—85页。

②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3—54页。

议媒体则时常受到当局打压，生存维艰，难以摆脱“小媒体”的命运。因此，所谓“大”、“小”媒体，不仅指媒体规模，主要是指由于与威权当局亲疏关系不同而形成的市场地位之优劣。一般而言，“大媒体”更多是威权体制的侍从，“小媒体”则更多是威权体制的对手，在公共论题上两者不时展开较量。与规模大小相反，就对于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贡献而言，恰恰因为两者与威权体制的关系不同，“小”媒体所起的作用反而超过了“大”媒体。^①

1987年，蒋经国作出重大决定，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同一天，《自由日报》更名为《自由时报》。1月4日，《自立早报》由政治组召集人胡元辉前往台北市政府，正式申请登记成为第一家新报。

《自立早报》领到报禁后第一张新报登记证，虽属巧合，却不无象征意义。事实上，70、80年代台湾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党外势力的崛起，对于报纸而言，获益最大的正是以《自立晚报》为代表的所谓本土报业。此时，《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台湾新生报》等党公营报业已陷入僵化的格局中，身手施展不开，满纸官腔党调，萎弱无力。两大报系的立场也转趋保守，《自立晚报》和《民众日报》两家报业则借势崛起。^②

有学者认为，报禁期间的台湾报业总体上是一种功能性报业，维护着一元政治及制式的社会安定。^③《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等党公营报纸固然如此，它们在40、50年代占据市场优势；60年代崛起的两大报系，均属党员办报，基本立场也都站在维护和巩固政权。虽然在推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两大报系，甚至党公营媒体都曾起过一定作用，但是，相较于党公营报纸和侍从报业受到较严厉控制，扮演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色，同时是压抑政治反对运动的工具之一，真正非党政系统的媒体，才是解严前

① 黄清龙：《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004298701.html。

②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8年6月版，第198页。

③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12—19页。

解构者角色的主要扮演者。^①

《公论报》与《自立晚报》

虽然余纪忠、王惕吾，甚至楚崧秋，在阐释各自的办报理念时，都强调书生本色和文人论政。但是，报禁时代，台湾报业中最能代表文人论政的，不是《联合报》，也不是《中国时报》，而是公认为李万居的《公论报》。卜幼夫曾评论说，《公论报》作为一张纯民间的报纸，立场公正，态度严肃，堪称台湾《大公报》。^②

《公论报》创刊于1947年10月25日。其创办人李万居是青年党党员。不过，创办《公论报》时，李万居已与青年党关系逐渐疏远，曾拒绝刊登该党的宣言。从创刊到休刊，《公论报》总共发行17年，是台湾50、60年代重要的新闻媒体，在《自由中国》未遭到蒋介石政权查禁之前，这一报一刊是台湾自由言论的重镇。

《公论报》创刊，是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报业乃至政治生态中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是《公论报》的黄金时期。当时台湾各报刊载的新闻，多半抄收中央社电讯，《公论报》却有美联社、合众社消息，常常有独家新闻，加上言论大胆，发行量一直仅次于党公营的《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在民营报中占第一位。直到1954年，日均销售量虽降至4550份，仍然仅次于《征信新闻》，在民营报中排第二位。^③但是，由于其坚持独立办报，先是招致国民党的不满，后又拒绝国民党收买，一直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财务压力之中。

1949年5月22日，陈诚宣布台湾戒严令后的第3天，《公论报》因为刊载一篇谈台湾人口的文章，数据发生错误，被勒令停刊3天，创下戒严后处置新闻的第一件案例。此后，在1954年当局推行“文化清洁运动”、1955年颁布“新闻九项禁令”，特别是1957年在《自由中国》事件中，

^① 魏攻娟：《新闻传播媒介在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解严前后新闻传播媒介角色之分析》，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第4页。

^② 卜幼夫：《台湾风云人物》，转自杨锦麟：《李万居评传》，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③ 杨锦麟：《李万居评传》，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公论报》均与当局发生冲突，成为当局眼中钉，^① 逐渐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该报的遭遇，李万居曾在1959年初台湾省“议会”第三届第四次大会的质询中，以“我的呼吁和抗议”为题，作了强烈的申诉。李万居说：

《公论报》是我本人所创办的，也是唯一台湾人所创办的报纸。这些年来，本报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本报的副总编辑李福祥以莫须有罪名被治安机关拘禁达三个月，编辑阮景寿被禁锢一年一个月之久。总主笔倪师坛于四十六年（1957年）十一月六日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复自由。总编辑黄星照、编辑陈秀夫和记者江涵被国际部控以妨害军机的莫须有罪名，均各被判处徒刑。在各地的业务人员和记者也常被迫害，如东势营业主任兼记者刘枝尾，以甲级流氓的罪名，被监禁于屏东县属小琉球海岛中，礁溪记者兼营业主任张光炽也曾被拘禁过，嘉义办事处副主任童金龙则被处以二年半管训，其他业务人员被压迫恫吓到处皆是。特务警察、党务人员、服务站人员对于本报的业务和读者可任意加以压迫和干扰。若干机关和学校无理地禁止订阅本报，真使人有人间何世之感。在日据时代还可以有限度地容许台湾人所经营的报刊存在，台湾已经重入祖国版图，然而一个忠贞爱国不渝的台湾文化工作者，其所遭遇如此，这是事理之平吗？趁此机会，特向主席提出呼吁，并向党政当局提出抗议。

对于李万居的质询，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周至柔回避不谈，却带有威胁地表示：

国家正处于危难时间，如有人以标榜民主自由为护符，以遂个人私利或逞其危害国家之阴谋者，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也不能禁止舆论界对此种人的指责或法律的制裁。

周至柔的回复，已经透露当局对李万居的不满，亦隐约显示出50年代

^①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7年版，第78页。

末台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① 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打压下,《公论报》生存维艰,连李万居家人的手表和报馆中的电风扇都被送到当铺,换钱买纸,而且只能买价格低廉的纸头纸尾,勉强印报。尽管如此,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李万居并没有答应王惕吾联合出报的邀请,也婉拒了曾在法国同学的美国某政要的巨额捐赠。1959年,李万居决定增资。当局为了避免该报成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的机关报,趁机让台北市“议员”张传祥融资介入经营,并强行对该报进行改组。1967年,国民党又出面协调,以105万将《公论报》出卖给阎奉璋,之后阎奉璋又以120万卖给王惕吾,改名《经济日报》,完成了侍从报业对于异议报纸的兼并。^②

《公论报》停刊后,台湾民营报纸中独立性格最强的两家报纸,^③ 只剩下了另一家——《自立晚报》。

《自立晚报》创刊于1947年10月10日,为台湾第一份中文晚报。最初由顾培根创办,为四开报纸。其发行宗旨为:“完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民众的信心与希望,替民众说话,忠实报道,善意批评,积极建议,抨击坏人,歌颂好人,作为当局与民间进一步合作的桥梁。”1950年11月17日,该报副刊“万家灯火”刊载《草山一衰翁》,被指为影射“总统”,被处以停刊,“永不复刊”。1951年9月21日,在李玉阶的努力下,征得蒋经国同意,报纸得以复刊。李玉阶接手后,该报一改旧观,成为台湾自由言论的急先锋,也因此分别在1952年、1953年,两度遭到停刊处分。

1952年10月14日,《自立晚报》刊载一篇新闻,报道前“财政部长”孔祥熙将携眷返台。第四组主任沈昌焕以“总裁交办追究新闻来源”为由,提出给以停刊一年的处分,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拒绝执行。经协商,《自立晚报》结果“奉准休刊七日”。

1953年10月10日,《自立晚报》又因为报道阅兵大典花絮新闻,用词不雅,被第四组以“诋毁元首”罪名,处以停刊3个月处分。这条花絮新闻主要内容如下:

① 杨锦麟:《李万居评传》,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248页。

② 杨锦麟:《李万居评传》,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③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7年版,第78页。

一个女人，突然被挤得头晕，跑到荷花池畔，垂头支颐踞而坐，拟小休片刻，却因双腿稍张，惹起一游客注意，几经窥秘，不料这人身后一个朋友闪出拍拍肩膀说：“老兄看到没有！”

一句话，惹起了这人的双颊绯红，但经那闪出的人接着说下去，原来是阅兵典礼和阅兵台上人丛密处据说有总统加杂其中。

1958年“出版法”修正风波中，蒋介石以怀柔手段，召见五家国民党籍的民营报社长，却独漏李玉阶，引起李的不满，宣布脱离国民党，从此，“无党无派、独立经营”成为《自立晚报》的办报招牌。^①但是，由于面临政治钳制、经济困窘，李玉阶年代的《自立晚报》不可能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却只能扮演威权体制之下的“噪音”，真正的无党无派经营，是直到吴三连入主后才逐渐成行。^②

1959年6月18日，李玉阶邀请吴三连、许金德加入《自立晚报》，该报进行第三次改组，确立报纸言论最高原则：“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公正客观、超然于党派立场。”1965年，李玉阶退出，吴三连出任发行人，叶明勋为社长，资金由台南帮所支持。吴三连是替台南帮与党政军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人物，在国民党和党外中间扮演了沟通角色，但极力排除台南帮介入新闻编辑政策和报纸内容。

吴三连时代的《自立晚报》，新闻报道和言论虽然时常与党外杂志相呼应，但在根本上与党外杂志不同：它认为民主运动不是造反，“办报就不造反，造反就不办报”；而党外杂志办报与造反往往是二合一。吴三连主张体制内改革，反复强调报纸首先要生存：“办报纸不是放烟火，放烟火灿烂一下就没有了。报纸必须每天存在。”吴三连的亲信吴丰山，曾在该报主持20年“吴丰山专栏”，并且长期担任《自立晚报》社长。他也认为，《自立晚报》的专栏与当时党外杂志文章有两点不同：第一，不主张推翻当局；第二，不会骂人，有理有据。^③

^① 自立晚报报史小组：《自立晚报四十年》，自立晚报社1989年版，第41—42页。

^②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③ 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2010年7月版，第206—207页。

尽管如此,《自立晚报》关于“党外”的报道,在各报中是最多也最大胆的,包括1979年对美丽岛事件的大胆揭露。连其他报社的记者都承认,《自立晚报》在台湾戒严时代和转型时代,扮演着特殊角色,绝对是民主运动最大的推手。^①1986年,桃园机场事件中,^②由于当局有令,各报报道均是“暴民攻击警察”。《自立晚报》记者几乎全部赶到现场,组织采写了《现场目击》,却称镇暴部队先激怒群众,才爆发机场事件冲突。桃园机场事件确立了《自立晚报》“客观公正”的地位,不只在报业市场上,而且影响了当年的“立委”选举,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力。该报发行量,从原来的13万份暴增至100多万份。^③

同为独立报业,《公论报》亡于威权当局的打压,《自立晚报》则兴于反抗威权当局的党外运动,一兴一亡,象征了异议媒体不同时代的命运遭遇。

《自由中国》

著名记者司马文武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是由所谓“党外”,^④如同推土机一步步往前推进所争取来的;而新闻自由,更是50年代党外杂志站在

① 黄顺星:《记者的重量》,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35页。

② 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由流亡美国的许信良等人,将他们在纽约成立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改名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并宣布将于“中央民代”选举前组团返台。11月14日,“民进党海外组织代表团”7名团员由美飞抵桃园机场,100余名民进党及党外人士前往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下机后,由于其中4人未获签证,不准入境。交涉未果,7人愤而转机离去。前来迎接的民进党人士为此大闹检查大厅,与警方发生冲突,僵持达6个小时之久。11月30日,许信良拟自东京飞返台北,民进党聚众数千人前往桃园机场准备迎接。“治安”机关则在通往机场的路口阻截,并派出大批宪警,出动坦克,与迎接者发生冲突。宪警以消防车向迎接者喷射红水,民众则以石块还击,并捣毁警车30余辆,僵持近10小时。至晚8时30分,确定许信良尚未搭机入境,迎接者方始撤退。

③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425页。

④ 李筱峰认为,“党外”一词,原本只是对非国民党籍的一个泛称,早期无党籍的候选人,多以“无党无派”标榜,自从黄信介、康宁祥崛起后,“党外”一词开始大量使用,成为无党籍中的政治异议分子共同使用的称号。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40年》,自立晚报社1987年版,第122页。

第一阵线上冲决出来的。随后，才有《自立晚报》等自由报业的跟进。^① 李金铨也认为，台湾威权体制时期，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主要来自边缘的另类媒介，特别是70年代的党外杂志，以及90年代的有线电视。报禁期间，威权当局停止发放报纸和电视台营运的新执照，但低估了小媒介（党外杂志和有线电视）的颠覆力量。这些小媒体，因为一直徘徊在生存的边缘，当局不以为意，不料后来与方兴未艾的政治运动结盟，共同生猛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②

报禁时代的小媒体，主要是指那些与威权体制关系紧张的媒体。小媒体中，除了《公论报》《自立晚报》等独立报业，也包括部分政论杂志、地下电台，特别是所谓异议媒体——以政治反对（国民党）之运动及政治选举为目的所创办的，或日后与此目的做连结的媒体，^③ 以及70年代以后兴起的党外杂志——党外人士站在反对立场所办的杂志，并且曾遭当局查禁或查封的政论杂志。^④

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进党成立并被合法化，台湾的三次政治反对运动都是围绕着政论杂志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试图组建中国民主党，未获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文星》和《大学杂志》促进了台湾政治革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民进党成立而告终的所谓党外运动，也是以1975年创刊的《台湾政论》为发端的一系列杂志为基础而发展的。

包澹宁认为，报禁期间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杂志出现异议性声音，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 认为杂志威胁性较小，伤害能力较小；2. 杂志具备“安全阀”的作用，让反对者有宣泄的出口，“国家机器”可从而预防反对的力量壮大；3. 党外杂志也作为“样板”，成为国民党对外宣称为已是“民主国家”的工具。因此，相对而言，报禁期间台湾政论杂志

① 何荣幸、洪贞玲采访整理：《只要是执政者都会讨厌媒体：专访司马文武谈反对运动与媒体的纠葛》，《目击者》第17期，2000年6月。

② 李金铨：《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③ 冯建三：《广电资本运动的政经分析》，唐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④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比报纸有较大生存空间，进而能发挥更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① 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不只与国民党政权争夺文化霸权，更成为反对运动核心者与支持群众间互动的桥梁，成为反对势力集结，以行动实践言论主张，扩大其影响层面，甚至是取得政治实力的根基。完全可以说，党外杂志既是民主运动的喉舌，也是其手足，对台湾的民主化具有全面性的影响与贡献。^② 因此，有关大众媒体在推动民主及言论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战后台湾政治反对者与社会运动团体的关切重点。

论者普遍认为，台湾民主运动发轫于《自由中国》，虽然《自由中国》的主要创办人雷震为国民党员，但由于该刊的论述立场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尤其是走向组织反对党，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党外杂志，均将它视为先驱。^③ 诚如余国基所说，他们这一代人，只要对政治有想法，都受到《自由中国》的影响。^④

1949 年 11 月 20 日，《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胡适亲自为《自由中国》订定了四条发行宗旨，第一条为：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虽然主张民主自由，但创刊初期的《自由中国》，乃是以拥蒋反共为前提，本质上是一本倾向国民党体制的政论杂志。事实上，该刊之得以创办，主要是因为国民党需要一个展示的橱窗，它不仅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教育部”的资助，还包括国民党军队官兵的订阅。^⑤ 创刊头几年，《自由中国》

①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 1995 年版，第 289 页。

② 许瑞浩：《台湾政论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为中心》，《国史馆学术集刊》第二期。

③ 韦政通：《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历程——从〈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到党外的民主运动》，载中国论坛编：《台湾地区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中国论坛 1985 年版。

④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 2008 年版，第 150 页。

⑤ 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 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稻乡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0 页。

确实更像是一块台湾用以标榜自己有新闻自由的招牌。

尽管如此,《自由中国》从自由民主立场出发,刊载的言论还是不断触及到威权统治的痛处。1951年,主笔夏道平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揭露台湾保安司令部为捞钱设圈套、诱民入罪的恶行,惹恼“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他命令特务将雷震及杂志社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

1954年1月,《自由中国》杂志社收到读者余燕人、黄松风、广长白的来信,题为《抢救教育危机》。当时,蒋经国领导的“反共救国团”在台湾各级学校强制推行党化教育,信中对此提出严重抗议,认为党化教育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学生身心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此文引起蒋经国震怒,他指责雷震有帮助共产党之嫌。最后,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雷震被开除党籍,殷海光致信祝贺。殷海光认为,没有了党员的约束,雷震从此“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5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中国》的立场,果然悄悄发生了“从‘反共拥蒋’挂帅到人权意识抬头”的转变,不仅言论上逐渐挑战当局禁忌,并且开始与本土精英结合,筹组反对党。^①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共发表了16篇文章。作者有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雷震撰写了社论《寿总统蒋公》,希望蒋介石像美国华盛顿那样,任两期“总统”就不要再任了;并提出选拔任用人才、确定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三点建言。社论尖锐地指出:

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至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党执政,为时过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无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

^① 薛化元:《从“反共拥蒋”挂帅到人权意识抬头——自由中国与执政当局互动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法政学报》第5期,1996年1月,第43—66页。

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

关于军队国家化，社论也指出，军队把长官个人视为军队效忠的对象，士兵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只效忠个人，而不知忠于“国家”，军中标语所写的“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本末倒置，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应当予以纠正。

胡适在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中，奉劝蒋介石学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做一个“守法守宪”的领袖。文章说：

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

“祝寿专号”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一再脱销，先后加印了13次，印数达10万册。蒋氏父子看了则十分愤怒，迫不及待地展开反击。蒋介石对他的一位亲信说：

胡适要我做“三不”、“三无”的“总统”。我反复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负责、不反共抗俄”；“三无”是“无政府、无组织、无主义”。要真的像胡适之说的那样，我们都去向共产党投降算了！

蒋经国主持的反共救国团充当了反击的先锋。其主办的《幼狮》月刊发表题为“揭穿‘共匪’战术，防止思想走私”的社论，向《自由中国》发难。社论攻击说，“祝寿专号”上的文章，不是给蒋“总统”祝寿，而是共产党思想在台湾走私。12月24日，《中华日报》在显要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里的玫瑰》。文章以《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比作毒蛇口中的玫瑰，“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社论写道：

《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宙斯神结婚时，所有的动物都送了

礼。有一条毒蛇用它的口含着一朵玫瑰，也爬进了礼堂。宙斯神说：“所有的礼我都收下了，但从你的嘴里，我不敢收任何东西”。

这一次，总统希望国人用意见来庆祝他的诞辰，一般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意见，成熟与否是另一问题，但都是善意的。惟有一个刊物——《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极端无礼——而且无理——的文字，以慈禧太后来影射我们总统，以满清即将亡国的政权来影射我们自由中国政府，从诅咒总统到诅咒我们的国家，这真是毒蛇嘴里流出来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个美国的例子。

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日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也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写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报馆，把主笔巴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富兰克林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意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接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的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他们才不敢为害社会。

《中华日报》的这篇文章由社长曹圣芬亲自操刀，杀气腾腾。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另一刊物《政论周刊》予以转载并加以赞扬。老报人成舍我当即以“一个靠劳力吃饭的小公务员”的身份，“没有出洋到过著名的新闻学府镀金，没有做过官报社长，更没有做过侍从文学之臣”，向曹圣芬提出质疑：文章中所举的美国报业例证所据何在？《中华日报》公然鼓吹暴动，为何没有受到治安当局的干涉和检察官的检举？^①

1956年12月，蒋经国以“周国光”的名义下达第99号“特种指示”，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发放到全岛各军种各部

^① 成舍我：《中华日报鼓吹暴动》，《自由中国》1957年1月16日。

队。小册子对胡适及其文章作了重点攻击。小册子中说：

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的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以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7年，《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总题目，连续八个月，组织撰写了15篇文章，分别论述台湾面临的重大急迫问题，包括反攻大陆问题；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裁减当局机构问题；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问题；地方政治问题；“立法”问题；保障新闻自由问题；青年反共救“国”团破坏教育正常运作问题；党化教育问题；反对党问题等。这些社论文章，篇篇击中蒋介石及其威权统治的要害。第一篇由殷海光撰写的《反攻大陆问题》，便让蒋介石万分恼火。

为了合法化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口口声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对于蒋氏政权的这一护身符，殷海光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穿。文章说：

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却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丛生。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官方的许许多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

^① 汪幸福：《被气得多次大口吐血 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文史精华》2004年12期。

于色，言之于口。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了：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惘、悲观、失望、彷徨。^①

《反攻大陆问题》社论发表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仅仅台湾官方各报刊刊载的批判文章就达 200 篇。《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报纸也发表了批评文章。此后，《自由中国》继续发表社论，进一步指出台湾当局负不起“反攻大陆”任务。原因在于，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稍有雄心的人，都被“斗”完了；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只剩下欢呼队、鼓掌团、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账房。

1960 年 3 月 21 日，蒋介石如愿以偿当选为第三任“总统”。《自由中国》发表题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的社论，直指其当选“违宪”。不久，台湾举行省“议员”暨县、市长的选举，当局采取“违法”助选方式，控制投开票箱全过程。《自由中国》又发表社论《这样的地方选举能算“公平合法”吗》，公开提出组建反对党。5 月 20 日，雷震撰写《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呼吁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赶快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独霸的局面”。此后，雷震联合台湾反蒋人士高玉树、郭雨新、李万居等，筹组中国民主党。9 月 1 日，《自由中国》出版最后一期。9 月 4 日，当局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逮捕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骏、会计刘子英等。雷震被判处 10 年徒刑。

《文星》《大学杂志》《美丽岛》

《自由中国》的夭折，预示着另一场媒体反对运动的真正开始。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党依靠美援 AID 和“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出台“奖励外资条例”，出口导向型经济崛起，造就了一批中小企业家。许多新兴中产阶级子弟，在当局留学政策鼓励下留学北美，学成返台

^① 殷海光：《反攻大陆问题》，《自由中国》1957 年 8 月 1 日。

后，纷纷到党政机构或大学任职，成为主导台湾的新兴势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保钓运动的推动下，大学校园开始出现自由化运动。^①

1961年11月，李敖加入《文星》。《文星》创刊于1957年11月，早期重心在文学与艺术。自第25期起，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转向“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最好的突破口。直到李敖加入，掀起一场长达21个月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该刊不仅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自由中国》的精神，成为冲击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新堡垒。

李敖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章，是《老年人与棒子》。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台湾文化界，该文如同一声响雷，发出了年轻人惊醒后的怒吼：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李敖在文章中区分了几种拿着不同棒子的老年人：一种人拿着莫须有的棒子，一种人拿着落了伍的棒子，一种人拿着不放手的棒子。第一种人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所以不必担心；第二种人，李敖建议他们向胡适学习，永远做白头新人物，不要在年轻时代激进，老年时代冥顽不灵；第三种人，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李敖最后说：

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

^① 王杏庆：《大学杂志与现代台湾——1971至1973年的知识分子改革运动》，载澄社：《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纪念雷震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自立晚报社1992年版。

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自由中国》停刊后，舆论界一片沉寂，《老年人与棒子》就像投下一枚炮弹，在舆论界引发巨大反响，尤其是引起了各大学师生的热烈讨论。《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等杂志，随即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展开了一场“棒子战”。

接着，李敖又投下两颗炮弹——《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正式接过胡适的自由火把，与胡秋原、徐复观等人拉开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李敖痛快淋漓地诊断出中国文化诸种病状：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等等，不一而足；然后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企图改正美人缺点，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颜；因此“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钟表、番茄、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在李敖的引领下，以殷海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台湾一批年轻知识分子陈鼓应、夏志清、白先勇等齐聚到《文星》杂志，一时洛阳纸贵。在李敖看来，《自由中国》是从政治上与国民党直接冲突，挖他们的根；《文星》是用思想的方法挖国民党的根。1965年4月，《文星》第90期遭台湾当局查禁。同年年底，《文星》第98期刊出李敖的《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严厉指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压制言论的行径，并且批评蒋介石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文星》被处以“停刊1年”。1966年，第四组致函《文星》称：

“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文星》由此终刊。《文星》的命运，诚如李敖所说，“它生不逢时，也不逢地，最后在高压之下殉难小岛”。

《文星》停刊，代表了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另一次失败。但是，自由的火种，民主的潜流，已深潜在台湾知识分子的心中。三年后，1968年1月1日，邓维桢创办《大学杂志》。《大学杂志》的言论路线，与《文星》相似，偏重于思想与文化，不涉及时事政治问题。1970年10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邀请学界青年知识分子和企业界青商会人士座谈，征求对时局的批评与改革意见。会后，对《大学杂志》进行改组，执政党中青年精英关中、魏镛、丘宏达，本土政治人物张俊宏、许信良，学院派自由知识分子杨国枢、胡佛、李亦园、李鸿禧等人均被纳入，刊物言论开始急速升高，大幅呈现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1971年1月，《大学杂志》发表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呼吁政治革新。3月，当局下令逮捕李敖，对青年知识分子以示警戒。7月，《大学杂志》发表张俊宏、许信良等人撰写的《台湾社会力分析》，呼吁当局不要忽视台湾社会各阶层的资源。10月，发表15人联署的《国是诤言》，从人权、经济、“司法”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国体”、政体和“法统”问题，提出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文章尖锐地指出：“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命名的特权集团”——几乎触及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底线。1972年年初，又发表19人联署的《国是九论》，在校园引发热烈的政治讨论。时逢蒋经国即将接掌台湾政权，当局为显示新政气象，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蒋经国在会谈中表示，青年应该多讲话，多关心“国是”。5月26日，“立法院”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经蒋经国主动延揽，与《大学杂志》有关联的关中等国民党青年精英进入党部及当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杂志》内部出现分裂，杨国枢等学院派知识分子另创《中国论坛》，张俊宏等本土政治人物，则转向更为急切的运动，另创《台湾政论》。

1975年8月，一本完全由本土精英创办并主导的政治性异议杂志《台湾政论》创刊。康宁祥出任社长，黄信介担任发行人，张俊宏担任总编辑。

《台湾政论》明确宣称，要继承《自由中国》《大学杂志》的衣钵，搭建民间舆论的发言台，批判官僚主义和腐败，拥护并推进改革。

与《自由中国》《大学杂志》相比，《台湾政论》刊载的文章，已由单纯的政论过渡到报道与政论兼备的性质，其立场与风格均成为此后一系列党外政论杂志的标杆。^①《台湾政论》第一次集结了70年代以前台湾零散的反对运动力量，以政论杂志方式配合选举成为党外候选人的宣传工具，成为党外运动的先导，也是党外运动由以“笔”为工具走向以“口”为工具——参与选举、开启新战场的起点。^②就这一意义而言，《台湾政论》创造了一个政论杂志的新模式：既利用杂志推进体制内的改革，又利用杂志筹备政党组织。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脱掉它的媒体外衣，而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政党。^③美丽岛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和施明德等人，在受审时都宣称办杂志是为了发展组织，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党名的党。

《台湾政论》共出版五期。第5期刊登邱垂亮的《两种心向》一文，报道钢琴家傅聪与一位大陆教授的谈话，触及台海关系及台湾前途问题，被指控“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加上该期杂志推出了多篇关于选举的报道，当局担心党外人士力量坐大，下令停刊。

《台湾政论》停刊后，党外人士又相继创办了《这一代》《富堡之声》《新生代》《潮流》等杂志，这些杂志存续的时间都很短。1979年6月，康宁祥创办《八十年代》。8月，黄信介创办《美丽岛》，其发刊词写道：

玉山苍苍，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

^① 许瑞浩：《台湾政论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为中心》，《国史馆学术集刊》第2期。

^②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③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02页。

我们即将来临的世代，生机盎然，波澜壮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优秀，但是，因为它的视野太过辽阔，使得传统遗留给我们的轨道、原则、规范、理想都显得狭隘，不敷应用。从过去，我们无法找到引导的方向，我们必须独自寻找、创造我们未来的命运。

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世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赖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推展。

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寻的方向。^①

《美丽岛》发行人为黄信介，许信良任社长，吕秀莲、黄天福担任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施明德为总经理，杂志的社务委员达70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知名党外人士。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1979年9月8日，《美丽岛》杂志在中泰宾馆举行创刊庆祝酒会，引发中泰宾馆事件。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在高雄联合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引发民众与警方流血的大规模冲突。黄信介等人被捕入狱，并被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进行公开大审判，是为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对台湾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作出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

^① 黄信介：《发行人的话——一起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美丽岛》第1期，1979年8月。

我们一定要走的路。^①

根据蒋经国指示，美丽岛事件大审判期间，台湾媒体首次获准全面翔实地报道审判全过程。受审者以及他们的辩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充分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以及对台湾前途诚挚的关切，国民党的威信大大降低，民主诉求正式浮出水面。“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蒋经国对美丽岛事件的从宽处理，固然展现了其政治开明的一面，不过，该事件也表明，威权当局已越来越难以高压手段平息台湾民众的民主化诉求。

大江东流挡不住

美丽岛事件后，台湾党外杂志风生水起，蓬勃发展，而且与党外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对国民党政权发起正面挑战。党外杂志已然是造反杂志。^②面对这种挑战，警备总部开始更加严密地审查和监禁，有一段时期干脆停止了杂志登记。《钟鼓楼》未问世就被查封，更多的杂志只出一两期就被关闭。^③1985年，是党外政论杂志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查禁、查扣最严酷的一年，仅上半年就查扣了40万册以上。当年7月18日，爆发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杂志社集体向“行政院”请愿抗议行动，参与请愿的杂志包括《前进》《蓬莱岛》《生根》《台湾年代》《民主天地》《关怀》《新潮流》《制衡》《新路线》《环球通讯社》《薪火》等。

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党外杂志不断涌现，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党外杂志为了吸引读者，在言论与行动两方面都越来越追求耸动，藐视禁忌，甚至不顾基本事实和专业操守。在编辑内容上，并不能抓住真正的社会时弊缺失，作具体事实的和建设性的建言批评，只是针对跟他们有牵连关系的声明进行空洞辩论，^④给人感觉不过是一般营利性的杂志。当时有不少报社记

^①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74页。

^② 南方朔口述，韩福东撰稿：《台湾报禁解除前后》，载《先锋国家历史》第14期，2008年4月（下）。

^③ 彭琳淞：《党外杂志与台湾民主运动》，“国史馆”主办“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2003年9月。

^④ 一鸣夫：《冷眼看百花齐放的政治刊物——“杂志禁”开放后面面观》，载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2月版，第182页。

者编辑到党外杂志兼职，这些人时常面临是党外人士，还是媒体工作者的内心困惑，原因就在于，按照媒体工作者的要求，对于党外新闻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也就是“把自己与运动稍稍分开”；而党外人士的写法却是“将自己置身其中”。^①

由此可见，党外政治人物办杂志的目的主要是要替政治服务，党外杂志的最大贡献也恰恰在这里——打破禁忌，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然而，一旦其政治使命达成，言论和组党都没有了禁忌，党外杂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党外杂志原来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政党组织提供媒体外壳，民进党成立后，这件外壳不再需要了。因此，报禁解除后，党外杂志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党外政论杂志的灭亡，表明报禁开放后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党外杂志对于台湾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和言论风格的恶劣影响，并没有随着它们的消失而消失。报禁开放以来，台湾媒体的政治评论日趋激热，报道和言论方面愈加政党化，不难看出 80 年代后期党外杂志极端党派之见的影子。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 2008 年版，第 234 页。

第四章 巨灵的控制与无权者的权力

新闻自由，并不是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甚至也不是必然存在于民主制度之中，它是存在于记者的心灵与意志之中。——黄年

报禁开放后，人们期待着台湾报业能透过自由市场竞争，更好地担负起社会公器角色，确保民众知的权利，监督当局，为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发声，为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然而，获得新闻自由的台湾报业，虽然再也没有限证、限张、限印、限价了，没有文工会的指示与命令了，也没有警总的约谈与审查，更不会随意逮捕记者和封闭报刊了，却很快面临资本的压力，并且在市场导向之下，新闻品质一路向下沉沦。^①

第一节 大者恒大 赢家通吃

财团主宰报业

报禁开放之前，有识之士曾预见到解禁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行政院新闻局”曾成立专案小组，到全台报社进行充分调研。当时业界意见，南部地方报纸在广告分版等问题上，与两大报系等北部强势报纸出现分歧。经过近十个月的协商，最后南北双方勉强达成“八项协议”。协议除了规定1988年元旦开放报纸登记证，还对开禁后报纸的张数、广告、报价、印刷地点，甚至字体大小都作了详细规划。^②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69—170页。

② 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396页。

报禁开放第一天，共有7家报纸、1家通讯社申请办理手续；此后，递交申请者络绎不绝。两个月内，新申请登记报纸即达33家，超过以往40年所存在的报纸数，平均每两天增加1家。新增加的报纸中，专业性报纸增加很快，像儿童、妇女、交通、劳工、旅游、宗教、工程、环保、健康、司法、科技等报纸都有申请，财经、贸易、股票、投资、期货等专业报纸尤其踊跃，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结构性及价值观的改变。

在报纸张数方面，由于此前“八项协议”中规定各报最高不能超过6张。报禁开放当天出版的27家报纸中，有9家增为6大张，3家增为5大张，4家增为4大张，9家维持3大张，还有两家分别出两大张和1大张半。报价也随增张而上调，一般订费由过去的5元增至8元，出版6大张的报纸则调至每份10元，最便宜的为4元，最贵的英文报为12元。

版面增加，各报内容陡然丰富许多，尤其是地方新闻、民众服务及休闲类新闻，井喷式增加。此外，字体放大，行间加宽，普遍使用照片、漫画和彩色版面，采用块状拼版、新闻提要、内容索引等新排版方式，更新印刷设备，印制质量大为改善。写作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加讲求新闻的故事性、趣味性。种种变化，可谓是一片新气象，令读者感到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甚至有资讯超载、无法消受之感。

解禁后台湾报业的新变化，一些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也有些跟不上了。比如，报纸资讯增多了，读报时间必然增加，有的读者感觉时间浪费；长期以来，都是逐页翻阅，从头到尾，一版版读完，现在报纸版面太多，难以读完，只能根据新闻分类索，各取所需，感觉资讯浪费；最后，报费增加，有读者又会感觉金钱浪费。^①因此，报禁开放后，市场中立即出现了一些“意外”反应。首先，原有各报的发行量，无论是长期订户，还是市场零售，都出现了显著跌落，幅度大约在10%到30%之间。其次，资讯增多增加了部分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又使得另外一些读者感觉无法承受太多资讯，产生阅报失败感，从而阅读兴趣下降。而且，阅读的失败感容易造成读者的逃避心理，影响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原先期待中的开放后报业将会使社会对话更加充分、更加多元化的情形，发生相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当意

^① 消息：《报纸改为六大张 立委认为没意义》，《大华晚报》，1988年3月1日。

识到读者的阅读时间和报纸消费的费用都有限度，而用以争夺这有限资源的资讯越来越多之时，各报除了在新闻内容和版面美化等方面提升品质之外，少数报纸为吸引眼球，开始采用耸动、夸大或离奇的议题；同时，有的报纸采编人力不足，为了填充增加的版面，加上盈利动机起作用，大量刊登品质低劣的广告，包括成药广告，而且不惜给予较好较大的版面，报纸品质开始出现低劣化迹象。^①

各种迹象表明，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的走向似已不可捉摸；兴旺热闹的新气象之下，已透露出不少隐忧，最显著的表现之一，是新报的创办和停刊一样频繁，报业生态极不稳定（表 10）。

表 10 报禁开放后台湾报纸变化表（1988—1995 年）^②

年份	报纸家数	新增报纸	停刊报纸
1987	31		
1988	123	98	7
1989	196	139	66
1990	212	79	63
1991	238	67	46
1992	271	58	27
1993	296	51	47
1994	300	58	34
1995	376		

在不稳定的报业生态中，势单力薄的报纸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市场竞争取代报禁政策成为报业的“新设限”。对新手而言，过去格于禁令，难以创办新报，现在却格于市场，难以为继。^③

据统计，1996 年台湾出版的 61 家报纸中，按性质分，综合性日报有 31

①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记者公会 1998 年版，第 337—341 页。

② 根据王洪钧的《台湾新闻事业进入新纪元》和荆溪人的《报业》编成。两篇文章均载“中国新闻学会”：《90 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版。

③ 林正国：《中央日报改革的决心与作法》，《新闻镜周刊》第 86 期，1990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 日。

家，综合性晚报 10 家，经济性报纸 11 家，休闲性报纸 4 家，儿童报纸 3 家，英文报 2 家。按所有权分，61 家报纸分属 6 家报系：联合报系、中时报系、党报报系、政府报系、军报报系、自立报系。^① 其中，两大报系因为势力雄厚，占据有利起跑点，在报禁开放后急速扩充。

联合报系除了新办《联合晚报》，又分别登记北、中、南部版，新创办的以影视娱乐为主的《星报》，加上原有的《联合报》《经济日报》《民生报》，等于拥有 13 份报纸。《中国时报》则早在 1985 年，便下乡发展地方报，并以台北、台中、高雄为基地成立新闻中心，改由北、中、南三地印刷，企图向南部的《台湾时报》《民众日报》《中华日报》等占地方优势的报纸发起挑战。报禁开放后，中时报系也在《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之外，新办了《中时晚报》，同时各登记北、中、南部三种版，以 9 份报纸和联合报系分庭抗礼。

无论是旧报扩张，还是创办新报，都需要大量人才。在这方面，两大报系以优厚待遇，一方面，留住原有人马，另一方面，为了让新进人员立即上场作战，舍弃以往培育记者的方式，而改以直接向其他报社挖角的方法，造成许多地方报，包括一些全国性报纸的地方记者流向两报。^②

1989 年 2 月 11 日，《中国时报》刊出《本报启事》，宣布加张。第二天，《联合报》当即跟进，同样出版 7 张。此前一个月，《联合报》在台北报业公会上，曾提议取消“八项协议”，因为只有《中华日报》一家代表表示抗议，没有经过表决该案就算通过了。舆论界称，此举意味着报纸张数已经没有了上限，也意味着在两大报系的攻势下，其他报业战况趋紧。^③

因此，报禁开放后，台湾报纸总数虽然暴增，但两大报系垄断报业市场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1989 年，王惕吾宣布联合报系四大报发行量占报业市场的 52%，加上《中国时报》，两大报系发行量至少占台湾文字媒体的

① 荆溪人：《报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 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版，第 37 页。

② 汤海鸿：《报禁解除后报业的竞争形势》，载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中华民国新闻年鉴（80 年版）》，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1 年版，第 77 页。

③ 高舜天：《两报突破六张 他报战况吃紧》，《新闻镜周刊》18 期，198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

80%以上。^①

在两大王国扩张下，独立报刊很难生存。80年代借助党外运动盛极一时的《自立晚报》，以其大胆报道一纸风行，发行量曾一度达到100多万份。报禁开放后，乘势创办《自立早报》，俨然与两大报系鼎足而三。结果不仅没能撼动联合、中时两大王国在早报的垄断地位，并且伤及自身。在外，两大报系不仅牢牢控制日报市场，令《自立早报》难以突围，而且新创的《中时晚报》和《联合晚报》凭借强大的日报力量支持，蚕食晚报的市场。在内，为了支持《自立早报》，《自立晚报》精锐尽出，号称“一军”调到早报，被留在晚报的人自认“二军”，内部士气低落。同时，《自立早报》虽然没能攻占联合、中时两大王国的多少市场，却抢走了不少《自立晚报》的读者。《自立晚报》的报份，一年内就掉了一半多，掉到67000份。^②内外苦斗之下，自立报系早、晚两报苦苦支撑，到1994年终于转手给财团。

在两大报系的压力下，只有所谓财团报才有本钱一搏。^③《自由时报》在报禁之后对报业市场的冲击便是一例。该报由台北三重帮出资，实力雄厚。为了打开市场，《自由时报》效法两大报，大搞有奖销售。1988年，两大报曾分别斥资2亿元促销。1992年，《自由时报》也投入1.6亿元，用于促销。一年内，《自由时报》广告收入由1991年的2.1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3.63亿元，增长了71%。1995年年底，《自由时报》推出赠阅计划，一个月便投入2500万元到3000万元，广告收入由1996年的18.5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34亿元，递增了83%。1996年，由于纸价上涨等因素，两大报系将每份报纸售价提高到15元，《自由时报》则维持每份报纸10元。当年第一季即产生“不涨价效应”，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份，《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阅读率则下降了3%至5%。此后，《自由时报》趁势再打促销战，连续3年花了10亿台币，大奖包括送黄金、奔驰车，甚至价值1亿元

① 施和梯：《两大报系政治大押宝——中时、联合各押各的宝》，《财讯》1990年第2期。

②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431页。

③ 吕杰华：《报业发展与经济变迁——论报禁解除十周年台湾报业生态及发展趋势》，《民意研究季刊》1998年4月号。

台币的别墅。《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被迫跟进。1999年，两大报加入商品联卖活动，买报纸送赠品，脚踏车、轿车、手机、音响、茶叶蛋、咖啡等等，都在赠品的范围之内——报纸发行战十足成为不止息的消耗战。^①这波价格战后，《自由时报》宣称台湾已进入“三大报”时代。

中时、联合、自由三大报团鼎足而立的态势一旦形成，其他报纸想从这三大报挖走报份就变得非常困难。《民众日报》与《台湾日报》也曾不断举办赠奖活动，但对报份成长几乎没有多大帮助，《民众日报》的报份甚至下跌。事实上，各报的促销竞赛，重心多放在以其他商品来笼络读者，鲜少以优质新闻内容争取读者支持与信赖。当局也未能规范这种促销竞赛的市场行为，流风所及，各报竟拼力争夺恶劣广告，如中西成药夸大效果、六合彩、地下钱庄、征友征婚征公关男女等色情广告，就连颇负盛名的报纸也不拒绝。1994年6月，高雄《台湾新闻报》以正式声明、新闻、社论等方式，抨击报业公会各会员报不遵守公会决议，擅自大量刊登六合彩和色情广告，毅然退出高雄报业公会。与此同时，读者对报纸的批判也层出不穷。尽管如此，为了生存，各报的恶性竞争在很长时间内仍是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报业的黄昏

1990年中期，台湾经济开始不景气，给竞争激烈的报业市场带来不小的冲击。与1989年相比，1990年台湾报纸的主要营业收入——广告业绩均出现了衰退，而报禁开放初期由于激烈竞争而造成的结构性成本（比如两大报系因垄断人才挖角而带来的高人事成本、因抢先1小时出报新盖的印刷分厂、因扩充报系规模而新生的借贷利息等）却居高不下，危机遂告出现。为应对危机，各报先是采取较温和的节流方案，包括冻结人事与薪资，紧缩日常杂支，取消员工福利如住宅贷款、津贴、奖金等。此后便是减张、减薪、裁员。1990年12月1日，联合、中时携手达成默契，同时将日报的周一至周四版由8大张缩减为7大张，仅此每月可省下1900万元，自立报系

^① 张宏源：《解构媒体环境变迁与报业发展趋势》，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则宣布裁员，每月节约750万元。^①

1993年，台湾通过“有线电视法”，开放广播频道，媒体结构发生变化，电子媒体对报业的冲击开始加大。^②进入新世纪后，受到台湾经济景气，特别是网络、电视媒体的冲击，报纸阅读率大幅下降，广告也每况愈下，加上纸张和其他原物料价格飞涨，台湾报业渐渐进入严冬季节。

在阅读率方面，报禁开放初期，新报陡增导致原有各报长期订户及零售皆出现显著跌落，幅度约在10%到30%之间。^③调查显示，1992年，76%的台湾民众是报纸读者，到了2004年却只有不到50%的人读报。1996年有线电视台成立，将24小时轮播新闻方式带入市场，吸引民众改以收看电视新闻了解社会事件。到了2005年，23%的民众觉得有线电视是不可或缺的媒体，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报纸是生活必需品。三大报的阅读率也随之下滑。《中国时报》2004年为11.3%，2005年为10.6%，2006年为8.4%；《联合报》2004年为12.6%，2005年为11.9%，2006年为9.6%；《自由时报》2004年为17.6%，2005年为16.5%，2006年为16.3%。^④

广告方面，1990年台湾媒体全年广告收入有1000亿元，2006年只剩下500亿元。其中，报业所占的广告份额不断减少。2007年，台湾报纸广告收入仅占到电视台的一半。当年发行量最大的《自由时报》广告收入仅为38亿元，^⑤《联合报》《中国时报》分别只有15.35亿元和12亿元。到了2008年，《自由时报》降至29亿元，《联合报》《中国时报》广告更降至14.2亿元和8亿元。就算经营情况被看好的《苹果日报》，2007年广告营收为33.25亿元，2008年降为30.53亿元。

读者和广告的双重流失，使得报业市场不断萎缩，报纸生存日趋艰难。继报禁开放初期新报倏创倏停之后，台湾报业又进入新一轮更加惨剧的停刊

①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3月版，第109—111页。

② 彭明辉：《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337—341页。

④ 林丽云：《报业，夕阳业，为什么？》，http://ban-lif20.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23.html。

⑤ 李晨宇：《2009年台湾省报业发展综述》，载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编：《2010中国报业年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期。2001年10月2日，有54年历史的《自立晚报》宣布停刊。2002年2月20日，《劲晚报》因长期亏损16亿元，宣布停刊。2005年11月1日，报禁之后新办、发行量一度高达60万份的《中时晚报》，因为订报率与广告量持续下滑，不得不停刊。2006年2月底，发行16年的《大成报》停刊。同年6月1日，有78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停刊，转型为网络电子报。6月6日，《台湾日报》因为投资方拖欠报社员工薪金长达6个月，迫不得已停刊。11月1日，隶属于联合报系、以影剧消息为主的《星报》停刊。12月1日，同样隶属于联合报系、有28年历史的《民生报》停刊，该报内容主要以民生、体育、娱乐消息为主，曾创下发行57万份的纪录。

在报业衰退的大势之下，最后连《中国时报》也不得不拱手让人。这家曾在台湾报业史创下无数辉煌、长期执报界牛耳的大报，虽使出浑身招数，终究还是支撑不住。广告收入由1998年的65.6亿元猛跌至2008年的8亿元，财务状况由1987年报禁开放前税后盈利20亿元，落到2008年亏损近10亿元。2008年7月，《中国时报》宣布人事精简，试图降低成本；9月，宣布缩版减张，每天出10大张，希望走精英报线路突围。但是，庞大的亏损使得突围难以为继。两个月后，2008年11月4日，中时集团宣布旗下《中国时报》《工商时报》《时代周刊》、“中天电视”、“中国电视公司”、“中国时报旅行社”等媒体，一并以204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售予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经营，从此中时集团改名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壹传媒进驻台湾

在旺旺集团收购中时集团之前，盛传《中国时报》将被竞争对手《苹果日报》收购的消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自己也表示，最后关键时刻出手，是为了“不要看到一报（苹果）独大”。

虽然在《中国时报》收购过程中，“米果”（旺旺集团靠经营米果起家）击败了“苹果”，《苹果日报》在台湾也没有一报独大，但是，《苹果日报》短短几年在台湾报业市场上打败三大报，成为报业老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1年5月，以八卦和臃色腥新闻起家的香港壹传媒集团进军台湾，发行《壹周刊》。两年后，2003年5月2日，壹传媒集团再度砸下重金，发

行台湾版《苹果日报》。创刊当天，《苹果日报》共出27大张112版，全彩印刷，头版封面人物为抗非典殉职的医务人员，其他版面内容有名流豪宅特写，也有底层小人物访谈，有名人执笔的专栏，也有记者亲历召妓的采访，每份报中还夹送一张钟丽缇彩色全裸海报，售价仅为新台币5元，首日零售量超越了当天台湾所有报纸零售总和。此后一个月中，该报每天平均印刷量在50万份上下，实销率高达85%，可卖42万份。^①6月1日起报纸售价调为正常的每份新台币10元。

《苹果日报》引进狗仔队采掘新闻的运作模式，引爆台湾报业的通俗新闻热。为了迎战《苹果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从当年2月份开始，先后进行改版，并将售价由15元降为10元，《自由时报》则在3月19日全面彩色印刷。报禁开放后十多年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三分天下，没有任何一个挑战者构成过威胁。《苹果日报》第一次让三大报业同时感到压力。

进军传媒业，香港《壹周刊》创办于1990年，五年后《苹果日报》创办，以“买一份报纸、送一颗苹果”的行销手法，和“同一职位、薪水加倍”的挖角手法，引发香港报业的割喉战，逼得《电视日报》《香港联合报》《快报》等多份香港报纸相继停刊。此后，《壹周刊》《苹果日报》的营收，一直高居香港杂志和报纸类第一名。

在台湾发行《苹果日报》，仍然采用低价行销和高薪挖角的竞争手法。在接受“CNN”专访时，苹果方面表示3年内要在台湾投下60亿元台币。对照报禁时代的台湾报业史，《苹果日报》的许多策略，似乎包含了当年王惕吾在《联合报》采取的员工福利政策、余纪忠在《中国时报》的重用人才政策，以及《自由时报》的有奖销售政策，只不过这些策略现在同时被《苹果日报》所采用，而且每一项策略的功效都被发挥到极致。《苹果日报》每天出版60个版、发行40万份时，员工不到600人，而三大报同样的产出，却需要2到3倍的人力。^②

① 韦思曼：《苹果日报能红多久？》，《动脑杂志》第326期，2003年6月。

② 谢慧铃：《苹果日报在台湾发行纪实——“狗仔大亨”黎智英挑战传统办报理念》，《新闻记者》2004年第2期。

《苹果日报》的经营方式带有明显的财团报风格。但是，与一般财团报不同，《苹果日报》财力雄厚，在金钱上对竞争对手具有致命杀伤力。

与传统报人和主流新闻学宣称报纸应有益于国事、新闻，应秉持客观主义原则不同，在《苹果日报》的选稿标准中，好新闻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件，也不一定是影响最多人的事件，而是最能吸引人的事件。只要能引人注目，只要能卖钱，就可以放在头版。《苹果日报》不仅头版新闻可以娱乐化，连严肃的政治新闻也可以娱乐化。^① 它信奉的新闻典范是：“媒体就是商品，市场主导一切。”^②

不过，只要透过表面的臃肿新闻和狗仔队式的采访作风，深究其背后的理念，检讨其言论报道的实效，《苹果日报》即会显示出其复杂性。

《苹果日报》走的所谓通俗小报的大众化线路，从世界新闻发展史的角度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便士报、黄色新闻和扒粪新闻。学者们普遍认为，19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的便士报（Penny Press），是报刊以耸动感官风格和人情趣味作为号召的关键性源头。但是，便士报在美国报业史上却做出过革命性贡献，它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陈述”战胜了“意见呈现”。^③ 在此之前，报纸乃是优势阶级的媒体，以政治与商界精英人物为服务对象。便士报则一开始便以一般市民读者为对象，使用普通民众的语言，口语化，生动通俗；刊载的新闻富有人情味，故事性强，诉诸读者的情绪和感受，因此少不了感官化的文字报道，令人恐怖甚至反胃的犯罪细节。同时，又强调社会道德教化，描述罪犯们受到社会制裁和惩罚的下场。随着科技的进步，报刊开始普遍使用图像插画，19世纪末出现彩印的通俗小报，带动了“黄色新闻”的兴起。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便是其中的代表。该报除了延续之前便士报生活化语言写作、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耸动的感官诉求、市井庶民取向等，还强调报道的事物应该是“创新的、特殊的、戏剧性的、浪漫的、令人兴奋的、令人好奇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奇怪的、容易引发讨论的”。事实上，这类新闻也大受欢迎。结

① 梁丽娟：《苹果掉下来：香港报业“苹果化”现象研究》，香港次文化堂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72—73页。

② 俞旭、黄煜：《市场强势典范与传媒的伦理道德——香港个案之研究》，《新闻学研究》第55期。

③ 舒德森著，何颖怡译：《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7页。

果，赫斯特的《纽约日报》也如法炮制，双方爆发“黄色新闻”大战。

“黄色新闻”以偷窥式报道揭露政商名流、影艺明星的琐闻轶事、风流韵史招揽读者；同时也致力于揭发当局的贪腐丑闻，批判奴隶问题，讨论其他与社会底层黑暗面相关的争议性话题，甚至鼓吹工会权益，支持庶民的阶级立场。20世纪初，通俗新闻更发展为“扒粪新闻”，主要揭露社会底层阴暗面，被视为罗斯福新政与进步主义时期改革运动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如同王惕吾当年“社会新闻的革命”，历史上的通俗小报，对于政商丑闻、名人绯闻、生活娱乐资讯的强调，并不代表它对于严肃时政问题的轻视。相反，与所谓严肃报刊不同的是，在大众报刊的通俗新闻中，公共议题不是遥远而抽象的项目，而是以具体的、可辨认的、生活化的、通俗故事的方式呈现。换句话说，通俗新闻以间接的方式反映或讨论社会议题。通俗新闻的世界，是充满奇观的世界（光怪陆离），也是问题化的世界（犯罪与丑闻），可以是臃色腥的耸动炒作，也可能是谴责丑闻绯闻的道德主义批判——它谴责社会犯罪，并且因为不择手段地报道犯罪而使自身受到谴责；而且，其口语化的浅显报道方式与照片图表的大量运用，相当具备民主化的功能。^① 这些理念，与王惕吾的社会新闻“不是社会现象的新闻，而是社会问题的新闻”，颇有神通之处。同样，《苹果日报》也是这种通俗新闻报的典型，它是绯闻娱乐与政治的矛盾集合体。

《苹果日报》关于好新闻的定义，实际上是对于社会精英概念中关于何谓政治、何谓新闻的一种反动，它试图建立平民通俗品位的正当性，肯定八卦新闻对于受众的消费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苹果日报》虽然以臃色腥为包装，但它也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政治报纸。与王惕吾的思考角度不同，但《苹果日报》同样看到，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由于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因此，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通俗新闻，可能比政治新闻更为重要；一条娱乐资讯，可能比政策公告的用途更大。就像王惕吾说过的，某企业人物的被绑架，对我们这个社会大众而言，其新闻的重要性并不下于波斯湾危机。

无论竞争对手和社会如何批评《苹果日报》的小报作风，事实是，它以小报作风成就了大报市场。有人认为，所谓严肃新闻与通俗新闻之分，大

^① 林思平：《通俗新闻：文化研究的观点》，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2页。

报与小报之别，不过是主流媒体用以强化自身主导性与正当性的策略。事实上，两者本来就相互渗透。《今日美国报》在美国创刊初期，主流大报也曾经批评它的臃色腥。但是，随着该报崛起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主流大报也不得不一边批评，一边也纷纷加入到通俗化的行列。同样，在《苹果日报》的冲击下，香港和台湾各大报也都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图像化、娱乐化、通俗化、八卦化。

第二节 世界变了 何以立报

精神分裂的新闻界

台湾《苹果日报》创刊那年，时任《新新闻》总编辑的杨照，发表一篇题为《台湾依旧需要“文人媒体”》的文章，显然是针对商人办报而发。商人办报，市场第一，“读者爱看什么，我就给读者什么”；文人办报，却是要提供“社会大众应该知道的新闻”，而不是“社会大众想要知道的新闻”。杨照说的文人办报，也就是知识分子办报，就是文人论政。在报禁年代，它是许多报人的内心功法；^①到了竞争时代，虽然仍是许多报人的志业，却未免显得有违市场法则。杨照自己也体会到这一点，他说：

“文人”有清楚的、坚持的价值判断，他们当然可能会为自己的价值付出代价。他们很可能提供了社会大众不想看不想听的新闻，因而无法得到商业上的收获。可是要办报的文人……他们相信有机会，有可能用自己的价值说服社会、改变社会、让社会更好。^②

杨照主张文人办报的用意，是提倡报纸应有所谓价值判断。就像余纪忠一再告诫同仁的：要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抱负，对于整个时代趋向和“国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417页。

② 杨照：《台湾依旧需要“文人媒体”》，载杨照：《问题年代》，2003年7月INK印刻出版，第4页。

家”处境，应有明确的认知与关怀。

报禁开放后，由于言论市场的公开，一般预期各报新闻报道能更加公正客观，将各报本身的预存立场调整。不料事实却是，各报坚持本身立场的倾向比开放之前更加彰显，无论在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角度的选择，还是新闻诠释以及新闻评论上，都毫不掩饰。对于许多重大新闻，读者必须阅读两份以上的报纸，才能拼凑出事件的理路。^①学者评论说，报禁解除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资讯市场竞争激烈，政治党派及利益集团都想透过传媒吸纳以民意为基础的政治资源，因而或多或少影响了报禁开放后新闻及言论品质。其结果便是，“西方报业 19 世纪初期的党派立场（partisanship）以及 19 世纪末发生的激情主义（sensationalism），竟同时出现于解除报禁后之台湾新报业”。^②

新闻的激情化主要是由于市场竞争，报业立场的政党化则部分地归因于报禁后遗症。诚如一位报人所说，戒严虽然解除了，但戒严已深入新闻界的骨髓。在戒严时代做记者的人像摸壁鬼，没有墙壁他就不会走路了，只能用爬的。长期作为侍从的报业，要真正恢复独立自主并不容易。以《联合报》为例，报禁开放后，该报创办了《联合晚报》，是台湾第一份横排的报纸，一炮打响。总编辑黄年曾对王惕吾说：

报纸横排，只是形式上的“横过来”，进一步我们要在心理和思维上，也将报纸“横过来”——将过去政治当局和新闻媒体的“垂直的关系”，政治为主，媒体为从，政治为上，媒体为下，改变成“平行的关系”，将“主从关系”转为“制衡关系”。^③

可是，要真正将报业与当局的关系由垂直变为平行，并非易事。除了心理定势在起作用，报禁开放时未规定经营权与所有权应分离，缺乏民主机

① 杨孝嵘：《报社经营策略的观察》，载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八十年版》，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1 年版，第 85 页。

②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8 年版，第 72 页。

③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 2008 年版，第 352、479 页。

制,也使得报业老板的政治利益凌驾新闻专业,主导新闻内容。^①同时,后威权时代,台湾政党裂变和社会冲突加剧,也使读者出现立场分隔,并且以各自的政治立场评判和选择报纸。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党出现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联合报》站在非主流派立场上反对李登辉,《自由时报》则力挺主流派李登辉,其老板林荣三不久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别是随着民进党的公开活动并走向执政,台湾的族群关系和两岸关系等议题分歧突现,对各报的言论报道提出了尖锐的挑战。1992年10月30日,《联合报》头版刊载中共领导人李瑞环的谈话,国民党主流派及社会运动团体表示不满,指斥《联合报》是“中共的传声筒”,发动所谓“退报救台湾”、“我家不看《联合报》”的退报运动。当此之时,《自由时报》却趁机宣称自己是“台湾人的报纸”,以其“本土”立场招揽读者。在特定议题上,林荣三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甚至不惜将新闻规则弃之不顾。^②在新闻专业上,《自由时报》难以被人认同,但它在许多政治议题上偏激的表达方式,加上不惜砸重金抢占市场的剽悍作风,却迎合了“本土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两大报系都被连续的亏损和裁员困扰时,不按新闻规则出牌的《自由时报》却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令外界不得不感叹林荣三的“招数”和“钱袋”一样是深不可测。

当市场也被意识形态区隔的时候,报业要想保持中立,无党无派,无疑会面临极大的压力。老板立场挂帅,也让新闻工作者陷入职业伦理的困惑。资深记者商岳衡进入《自由时报》工作仅三个半月,无法忍受该报“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凭着二手传播之小道授意,对非主流派不断展开恶毒攻击”,深感“台湾政局之动荡不宁,舆论界之煽风点火不能辞其咎”,愤然辞职。^③同样,从《中国时报》挖角到《首都早报》、出任总编辑的戎抚天,第二年就痛苦地发现自己的新闻职业理想无法坚持,感觉在办一份自己

① 习贤德:《联合报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传承(1963—2005)》,秀威资讯科技公司2006年版,第351页。

② 《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将报业当成个人的政治工具,将个人意志加诸报纸,是报社实际上的“总编辑”、“总主笔”和“总经理”,完全掌握了报纸的走向。林丽云:《变迁与挑战:解严后的台湾报业》,《新闻学研究》第95期。

③ 忻圃丁:《对报业理念南辕北辙 商岳衡辞离自由时报》,《新闻镜周刊》第106期,1990年11月12日至11月18日。

都不相信的报纸，因为该报在市场和政商压力下，已完全变成一份非常鲜明的党外报纸。^①而报禁开放前后曾风光无限的《自立晚报》，最后也因政商势力强势介入经营，逐渐变成“以商领报”，成为政商介入媒体最恶劣的范例。^②

由此可见，报禁解除后，政治介入新闻虽然不再采用绝对控制的硬性手法，却结合市场机制，以商业面具做掩饰，新闻依然没有培育出完全成熟的专业文化，反而不时使得政治立场与专业报道相互混淆。尤其在统“独”、蓝绿等意识形态议题上，许多主流报纸立场鲜明，甚至以言论立场主导编辑方针，违背了言论与报道相分离的专业要求，不仅使当事人蒙受损害，也伤害了受众，扩大了台湾的政治对立——造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最后也损害了新闻事业本身。^③台湾报业由此陷入一种意识形态与市场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为了满足特定意识形态的读者群（如深蓝或深绿），报道和言论不能不有所偏颇；当报道和言论变得偏颇时，更加被其他意识形态的读者群所厌恶，于是只能更加依赖特定意识形态的读者群，始终无法超越蓝绿，回归客观中立，也就难以吸纳新受众，只能各自固守基本盘，无论如何再也不可能重现80年代百万大报的辉煌。

面对台湾报业的泛政治化，曾经走过戒严时代的记者感慨万端。在他们看来，台湾政治进入了民主自由时期，警总也废了，国民党文工会也无力管制言论了，但报业的“靠边站”，却把自己的手脚又捆绑起来。过去是国民党控制新闻自由，现在却是媒体自己在控制新闻自由。戒严时代什么都被禁止，这是一个极端；解严后，什么都被放纵，这是另一个极端。解严前，记者必须要有勇气，要坚持，要有技巧；解严后，记者必须克制，避免过度放大与渲染。解严前是被压抑导致新闻扭曲；解严后却是过度渲染导致专业沦丧。著名报人王健壮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就好像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那些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324页。

② 吕东熹：《自立晚报的崛起与消失——谈台湾报业的转型正义》，收入张炎宪、曾秋美、陈朝海等编：《战后台湾媒体与转型正义论文集》，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8年版，第2页。

③ 荆溪人：《报业》，载“中国新闻学会”：《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9—40页。

从小在音乐学院受正规训练、规规矩矩学乐器的人，没人理，被人嘘；那些不照乐理乐谱胡乱敲锣打鼓的人，反而受到观众的喝彩，赢得掌声。专业沦落，是非颠倒，令许多记者有挫折和内耗空转之感。^①

政治上无休止的纷争令人厌烦，社会的平民化和消费主义也使得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降低。当消费和娱乐成为大众的主要需求时，最好的消费就是八卦，时政新闻和严肃报刊越来越难以与通俗报刊竞争。世风所及，报业的“苹果化”也就自然而然，许多原本很重要、很严肃的新闻，被以娱乐化的方式加以处理，仿佛所有事情都可以一笑置之。有人总结说，解严以后，台湾媒体生态的最大变化，就是“公共”不见了，通通变成八卦。后威权时代台湾的新社会控制，不是威权控制，而是流氓控制、群众控制、八卦控制。亲民党“立法委员”李庆安曾经感叹，“国会议员”努力问政到心灰意冷，因为好好问政协商，媒体上一个字也不会有，建言一个字也不会出来，倒是在“国事”论坛上贴大字报、唱情歌、打架、对骂或闹绯闻就一定上新闻。^②

现实的纷乱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令报业无所适从，甚至自相矛盾。民众的政治冷漠，固然是社会变迁使然，但毋庸讳言，媒体意识形态化导致自身公信力丧失也是重要的原因。报业的窘态由此显露无遗：既要迎合市场新闻的导向，又不甘于放弃文人办报的使命，报人在意识形态、市场、娱乐、志业的纠结之间不断地冲撞自己的方向。^③

谁在收买媒体

报禁时代，报纸的言论报道空间有限，记者编辑受到的束缚固然很多，许多情况下，报业老板也一样身不由己，连余纪忠都曾受到警总调查。^④解禁之后，当局的强行控制消失了，报业老板真正可以独断独行，反而成为新闻自由的障碍。在这方面，王惕吾对于本报系两个记者报道新闻的处理方式

①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168、217、236、413页。

② 杨玛利：《弱智媒体 大家一起来误国？》，《天下杂志》第251期，2002年4月。

③ 苏蘅、牛隆光、黄美燕、赵晓南：《台湾报纸转型的问题与挑战——提供读者更好的选择？》，《新闻学研究》第64期，2000年7月，第1—32页。

④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第67页。

是一个典型例证。

1967年9月21日,《经济日报》头版刊载一篇报道,题为《不承认日对琉球有剩余主权 决策人士昨告立委 我立场不变》,暴露当局无力坚持琉球主权的窘境,引起当局震怒,迫令该报停刊4日,并撤换总编辑丁文治。层峰的指令,王惕吾无法抗拒,保不了丁文治的总编职务,但仍将他调回《联合报》担任副总编,继续重用。不久,国民党文宣大员到联合报巡视,发现丁文治还在报社,立即要王惕吾将他扫地出门,“永不录用”。王惕吾无奈之下,被迫解除丁的职务,但仍将他安排在自己经营的塑胶公司内当经理。

1991年3月9日,《联合报》记者徐瑞希奉主管指示撰写特稿《翁大铭以后戏怎么唱》,分析某弊案主角翁大铭的政商人脉,文中提到翁大铭和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以及党政大老黄少谷之子黄任中等人关系友好。审稿时,采访主任删去了涉及蒋彦士的内容,因为蒋和王惕吾关系密切。稿件见报后,王惕吾斥责记者:“为什么要把黄少谷的名字也提出来?”并要求刊登道歉启事,继而下令开除负责报道的记者,引起报社内部震动。副社长以下多位主管到王惕吾家求情,无功而返。各报记者义愤填膺,200多人联署声援徐瑞希,王惕吾更加恼怒,严词警告:联合报系若有人参加联署声援,一律开除。

以上两件发生在不同年代的事件,固然反映了王惕吾个人的好恶作风,更反映了解禁前后台湾报业老板权力的变化。^①当报业老板成为新闻自由的新障碍时,台湾新闻工作者争取自由的主要目标,也就由此前的免于当局干涉的外部新闻自由,转为免于老板干涉的内部新闻自由。1994年发生的“抢救自立”事件,便是其标志。

1994年6月,因为经营陷入困境,自立报系股权移转。由于担心新闻采编独立权因股权转让而改变,自立报系员工发起抵制具有财团背景的新资方行动,并寻求外界奥援。7月15日,《自立晚报》和《中时晚报》分别刊出三批和全版广告,内容是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镇源、政治大学新

^① 陈顺孝:《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五南文化2003年版,第161—162页。

闻系副教授冯建三、《自立晚报》资深记者陈铭城等人具名，呼吁“抢救自立”，希望新的经营者尊重自立报系的编采风格，不破坏媒体自主性。8月13日，《自立晚报》头版头条刊出《自立报系将被卖掉》的消息。消息称，该报多位主笔在自立报系卖给陈政忠之后，将不再为自立报系撰写社论。此后，《自立早报》《自立晚报》记者发起联署，要求与资方签订“编辑室公约”。这是台湾新闻史上第一次媒体员工抗议经营权转移，并由此催生台湾第一个自主性新闻工作者专业组织——台湾新闻记者协会。^①

自立报系的“编辑室公约”以及之后的“九〇一为新闻自主而走”事件均表明，报禁开放后台湾媒体争取新闻自由的对象已由报禁时代的管制者——当局，转向竞争时代的媒体所有人、相关利益集团及广告商。前者争取的是外部新闻自由，后者争取的是内部新闻自由。正如报禁开放前夕学者所预测的，将来新闻自由奋斗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官僚商业勾结体（Bureaucratic-commercial complex）”，“编辑室公约”正是台湾媒体人针对“官僚商业勾结体”提出的捍卫内部新闻自由的新方案。

“编辑室公约”的诉求颇为耐人寻味。它提出：“任何资本家都可以办报，只是必须对报业行规与价值有所遵从。”事实上，它准确地表达了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只有财团有实力参与报业市场竞争，而财团办报以市场为导向，利润至上，老板决定报道言论方针，必然伤害新闻的专业规范和价值。换句话说，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在新闻形式、新闻文化方面的诸般眩目变化，追根究底，无不是报业产权变化导致的结果。或者说，比起表面的集团化、娱乐化等外在变化，“官僚商业勾结体”才是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生态最为根本的不同。

因为可以凭金钱手段掐住报业的经济命脉，当局和财团再也不需要像从前那样用白色恐怖或黑道手段压制新闻工作者的揭弊报道，只需要直接用金钱购买新闻和版面就可以了。为了生存，台湾媒体已不得不走上了“卖新闻赚钱”的不归路。无论是报纸的新闻版面，还是电台电视台的新闻时段、新闻节目，统统可以喊价拍卖。各种政商广告，由此通过置入式行销变成各式“新闻”。“深度报道”成了“商品类型”，“主播专访”成了“产品规

^① 涂建丰：《编辑室公约运动》，《新闻学研究》第52期。

格”，“SNG 新闻连线”背后实际是金钱连线。报社成立“企划组”负责“业编合作”，电视台成立“专案组”负责“新闻专案”，统统都是为了“业配”。

于是，受众们难以置信的情形出现了：选举期间，各政党候选人的频频曝光，原来是“政党专案”；有的 SNG 连线，原来是某天王级政治人物以 100 万元购得。一条讲述孩子营养的新闻，其中的受访医生居然是线人，就在他以专家身份指导孩子需要某种营养素之后的一个星期，含有该营养素的奶粉广告便堂而皇之地登场。同样，新闻报道说，70 多岁的流浪者和主妇骑自行车逛市场，背后代言的却是健康药品和自行车产品。就连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展览会，甚至当局部门主办的某些大型活动，像“交通部观光局”的“台湾自行车节”等等，有关新闻报道也都是花费数百万采购案的结果。表面上是即时新闻，是新闻专访，其实是“假报道，真文宣”。无怪乎近年来，台湾广告总额不断下降，当局的广告却逆势成长，仅 2009 年就比 2008 年增加了 20%。置入式营销几乎渗透到每条新闻生产的每个环节，无远弗界。据传播学者陈炳宏调查，台湾有 60% 的记者，承认做过付费的“新闻专案”，40% 的电视记者，承认每周制播“业配新闻”11 则以上。《联合报》业务主管透露，该报每月约 1 亿元的广告收入中，30% 属于业配。《中国时报》也不讳言，记者从事业配新闻可以抽成 5%。^①

媒体从事业配新闻，无疑是饮鸩止渴。它不仅无法根本解决媒体的生存危机，反而造成金权阶级利用新闻操控舆论。在置入式行销的大潮之下，媒体的专业标准和独立精神发生溃堤，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与期待也随之荡然无存。独立媒体人孙穷理说，就像工厂竞争造成环境污染、升学竞争伤害教育初衷，“业配新闻”同样是典型的“欠缺调节下的过度竞争导致外部公共利益耗竭”的悲剧。^②

与巨魔共舞

新闻业配化，言论立场的泛意识形态化，种种症状表明，解禁后的台湾

① 林照真：《谁在收买媒体》，《天下杂志》第 316 期，2005 年 2 月。

② 孙穷理：《大媒体的大崩坏和独立媒体的大考验》，<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6861>。

报业，不仅没有摆脱当局权力的纠缠，而且又遭遇到财团力量的新威胁。因此，就解禁后台湾报业面对的真正问题而言，市场导向顶多只是个表象，它的背后，还有当局的黑手，还有财团的黑手，尤其是当局与财团的相互援手，也就是所谓“官僚商业勾结体”。报禁开放后，曾经宰制报业独立的威权体制——政治巨魔——看似已被打倒，报业主要面对的已是财团的控制——资本巨魔，事实上，政治巨魔脱下威权的铁甲，又穿上了金钱的外套，重新伸出了控制的魔掌。换句话说，资本对于台湾报业的控制，已不仅仅来自于财团，它同时也来自于当局。政治与资本的相互借用，使台湾报业的独立之路，在报禁解除后变得更为艰难。

某种意义上，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生态的这一深刻变化，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都具有特殊性。回顾17世纪以来的世界新闻发展史不难发现，限制或妨碍新闻独立的力量，长期以来都以政府为主，进入20世纪20、30年代后，资本的力量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更危险的敌人。相应地，新闻史上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也先后表现为新闻界反抗当局强权和资本力量干涉新闻事业的过程。同时遭遇政府和资本两大敌人，解禁之后的台湾是第一次。

世界变了，何以立报？与世界报业史相类似，现代新闻事业在中国出现以来，旧中国人办报所面对的主要敌人，也一直是政府、政党乃至军阀力量。少数厕身于上海等城市的租界地，或背靠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商业报刊，比较可以无所顾忌地赚钱，众多依附于各种政党或政府力量的报刊，则不得不勉力从事宣传；除此之外，其他真正想以报业作为志业或追求报业持续发展者，都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来自各种政治势力的金钱收买或暴力干涉。因此，报刊在建构并推动中国现代性成长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始终在艰难地寻找突围的方向。中国新闻自由史的发展历程，也就伴随着新闻界既追求经济独立，又不放弃政治言说，同时追求政治独立，又不陷于以赢利为目的的努力过程，这一独特历程特别集中地体现于独立报的命运之中。

独立报，也称为严肃报，或优质报，李金铨称之为专业报刊。^① 独立报，秉持新闻专业理念，以优质报道和公正言论服务受众，生存与发展有赖

^① 李金铨将中国报刊分为政党报刊、专业报刊和商业报刊三种。李金铨：《近代中国的文人论政》，载李金铨编：《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政治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发行和广告收入，同时又心系民富国强，也就是所谓文人论政。张季鸾最早提出，文人论政，“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① 落后也罢，特长也罢，表征都在于同一点：报刊要为民族国家服务。自孔子以来，中国历代士人，志业所在，不出得君行道与明道救世二途，不能在朝执政，便是在野论政。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② 过问国事，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文人而不论政，文人何为？就像美国报业，如果不进行舆论监督，宪法第一修正何以要保护新闻自由？因此，在论政这一点上，独立报类似于政党报刊；只是与政党报刊仰赖津贴不同，它在经营上又与商业报刊一样，靠市场发行与广告维持。

独立报刊，在中国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于此前政党报与商业报的扬弃。曾虚白称之为“政论报与商业报的合流”。^③ 其代表与标志性报纸，便是1926年成立的新记《大公报》。^④ 台湾在报禁时代，文人论政同样被许多台湾报人用作抗衡威权的内心法则；尤其是余纪忠，更是被公认为带有文人色彩。

报禁开放后，当市场导向和资本控制开始影响报业的品质时，杨照等人又试图祭出文人办报的旗帜。无独有偶，面对报禁开放后的报业乱象，身为战后台湾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人，王洪钧也从独立报人的角度作出独特的观察。王洪钧认为，1991年马星野、成舍我两位老报人的辞世，象征着中国报业史上士人报业时代的结束。从此，“具有强烈使命感之资深报人”，将为“以现代经营为取向之年轻一代报业精英”所取代，未来台湾的新报业，应该是结合两代人的特色，“以专业精神及现代企业经营之智能向基层扎

① 《本社同人的声明——关于米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15日。

② 储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观察〉》，《观察》第4卷第20号。

③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4月初版，第13页。

④ 吴廷俊认为，新记《大公报》标志着“文人论政”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使“文人论政”理论化，而且使“文人论政”在实施时具体化。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4—16页。陈纪滢认为，《大公报》虽然是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三位共同创办的新闻事业，但张季鸾更充分地代表着《大公报》，《大公报》也孕育着张季鸾的精神。因此，张季鸾与《大公报》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报”与“人”。陈纪滢：《报人张季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67年版，第4页。

根”。^① 专业精神加上企业式经营，王洪钧的理想，似乎又回到了曾虚白时代的“政论报与商业报的合流”。

解禁后的台湾报业，其情形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报业情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历史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奇的是，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历史上的确有人如先知般地预见过。这个人正是王洪钧特别看重的成舍我。

在中国新闻史上，无论经历、事功或理念，成舍我都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就经历而言，成舍我一生，在空间上横跨两岸三地，在时间上纵贯几乎整个 20 世纪，亲历晚清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民族抗战、世界冷战等等历史大局的动迁，不同时期，相与往来或彼此争斗者，各有不同，其遭遇与奋斗可谓百年来中国报人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事功方面，成舍我一生创设之广、经营之善、影响之大，更是超乎同侪，精力与能力均令人望尘莫及。方汉奇曾为之总结道，他是近现代中国试图建立报业集团（托拉斯）的第一人，是身体力行参与新闻活动最长久的人；他曾建立或协助成立的新闻事业机构最多，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学校等总数超过 20 家的新闻相关事业单位；创下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报刊发行量的最大记录；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仍然创办报纸的人，91 岁时创办了《台湾立报》。

至于理念，成舍我因为受教育和人际交往的影响，^② 从很早就开始接触过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理论思潮，在现实冲撞和个人甄别的相互激荡下，予取予舍，而淬炼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其思想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早在报禁开放前半个世纪，他就曾经思考过报业如何与政治巨魔、资本巨魔两大敌人——也就是“官僚商业勾结体”的前身——相对抗的问题。

①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9 年版，第 72—73 页。

② 成舍我的人际关系，不同时期相与往来者，除了新闻同业，像早期的邵飘萍、龚德柏、管翼贤，后来的程沧波、卜少夫、陈训畚、陶百川、阮毅成、刘百闵、李荊荪等，也有不少政界或跨界的社会重要人士，包括北洋政府的孙宝琦、吴景濂、彭允彝、贺德邻，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至于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士，像李石曾、蔡元培、叶楚傖、吴稚晖、陈立夫、陈诚、黄少谷、王云五、端木恺、徐复观等人，特别是早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晚年在台北的“九老会”成员等，更是其一生思想和资源的重要人脉所在。

1930年，成舍我受李石曾资助，出游欧美，考察报业，经过一年的参观学习、交流思考，不仅使他对世界报业的最新发展有了近距离的观感，而且由此对中国报业现状有了新评判，对中国报业的未来有了新的想象。那次欧美之行，对成舍我有三点刺激：第一，他看清了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两个时代巨魔，已成为世界新闻自由的两大敌人；^① 第二，他看准了未来报纸的必然趋势——商业化与资本化，^② 以及这一趋势必将导致对报业的伤害——唯利是图、资本垄断、新闻“黄”化；^③ 第三，他看懂了中国新闻事业不能不顺应商业化与资本化的潮流，却又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对于新闻业的控制。为此，成舍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维护报业独立的个性化方案：“资本与言论分开，报纸与大众合一。”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成舍我洞察到报业市场化是整个经济制度的问题，因此，他所提出的方案也直指报纸所有权。他的具体设计为：

（报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

^① 成舍我明确指出，“现在全世界报纸，普遍的，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淫威下……这是全世界报业走进新时代的严重障碍，也就是全世界人们争自由光明的成败关键”。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世界日报》，1933年12月14日第13版“新闻学周刊”。

^② 成舍我认为，“假使中国报纸仍许私营，则必然趋势：将来中国新闻事业，将无法阻止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企业化，换言之，及资本化”。成舍我：《新闻记者法的缺点及其补救（下）》，《新闻战线》三卷七八合刊，1944年1月16日国立中央大学。

^③ 成舍我反复指出，“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资本薄弱，不但创办新报不能成功，即维持已有的报，结果，亦必归于失败，或被大资本者吞并而后已。这是资本制度下必然的结果”。（《中国报纸之将来》1931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二次新闻周演讲）“报纸在刀与支票之两大势力下，事实上，早已无处可以觅得所谓真正之舆论”。（《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报学琐谈之六》，《世界日报》1934年1月11日第13版“新闻学周刊”）。“自报纸‘黄’化以来，一部分英美报纸，更藉‘言论出版自由’的护符，为资本家‘招财进宝’的工具，败坏风化，唯利是图，这是英美言论出版自由制度下一种最不幸的现象”。（《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3年1卷3号）

在所有权上禁止非报社员工投资，固然可以避免大资本家对报社的控制，但成舍我并没有因此就将报社的管理权，特别是言论权交与报社员工自身。与限制资本家参与所有权同时，他专门设计了一个监督机关，负责指导报社的言论报道方针：

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

由于监督机关的成员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每个读者也都有权推举代表参加，实际上是将言论权向民众开放。成舍我设想，有了民众的监督，总编个人操纵舆论或报社本身违背公共利益的言行，自然可以避免。记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无冕之王，而是受到民众、读者指导下一个踏实的服务者，报纸也由报馆主人的喉舌，转变为民众的立场。

以上两点设想，让所有权与编辑权分开，正是“抢救自立”运动中“编辑室公约”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成舍我提出了独特的新闻教育理念——“德智兼修、手头并用”和小型报的办报方针，并在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上海《立报》获得成功。可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湘豫桂之战，成舍我的报纸、学校相继悉数被毁。抗战胜利前后不久，成舍我踌躇满志地在重庆和北平先后恢复了《世界日报》，但国共内战的阴云又让“成舍我方案”再度搁浅，而且一搁就是四十年。

上世纪50年代初，成舍我从香港迁居台湾后，曾决心恢复《世界日报》出版。在老友陶希圣等人的帮助下，一度出现过成功的幻象。但在报禁政策下，此志终不得遂。身处戒严体制和报禁环境中，没有真正独立报业的发展空间，办报也不再是光明正大的事，而所谓民营报业，难免成为威权者的侍从。成舍我乃断绝办报念头，毅然放弃一些报纸脱手可接的机会，打定“报禁不开，决不办报”的决心，将全副精力用于创办世新学校，为社会作育新闻人才，为未来新闻大业栽培栋梁。

成舍我果然迎来了报禁开放。1988年7月12日，以91岁高龄创办了《台湾立报》。这是成氏众多故友门生和台湾新闻界久已期待的事件，也是他本人晚年最大心愿的实现。《台湾立报》创刊，固然创造了世界新闻史上年龄最大者办报的奇迹，但成舍我更期待着此举能再展其一生的报业理念，重续个人新闻事业的辉煌传奇，并开创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新天地。

人才现成，资金充足，抱负不凡，独具眼光，经营有方，尤其是他在业界领袖群伦的地位，以及历史上《立报》曾经创造的辉煌，都使读者有太多理由对成舍我的新报产生无穷想象和极高期待。对于解禁后台湾可能出现的报业环境，成舍我自己的预期也相当乐观。有人担心报纸会泛滥，秩序大乱，他认为是杞人忧天。成舍我期待着存优汰劣的竞争时代来临，做好了“不惜赔三五亿”的心理准备，同时坚信“报办得好，大家爱看，人人买得起、看得懂，怎么会赔钱”。公正的报道、丰富的内容，仍是立报之本；言论过分偏激的报纸，将遭读者唾弃而无法生存。无论在什么时代，“代表人民，说出人民想说的话”的办报原则都不会变。在报纸形态上，他仍然偏爱小型报；风格上追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优先于广告。

这些理念和手法，是成舍我一辈子办报的心得，也是屡试不爽的策略。遗憾的是，施之于《台湾立报》，并没有为他带来预期的成功。《台湾立报》自创刊至1991年成舍我逝世，在日趋激烈的台湾报业竞争中，却未能脱颖而出，而且特色模糊，甚至被视为一张小型《中央日报》。报禁解除后，台湾传媒业的乱象为他始料未及，民众对传媒的不满不再是杞人忧天；而那些言论偏激的报纸，也似乎大行其道。成舍我编辑《台湾立报》的方针，终于引发人们的怀疑，连女儿成嘉玲也不讳言“家父是半世纪前的人”。

“半世纪前的人”，暗示着成舍我的认知与时代有了偏差。在报业日趋大众化、娱乐化的时代，通俗与可读已不再是当年上海《立报》独有的法宝，早已成为所有媒体的追求；传媒财团化发展，带动报纸急速扩张，版面越来越多，资讯越来越迅捷乃至信息爆炸，每份报纸都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尤为根本的是，报禁解除后，“人民”不再只是笼而统之地作为政府对立面的那个集合体，而是已然出现利益差别的不同社群集团。在财团主导市场和报业泛政治化的新形势下，公正的报道、小巧的形式，已失去曾有的效力，“偏激”的言论和“低俗”的新闻反而更受到市场的青睐。

壮志未酬身先死，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新闻史上屡创佳绩的成舍我，在报禁解除后的台湾却黯然失色。一生以追求新闻自由为志业的独立报人，在新闻不自由的时代尚可成就一番事业，在新闻自由制度安排业已达成之后，反而显得力有未逮。成舍我晚年创办《台湾立报》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独立报人在报禁解除后必然的遭遇。

第三节 独立媒体 另类突围

为弱势发声

世界变了，何以立报？公正的报道，丰富的内容，还能赢得读者吗？在官僚与资本结合体的干涉下，报业还能保持独立吗？在资讯商品化和泛政治化的趋势下，媒体还有希望吗？“所有的新闻都是适合刊登的新闻”、“不弄脏早餐餐巾”的新闻理想，如何能够成为现实？成舍我、马星野等一代独立报人逝世后，留给台湾报业许多巨大的问号。

报禁开放后，台湾报业给人的印象是有自由没品质。翻开报纸，读者触目所及，社会新闻充斥了黄色与暴力；财经新闻中，业主和产品的软广告轮番上场；娱乐新闻，成为记者性幻象的寄托；至于政治新闻，则是以偏见作立场，将谩骂当批评，老板的意识形态，政商的人脉关系，予取予舍，蔚为奇观。至于所谓资深的评论，名嘴的分析，更是如同脱口秀演员，口水与隐私齐飞，而真相与公议却越来越远。报禁开放仅仅三年，报业便被社会大众讥讽为“制造业”、“修理业”、“屠宰业”。^①种种怪诞乱象，不仅令台湾民众无比厌恶，连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也彼此矛盾。一方面，从 2006 年起，“无疆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连年将台湾列为亚洲新闻自由第一名；另一方面，知名公关公司艾德曼（Edelman）的调查又显示，台湾媒体只获得 1% 的公众信任，不仅列全亚洲之末，甚至不如网络媒体。《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台湾媒体已从昔日威权时代的哈巴狗，

^① 杨孝濬：《报社经营策略的观察》，载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编：《中华民国新闻年鉴八十年版》，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91 年版，第 85 页。

变成竞争时代的疯狗，失去了处理真相的能力。^①

越不理想的环境，越需要有理想的人投入改革。“野百合学运”之后，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反省社会改革的走向，纷纷从政治议题回归对社区和民众的关怀。1995年，中山大学学生陈丰伟利用新兴网络，创办了台湾第一份对大众发行的电子报——《南方电子报》。该报的宗旨是：“做自己的媒体，唱自己的歌”，同时也担负起了抵制主流媒体商业化的使命——“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发声”。《南方电子报》的人文关怀与社运路线，为台湾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资讯通道，它不同于主流大报的臃色腥和政治八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为报禁解除后的台湾找到了一个实现文人办报理想的平台。该报以对美浓反水库等社会运动中的出色报道，赢得了“社运团体的中央通讯社”的称号。^②

《南方电子报》平台的成功，鼓舞了在“官僚商业勾结体”的束缚下挣扎的非主流媒体。1997年，《台湾立报》教育组组长孙穷理创办“苦劳网”，以深度报道社运新闻为己任，迅速成为台湾社会运动新闻最及时、最可靠与最翔实的发布平台。同年年底，辅仁大学新闻学教师陈顺孝带领学生创办了“生命力新闻”，以“为弱势者发声，为奉献者立传”为宗旨，从公益新闻走向公共新闻，最后发展为公民新闻，采写了许多感人泣下的独家新闻，不仅吸引了大批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有的被拍成专题节目，有的甚至入选小学《道德》教科书。2000年，台湾环境资讯中心秘书长陈瑞宾辞职创办了环境资讯电子报，耕耘台湾的环境新闻，弥补了主流报业在该领域的报道，同样成为环保团体的“中央社”。

1998年，成舍我逝世七年后，接掌《台湾立报》的女儿成露茜，果断因应时潮变化，将该报调整为一份以教育为主轴的报纸。成露茜撰写的改版宣言称：

立报，这份隶属世新大学的日报，资本不及友报雄厚，人力不如友

^① 黄清龙：《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004298701.html。

^② 《长期选刊社会人文论述的南方电子报》，载“中国新闻学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97—2006）》，世新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报众多。但麻雀虽小，仍可振翅高飞。我们冀望联合一切关怀台湾、关怀世界，因而必须关怀教育的各届人士，共同营造一份以教育为主轴的报纸，在教师、学生、家长之间搭起一座迎向新世纪的桥梁。在这个空间赶时髦，让种种不同的声音互相充分地对话，每个人找到自己可以着力的位置。立报从今天开始，要做一条导火线——“引爆多元对话”、和广大读者“共营新新教育”。^①

事实上，成露茜对《台湾立报》的改版，岂止是引爆教育的多元对话。对于解禁后的台湾报业而言，《台湾立报》和其他资本、人力不如大报的小报一起，正在引爆一场关于“世界变了，何以立报”的多元对话。这一对话尝试着突破“官僚商业勾结体”对于资讯市场的垄断，在主流媒体的商业化和泛政治化之外，创建一种为弱势群体发声、让无力者有力的真正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

在这一报业理念下，《台湾立报》首创了许多试验性新版面，像“银发族版”、“性别版”、“原民版”、“社大版”、“南洋版”等。成露茜认为，银发族不应该只是含饴弄孙，过着一种退休、缓慢、不事生产的日子。银发族退休后，虽不再为生计忙碌，却也可以有生产力，可以投入社会从事公共事务。新两性版面出来时，被有的人批评为报纸在鼓励同性恋。成露茜的回答是：因为同性恋没有机会说话，而他们有许多话想说，《台湾立报》应该让他们说话。岂止是同性恋，台湾社会还有多少弱势群体，像艾滋病患者、智障者、少数民族、移民、外籍劳工等等，因为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其不幸的遭遇和应有的利益，往往被社会中上层所漠视，主流媒体也极少关注，仅有的报道，还常常充满了偏见。^②随着外籍新娘和外劳的增加，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人“无法上网、不谙中文”，台湾社会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针对这一群体，《台湾立报》专门发行了《四方报》，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心事、关读别人的心事”。该报首先发行越文版，大获成功，

① 成露茜：《引爆多元对话，共营新新教育》，《台湾阅报》1998年3月1日。

② 苦劳网报道：《让媒体改革成为公民运动 使台湾不再有媒体受害者》，2006年9月2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3170>。

又相继发行了泰文、马来文，共五种版本。

《台湾立报》的非主流实践，无疑是对解禁后台湾主流媒体的一种挑战。就像成露茜在创办《破报》时所说，《破报》就是什么都要破，这个名字就是一种宣示，对传统的一个颠覆。

破报颠覆的就是新闻专业，颠覆新闻专业的价值观与规范，它的内容有一种质疑，通过它的呈现，来对社会主流价值做一个完全的反抗。

如果说，林荣三办报卖的是立场，那么，对《破报》来说，“我并不是要卖东西给你，你也不是买东西的人，没有谁要讨好谁，不满意可以来辩论，不然就不要看”。既然颠覆了报纸是商品的观念，以赢利作为判断报纸成败的标准也随之消失。成露茜这样理解“报纸的成功”：

什么是成功？是指外面的人怎么看吗？比如办报纸，是赚钱才叫成功吗？若是如此，《立报》不赚钱，《破报》也不赚钱，这就是不成功吗？但我觉得这些报纸对某些人发挥了影响力，这样就好了。^①

可以说，报禁开放后，当台湾报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利润至上，深深陷入到置入式行销而不能自拔时，以《台湾立报》《南方电子报》为代表的小媒体，艰难然而无所畏惧地走出了市场导向的泥淖。这些新兴小媒体在市场上也许不能算成功，却重新让读者看到了台湾媒体新的希望。因为不惧怕经济失败，它们反而在捍卫媒体的独立公正、以报业推动台湾社会进步、重新为媒体赢得大众信任等方面，获得了成功。以一般的成功标准看，它们并不成功，因此很另类；但是，就媒体的公正和独立而言，它们或许更加纯正。就像《南方电子报》、苦劳网在社运新闻报道方面的权威性，已超过主流大报，《台湾立报》在教育新闻、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报道方

^① 林秀姿：《灿烂时光：Lucie的人生探索》，天下杂志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19页。

面，也已赢得社会的尊重。^①

走向公民新闻

为弱势者发声，为奉献者立传；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有爱。越来越多的另类媒体的出现，不仅让读者重新看到了台湾媒体的希望，甚至看到了台湾社会的新希望。一位读者这样描述阅读“生命力新闻”的感受：

打开媒体，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多的是资讯垃圾。……我们看到的是狭窄的眼界和有限的色调。政治版只有蓝色和绿色，社会版主要是黑色、红色、黄色，影剧版主要是黄色、肉色、金色。在这样的媒体世界长大，不近视、不色盲，也很难。

打开《生命力新闻》网站，如同在一个空气潮湿的房间内，推一扇窗，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让我们意识到屋外的辽阔。^②

与主流媒体热衷于金钱、肉体、丑闻、黑幕、纷争、冲突的报道不同，独立媒体更多地展示台湾民众的奋斗、创意和美好德性。就像在成露茜眼中，银发族一样有生产力；在陈顺孝眼中，普通人的生命中充满了美与创造的活力。有没有未来留给台湾媒体的过去？怀着同样的期待和信心，越来越多的新闻人离开主流媒体，转而贴近土地与人民。

2007年3月27日，投身新闻工作13年的资深记者关鱼，决心用希望振奋自己，以行动呵护台湾，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一份电子报，报名就叫做《台湾好生活电子报》。她的理想是：“把希望种在台湾土地上，以促成台湾

① 以该报记者胡慕情为例。出色的环境报道，使得当局有关方面每天上午例行性剪报时，原来都是按照先联合、中时这些大报，后才剪小报，但自从胡慕情跑环境新闻之后，剪报的顺序被改变了，她的报道经常被当作剪报的头条，“环保署长”时常还得亲自与她笔战。同为独立记者，曾获得“曾虚白公共服务报道奖”、“卓越新闻奖”的朱淑娟评论说：“慕情让立报从小报变大报。”事实上，现如今，在台湾“环保署”心目中，环境资讯报、苦劳网、台湾立报，这三个小媒体，已忧为三大“头号敌人”。报道：《独立记者的骄傲，朱淑娟写纪录》，<http://www.pedvd.com.tw/showthread.php?t=913213>。

② 林静伶序：《在资讯的洪流里发生生命的悸动》，载陈顺孝：《打造公民媒体》，辅仁大学2007年版。

生活变得更好。”《台湾好生活电子报》创刊宣言写道：

什么是《台湾好生活电子报》？

简单说，就是份“立志让台湾生活变得更好”的电子报。

为什么想创立《台湾好生活电子报》？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台湾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你，我，他，活在台湾的人们，只要懂得努力，都值得拥有，也终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近几年台湾各界被不够理想、逐渐恶质化的传统主流媒体破坏，已经够深够久了，打开电视新闻，翻开主要报纸，口水争论，八卦绯闻，杀人强暴，灾难眼泪，占去绝大部分的篇幅。媒体传播原是社会教育最广泛也最重要的一环，但我们每天从媒体得到了什么教育？媒体一天到晚告诉我们台湾的人事物有多坏多坏，但台湾真的有那么坏吗？

当然不！台湾拥有多元秀丽的生态山水，各角落热情和善的老百姓，更是外国人眼中美食美景天堂。正因为我们的故乡台湾，是地球最大的陆地和最大的海洋相互拥抱而诞生的岛屿，所以许多台湾人民正在努力学习，用最大的包容来对待全球人民。

然而，我们却遗憾且悲愤地看到，身负社会教育重责大任的传统新闻媒体，打着“新闻自由”的大旗，以“捍卫人民知的权利”之名，行“侵害各种人权”之实。热诚记者本着良心努力撰写的建设性新闻，还来不及见报或播出，就受到高层编辑的既定商业口味箝制，被种种煽色腥、话题性的新闻排挤到垃圾桶里；摄影记者被迫要尽量迫摄裸体和尸体，无论那些照片或画面遭编辑选择刊播后，会否害人自杀或让受害者家属伤心欲绝。

不用挂名的“媒体高层”，既能“按照己意，修改记者原告所做的报道”，更拥有指挥旗下记者群“为特定人物或事件，做配合和系列采访”之权，遭广大阅听人唾弃的不良电视新闻处理，便有不少源自“岂有此理”的指挥。又因各家媒体老板的政治信仰，让不少政治报道流于随政客起舞，更让原本是该是众人之事的民主政治，沦为制造对立、斗争内耗的工具。

主流媒体大幅失去讨论、形塑良善公共政策的功能，让台湾开放总统直选后，一直陷在“只有选民，几乎没有公民”的窘境。我们深信，台湾是能够达到“用自由当边界、以包容为领土，凡有生命皆是子民，实行自然主义、信奉平等”境界的家园。在那之前，需要有致力于公共报道、能给台湾更多正面力量的强大媒体，扮演促进不同族群理性沟通、海内外同胞同心互助的角色。

透过台湾好生活电子报的诞生与茁壮，我们诚挚希望能耕耘出“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的崭新媒体平台，突破传统媒体制造纷争对立、屡次侵害人权的不良结构，让所有关心台湾发展的人们，能仔细倾听台湾土地与海洋法的声音，倾听环境真正的需求，以平心静气、互相尊重的态度，在各人岗位上付出爱护台湾的行动。

《台湾好生活电子报》创刊号，头条新闻为《震灾夺命，夺不去互助的温暖人心》，报道的是有关九二一地震的新闻。当时距九二一地震发生已近8年，新闻的时效性在哪里？连编辑部内部都发出了疑问。但关鱼坚持认为，台湾社会有一些逐渐丧失却无比重要的基本价值，应该在创刊号中表现出来。地震和台风是台湾人民必须学会克服与共处的天灾，她希望透过报道中一个村长的故事引发大家思考：行政体制末端如何发挥基层力量、邻里互助关系如何建立？她相信，保护青山绿水，营造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环境，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每个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该尽的义务。同时，她也希望打破主流媒体只在九二一地震周年时才做纪念报道的模式。

从那时起，《台湾好生活电子报》一直致力于播种台湾的希望，以哪怕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也要对得起良心和故乡的信念，高举起微弱的烛光，积极投入到保留乐生疗养院、反对高学费、反“中科”救渔农、反血汗工厂等事件的报道中。在《台湾好生活电子报》三周年的时候，关鱼深情写道：“因为我父母愿意把孩子捐给社会，我才能把自己捐给台湾好生活报。”^①

比起在主流媒体内的常规化作业，独立媒体的经营显然要困难得多。但是，台湾的大媒体趋于大崩坏，主流媒体越来越难以畅所欲言，许多新闻人

^① 关鱼：《扭转新闻：从菜鸟记者到台湾好生活报总编》，《台湾好生活电子报》社2010年版。

意识到，要突破政党和商业媒体为私利制造纷争对立，真正促进族群沟通对话，理性讨论公共政策，唯有依靠独立媒体的多元发展。^① 基于对媒体自救和当局调控的失望，越来越多的记者步关鱼的后尘，转向独立媒体和公民新闻的艰难实践。

2005年3月1日出版的《时报周刊》以《菲佣仙人跳，专挑名人下手》为标题，报道菲律宾籍女佣常以“性骚扰/性侵害”为手段，以转换雇主或取得赔偿，对菲律宾女佣有污名化之嫌。菲律宾团结组织、南洋台湾姐妹会等移民团体立即赴时报大楼抗议。《时报周刊》最后也全文刊登相关抗议书，以示道歉。近年来，台湾劳工、移工、身心障碍、环保、少数民族等各种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了“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以监督媒体的不公正报道。^②

2003年年底，在社会各界的长期呼吁下，台湾“立法院”终于通过“广电相关法案修正案”，政党和当局不得再持有无线广播电视的股份。2004年5月，由媒体改造学社发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苦劳网等机构联合发起公民联署，呼吁进行媒体改革。联署倡议书对台湾公民呼吁说：

当前台湾的媒体环境和表现，已经到达谷底。这几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社会灾难事件中，我们看到电视新闻毫不人道，剥削受害者的报道。我们更从一次又一次对于公众实在是无关紧要的新闻中，看到电视频道大量浪费着电视资源和公众的宝贵时间。台湾的电视台关心的只是收视率百分点，可以为他们带来多少广告收入，而不是这些内容影响了我们社会多少年。当他们荷包满满之际，我们却得一直忍受水准低落的电视节目，担心自己的小孩该看什么电视，而且根本无法借着收看电视让我们成为有思考力、有发言权、有国际观的公民。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观众承受了台湾媒体（尤其是电视）过度私

① 罗世宏：《自由报业谁买单？新闻与民主的再思考》，《新闻学研究》第95期，2008年4月。

② 管中祥：《非专业媒改团体的媒体改革策略与行动意义——以“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为例》，中华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

人化、财团化和商业化的结果。我们不能再忍受，我们要站出来，因为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认为，节制媒体的商业性格，加强媒体的公共服务特性，是最有效也最急迫的办法，而其中一项立即可行的手段，就是强化我们的公共媒体制度。

2006年1月3日，台湾“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该条例第14条第3项明定：“政府机关（构）应将持有公共化无线电视事业之股份，附负担捐赠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走出“党政军退出三台”和成立公共广电集团的关键一步。2007年4月30日，公共电视基金会开设了一个公民新闻的平台——PeoPo 影音公民新闻平台，在这里鼓励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PeoPo 拥有多元化的新闻议题，每一个人或社团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报道自己关注的议题。该新闻平台目前有大约2300名公民记者。这些人来自台湾各地的各行各业，像彩券商 sadapeopo，以一台二手DV，记录台南善化地区的牛墟、屠宰场及老街，不到一年里累积到200则报道。2008年，他以对台风所作的追踪报道荣获PeoPo公民新闻奖。兰阳技术学院五专部学生杨曜任，16岁就加入PeoPo，成为该站最年轻、最活跃的公民记者。2008年，他荣获了“国家青年公共参与奖”的公民新闻奖、第二届PeoPo公民新闻奖和第三届TVBS大学新闻奖三项大奖。“每个人都有赢回自己的权力，去说自己的话语，去命名这个世界”。巴西著名解放教育家Paulo Freire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正是公民新闻理念的生动写照。

独立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实践，一方面，极大地突破了当局和财团控制主流媒体的局面，为公民提供了实现媒体禁用权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改变了台湾媒体资讯的品质。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报道和社会议题建构上，公民新闻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2008年9月1日，曾任《联合报》主笔的资深记者林意伶，卖掉房子独资创办了《台湾醒报》，融合了文字、影音、广播、网络、手机等不同媒体，倡导“极简阅读，深度报道”；

^① 孙曼苹：《公民新闻2.0：台湾公民新闻与“新农业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

期待以此唤“醒”台湾媒体，将报道方向由执政党或反对党的言论转到民众身上。2009年，在《联合报》工作了20多年的朱淑娟，以一篇《当媒体不再报道真相》的告白告别了主流媒体，辞职成为一名独立记者，与《台湾立报》记者胡慕情一样，以博客形式撰写环境报道。胡慕情认为，“如果一棵树倒下而没被报道，那它就不算倒下”；朱淑娟同样相信吴尔夫所说的，“一切不曾发生，直到它被描述”。两个人同时深耕环境报道，胡慕情的博客——“我们甚至失去了黄昏”，不仅成为“环保署”官员每天都要监看的媒体，并且获得2009年华文部落格年度大奖。而朱淑娟的博客——“环境报道”，则在一年后，凭着《中科三期 环评与司法的论战》《中科四期 风暴从这里开始》等报道，一举获得曾虚白先生公共服务报道奖、卓越新闻奖等三项大奖。“环境资讯中心”更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环保资讯媒体，2009年荣获了卓越新闻奖的“社会公器奖”。

2011年，《中国时报》为了专题报道“民国100当代风华——把台湾推向世界的十二位精彩人物”，采访著名舞蹈家林怀民。林怀民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我不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那些将街道扫得很干净的清道夫，是那些为了联考在学校和父母之间，仍一心想把书教好的老师，是那些为了捍卫家乡反对六轻的麦寮人，是那些为了环境反对国光石化的彰化人及站出来的年轻人。^①

也许同样可以说，台湾的媒体之光，不是那些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也不是那些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恰恰是这些另类小媒体。报禁开放后，大媒体日益趋于大崩坏，这些以社群、小区、社运等为对象的公民新闻、草根媒体、独立记者，却焕发出勃勃生机，产生了不小的另类影响力。这些媒体贴近大地，贴近民众，以坚韧的力量，不断克服许多困难。经营上的困难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社会的捐助，总能支撑它们渡过难关。更大的考验

^① 何荣幸序：《“台湾之光”就在你我身边》，载何荣幸等：《我的大革命：永续生活》，八旗文化2011年4月版。

还在于，如何在当局、政党、资本之间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建立自主性，并维持开放性，建立内部民主以及向外部公开信息的机制等等。^①

无论如何，独立媒体毕竟在主流媒体之外，为台湾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对话空间；为台湾报业延续了独立精神。这种精神，是台湾媒体的希望，也是台湾社会的希望。就像诗人所吟唱的：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刃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②

^① 孙穷理：《大媒体的大崩坏和独立媒体的大考验》，<http://www.cooloud.org.tw/node/56861>。

^② 李敖：《我将归来开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页。

参考书目

包澹宁：《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时报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芳明：《台湾抗日进动史上的两份重要左翼刊物——〈台湾大众时报〉与〈新台湾大众时报〉》，《台湾史料研究》第 2 号。

陈国祥、祝萍：《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自立晚报社 1988 年版。

陈顺孝：《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五南文化 2003 年版。

陈秀凤：《我国主要报纸政治冲突事件报道初探——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为例》，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1989）。

陈雪云：《我国新闻媒体建构社会现实之研究——以社会运动报道为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陈仰浩：《立法院报禁大辩论评议》，《民主人》，1983 年 4 月 1 日，第 6 期。

陈映真：《针锋相对逆流而上——报禁解除后台湾媒体生态剖析》，《日击者月刊》，1998 年第 6 期，台湾新闻记者协会。

澄社：《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纪念雷震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自立晚报社 1992 年版。

楚崧秋：《我与新闻》，东大图书公司，1985 年版。

戴独行：《白色角落》，人间出版社 1998 年版。

冯建三：《大媒体：媒体与社会运动》，元尊出版社 1998 年版。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湾大学 2005 年版。

郭良文、陶芳芳：《台湾报禁政策对发行与送报之影响：一个时空辩证

观点的思考》，《新闻学研究》第50期。

杭之：《迈向美丽岛的民间社会》（上），唐山出版社1990年版。

何荣幸：《媒体突围》，商周出版2006年版。

何荣幸策划：《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公司2008年版。

何义麟：《战后台湾报纸之保存现况与史料价值》，《台湾史料研究》第8号。

胡元辉：《坚持——一个媒体人的真挚省思》，未来书城2003年版。

皇甫河旺主编：《报禁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省思与发展研讨会实录》，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暨研究所1991年版。

黄顺星：《记者的重量》，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8）。

黄肇珩：《记者》，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

江诗菁：《宰制与反抗：中时、联合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之文化争夺（1975—1989）》，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

李金铨：《台湾的广播电视蓝图》，澄社1993年版。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

李瞻：《我国新闻政策》，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75年版。

梁丽娟：《苹果掉下来：香港报业“苹果化”现象研究》，香港次文化堂有限公司2006年版。

林富美：《台湾政经系络中的报业发展——以联合报为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

林丽云：《台湾传播史研究：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远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

林淇养：《意识形态媒介与权力：自由中国与五零年代台湾政治变迁之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论文。

林思平：《通俗新闻：文化研究的观点》，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

吕东熹：《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玉山社 2010 年版。

吕芳上、黄克武访问，王景玲纪录：《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

吕杰华：《报业发展与经济变迁——论报禁解除十周年台湾报业生态及发展趋势》，《民意研究季刊》204 期。

吕婉如：《公论报与战后初期台湾民主宪政之发展（1947—1961）》，师范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01）。

马之骥：《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经世书局 1986 年版。

倪炎元：《再现的政治：台湾报纸媒体对“他者”建构的论述分析》，韦伯文化 2003 年版。

彭怀恩：《台湾政治变迁 40 年》，自立晚报社 1979 年版。

彭怀恩主编：《九十年代台湾媒介发展与批判》，世界新闻传播学院 1997 年版。

彭明辉：《中文报业王国的兴起——王惕吾与联合报系》，稻乡出版社 2001 年版。

戚毅：《中央日报处理重大政治事件内容取向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乔宝泰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资料汇编》（上），近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

秦孝仪主编，张瑞成编辑：《光复后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0 年版。

邱国祯：《黑暗时代里的新闻记者》，民众日报社 1998 年版。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月旦出版社 1994 年版。

史为鉴编著：《禁》，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苏蘅：《竞争时代的报纸：理论与实务》，时英出版社 2002 年版。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50 年版》，1961 年版。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60 年版》，1971 年版。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70 年版》，1981 年版。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80 年版》，1991 年版。

唐志宏主编：《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世新大学出版中心。

陶百川：《困勉强猥八十年》，东大图书公司 1985 年版。

陶芳芳：《从政治控制到市场机制：台湾报业发行之变迁》，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王洪钧：《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记者公会 1999 年版。

王丽美：《报人王惕吾：联合报的故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王凌霄：《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国民党党史会 1996 年版。

王惕吾：《联合报三十年的发展》，联合报社 1981 年版。

王惕吾：《我与新闻事业》，联经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王天滨：《台湾社会新闻发展史》，亚太图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天滨：《台湾新闻传播史》，亚太图书出版社 2002 年版。

王晓寒：《白色恐怖下的新闻工作者：兼谈人生的甘苦》，健行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吴春贵主编：《台湾时报十年》，台湾时报编辑委员会 1981 年版。

吴纯嘉：《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吴三连口述，吴丰山撰记：《吴三连回忆录》，自立晚报社 1991 年版。

吴哲朗：《党外的新闻——台湾日报辛酸史》，长桥出版社 1978 年版。

萧阿勤：《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与道德论述（1934—1991）——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

谢汉儒：《关键年代的历史见证——台湾省参议会与我》，唐山出版社 1998 年版。

徐嘉宏：《台湾民主化下国家与媒体关系的变迁之研究》，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

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1950—1952）——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中正书局 1986 年版。

续伯雄辑注：《台湾媒体变迁见证：欧阳醇信函日记（1967—1996）》，

时英出版社 2000 年版。

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 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稻乡出版社 1996 年版。

薛心谿：《编辑台上：三十年以来新闻工作剪影》，联经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锦麟：《李万居评传》，人间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肃民：《限证政策下的我国报业问题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

杨秀菁等编注：《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第七、八册《新闻自由》，“国史馆” 2002 年版。

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稻乡出版社 2005 年版。

杨泽主编：《狂飙八〇：记录一个集体发声的时代》，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版。

杨志弘：《台湾地区报社总编辑职业角色之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2）。

叶邦宗：《报皇王惕吾》，四方书城 2004 年版。

于衡：《联合报二十年》，台湾《联合报》社 1971 年版。

袁公瑜：《国民党文工会职能转变之研究》，佛光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

曾进历：《报业从业人员组织承诺研究——以联合报为研究对象》，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三民书局 1984 年版。

张慧英：《提笔为时代：余纪忠》，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2002 年版。

张炎宪：《战后台湾媒体与转型正义论文集》，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2008 年版。

张作锦主编：《一同走过来时路》，联经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赵婴：《坵公圳案新闻报道之比较与研究》，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62）。

“中国新闻学会”：《90 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新闻学会”：《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1997—2006》，世新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年版。

周庆祥：《党国体制下的台湾本土报业：从文化霸权观点解析威权体制与吴三连自立晚报（1959—1988）》，世新大学博士论文（2006）。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巨流图书公司 2008 年版。

自立晚报报史小组：《自立晚报四十年》，自立晚报社 1989 年版。

《★报禁政策及其新闻管制

从戒严到报禁

大棒子加胡萝卜

新闻自由与自律

潮流变了

★威权统治的侍从与对手

党报的荣与悲

两大报系的崛起

“小媒体”的反抗

★巨灵的控制与无权者的权力

大者恒大 赢家通吃

世界变了 何以立报

独立媒体 另类突围

主要目录



聚焦台海 关注两岸



阅读好书 关注九州

ISBN 978-7-5108-3259-8



9 787510 832598 >

定价：36.00 元